

# 昆都仑文史第四辑目录

26

- 西北考察团与白云鄂博主矿体的发现……王耕樵 刘静波 (1)
- 包钢建设初期设计工作片断……顾 钧 (16)
- 包头钢铁公司科学技术的发展……于 俊 (23)
-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王兆才 宋炳刚 (35)
- 白手起家的昆区文化用品厂……李长江 (39)
- 昆区商业简述……鲁玉华 (46)
- 

- 包头市民族教育……〔蒙古族〕阿古拉 (49)
- 蒙古族中学的过去和现在……高志昌 王新洲 (68)
- 发展中的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王远峰 阎充英 (73)
- 对我市业余文化学校的回顾……易 馨 (83)
- 我所知道的绥远省文工团……郑 玢 (87)
- 昆都仑地区文化事业散忆……张 清 (95)
- 昆都仑恰特……小 艾 金 昌 (102)
- 

- 壮烈殉国的抗日挺进军刘桂五师长……高志昌 (105)
- 吉鸿昌将军二三事……郭体绪 (111)
- 云世英回忆蒙哥马利元帅的包头之行……孙明远 (113)
- 

- 在贺龙司令员身边……邢铁锁 (115)
- 大青山抗日斗争生活片断……王达仁 (118)
-

---

回忆我的父亲刘天宝.....刘发林(122)  
我父亲田中广德的坎坷一生.....〔高山族〕田中伯玉(128)  
缅怀何润华同志.....〔朝鲜族〕郑世荣(131)

---

肿瘤专家李汇文.....朱企泰 阎充英(136)  
归侨高级工程师潘玉良.....张 毓 朱企泰(142)  
老教育工作者潘关崇.....〔蒙古族〕马 德(148)

---

郭长清其人.....狄生云(158)  
萨拉齐匪患纪略.....狄生云(162)

---

杜守恒战地历史摄影选载.....(封二、封三)

---



# 西北考察团与白云鄂博主矿体的发现

王耕樵 刘静波

## (一)

一九二六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率领一支包括八名德国航空人员在内的的大型远征队第四次来到中国，准备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到新疆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开辟航线，并已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农商部订立了“契约”，“契约”中规定：“只容中国人二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须东返；关于将来采集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候中国有相当机构再送还。”实际上是拟将采集品全部运往国外，并且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这是因为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大批珍贵文物被外国人囊载以去的历史事实是尽人皆知、记忆犹新的。当时正处在北伐高潮中的中国人民，特别中国知识界的进步人士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屈辱了。为此，北京的许多学术团体纷纷组织起来，提出抗议。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下午，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大学研究院、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京师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北京图书馆、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学术团体，在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后改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编者注）。“到会各代表人以我国保存古物法、古物出口法、古物采集等法政府至今未曾规定，决定该会此后决作永久机关。（其）消极的方面（是）：严重（密）监视外人，不准（其）随意购买或假名窃取及发掘我国古物及学术上希（稀）有之物品；积极的方面（是）：互相补助，采集保存学术上之材料，更自动联合开始举办科学的

采检、发觉等事。”〔注一〕同年三月九日，北京各学术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坚决反对斯文赫定这一无视我国主权，“希图掠夺我国古物及科学资料的不道德行为”。〔注二〕

斯文赫定闻讯后，立即四处奔走，疏通关系，并重新拟定了考察办法，拜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转交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希求妥协”。为此，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召开第三次联席会议。会上“议决赫定所拟办法不能容纳，除去函谢绝外，更谋进一步之反对方法”。因此，斯文赫定遂于三月十四日“宴请各学术团体代表，各代表均托故未去。”〔注三〕后经斯文赫定多次斡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方派刘半农为代表与之晤谈，双方经过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合作办法”明文规定：“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为考察西北科学之事物，容纳斯文赫定博士之协助；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此特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该团所进行的一切事务；参加考察团的中外团员均由理事会委任；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察，如有违反者，应责成中国团长随时制止；在考察中所采集之文物统须交与中国团长或其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归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等等。

刘半农与斯文赫定所订的《合作办法》共十九条，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经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第九次大会议决，并推举大会当日执行主席周肇祥为代表与斯文赫定逐条研究，双方认为满意之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字。签字的中方代表是周肇祥，瑞方签字的是斯文赫定。

上述这个《合作办法》的签订，使中国知识界大为振奋。刘半农先生戏称之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大公报》评论说：“尤有一精采之处，即该协定之解释，须依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是由周肇祥、徐协贞、刘半农、常福元等为理事，瑞典驻京公使为名誉理事组成的。

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二十七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瑞方十七人。

中方团长为徐炳昶，字旭生，河南省人，四十一岁，系北京大学西洋哲

学史教授。团员为：袁复礼，字希渊，北京人，三十四岁，研究地质、考古及绘图；黄文弼，字仲良，湖北省汉川县人，三十三岁，研究考古学；丁道衡，亦字仲良，贵州省织金县人，二十八岁，研究地质及古生物；詹蕃勋，字省耕，安徽省婺源县人，三十五岁，研究地图学；龚元忠，字狮醒，为考察团的摄影员，团员中还有考察团的四名气象学生，他们是：崔鹤峰，字皋九；马叶谦，字益占；李宪之，字达三；刘衍淮，字春航。这四名学生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而登报招考的。考试科目为：外语（英、法、德、俄语任考一种）、物理、数学。外语以对话流畅为主；物理、化学则按大学预科毕业程度出题考试。三十名应考者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参加了考试，初选八名，又经身体检查及复试，录取了上述四名。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Sven Hedin），六十三岁。团员为：兰理训（Larson，中译为拉尔生），瑞典人，为队长，负责旅行中的事务；郝默尔（Hummel），瑞典人，为考察团医生兼作人类测量；那林（Norin），瑞典人，研究地质并作图；贝格满（Bergmen），瑞典人，研究考古学；哈士纶（Haslund），丹麦人，为副队长；郝德（Haude），德国人，为考察团气象主任；米纶威（Mulenweg），德国人，为考察团会计；李伯冷（Lieberenz），德国人，为考察团摄影员和电影员；钱默满（Zimmerman），德国人；海德（Heyder），德国人；韩普尔（Hempel），德国人；马学尔（Marschall），德国人；华志（Walz），德国人；狄德满（Dettman），德国人；马森伯（Massenbach），德国人；冯考尔（Vno Kaul），德国人。另外还有瑞典人生瑞恒（Soderbom），随团料理事务并做翻译工作，名不列团员中。此外，为考察团所用勤杂人员、厨师、向导和采集员等，则根据需要随时雇用，人数多少不定。

西北科学考察团所需用的经费，绝大部分是由斯文赫定资助的，一小部分是由中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募捐筹集的。首次捐款的单位和个人有：交通部路政司一千圆，叶恭绰五百圆，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二百圆，历史博物馆馆长徐协贞一百五十圆；此外还有加入协会的各机关或捐五十圆、或捐一百圆，共捐款两千多圆，统交中方团长徐炳昶作为考察团的路费。

## （二）

经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议定，西北科学考察团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从北京出发，前往新疆之天山南北，但因“瑞典方面所请之护照尚需办理种种手

续,并须由教育部出函证明”,所以将出发日期延至五月九日。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十二点四十分,考察团由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乘专列火车西行,在西直门火车站乘车启程的有:中方团长徐炳昶和团员黄文弼、丁道衡、詹蕃勋、黄元忠、崔鹤峰、李光之、马叶谦、刘衍淮等九人(袁复礼因事没有同行,后于五月十三日赶到包头);瑞方团长斯文赫定和团员郝默尔,以及斯文赫定在北京所雇佣的随团差役王殿臣和三个采集员等六人,全团一行十五人所乘的火车于五月十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到达绥远省会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在火车停车二十分钟的时间里,同行的全体团员于车站上高兴地碰见了先期到达归化为中国团员购买中国食品的那林。五月十日下午两点五十分,火车继续前行,于当日下午七点三十分到达包头火车站(今包头东站)。早在三月二十四日就在包头等候的考察团团员韩普尔和郝德等八个德国人,以及瑞典人贝格满和一位姓施(H·sze)的翻译(施同一位德国女子结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到车站迎接。考察团一行十五人下车以后,由团员郝默尔带领几个团员压运着运银币的牛车,其余的团员骑着骆驼在前头带路,一道向城内出发,走了整整十五分钟,才到了包头(今东河区)的南门,在城里又走了一段很远的路程,才到了上年冬天在城内租定的住所。此时,“时已黄昏,热闹街上的铺子照耀着点点灯光。尘土街道上还很热闹,许多兵士在这里蜂拥着,是山西省督军阎锡山派来守城的。鼓声震荡,全城装满了兵士。”〔注四〕考察团一行人等到达驻地的时候,拉尔生庄严地站在驻地院子的门前,对考察团表示欢迎。斯文赫定在向驻地内的蒙、汉族服务人员表示问候之后,在拉尔生和马森伯的引导下,在驻地转了一遭,进行巡视。

考察团在包头(今东河区)的住所有三个院落:第一院落较小,院内一排三个房间,一间小一点儿的房间作为斯文赫定的宿舍,其余两个大房间作考察团的餐厅和会议室;第二个大一点儿的院落的一部分是考察团其他团员的宿舍,另一部分是仓库,其中堆放着总重量达四十吨的行李、物品和仪器箱子;登上一个小丘便到了第三个院落,在那里饲养着购买来的骆驼。在这两个大院落的中间是气象测候所,其中有郝德安设的许多精密仪器,“在测量着风候的喜怒。”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下午,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到包头县县公署会见了包头县县长李尊青(字少白,三十多岁),经允许,考察团在

包期间，可以在近郊进行考古、地质和民俗等方面的考察活动。因此，考察团的中方团员曾到包头（今东河区）城外的一些地方考察。所到之处有：二道坝子、开周窑子、老包村、刘保窑子、西脑包、井儿坪梁和尖坪等地，并曾到黄河边上用望远镜观望对岸鄂尔多斯境内的蒙古庙。他们在包的考察所得是，黄文弼在二道坝子道右一小阜附近高兴地找到一件石斧；徐炳昶和黄文弼、詹蕃勋在去老包村的途中徐炳昶也得了一件石斧；此外还考察了包头地区（今东河地区）的民俗等。

考察团在包头（今东河区）共住了九天，主要是购买旅行中所需要的物品、等候在北京出发时没来得及装上火车的四个箱子的到货和筹集旅行中所需用的骆驼。在北京出发前，斯文赫定已派那林、华志和马学尔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来购买食品，并约定用六十峰骆驼把食品运到茂明安旗的百灵庙；同时派哈士纶和李伯冷到张家口北六十公里的哈龙乌苏地方的瑞典圣公会去取著名蒙古研究家、考察旅行家安得斯（Andrews）卖给考察团的六十五峰骆驼，也约定在百灵庙附近会合。

在包头，斯文赫定辞退了那位姓施的翻译，决定由生瑞恒作翻译兼管总务。生瑞恒（Herr Soderbom），二十二岁，出生在中国，是归化城牧师斯文逊（Svensson）的儿子，汉语和瑞典语都说得好，并且会说蒙古话。在此之前，斯文赫定曾于一八九七年二月来过包头，那时是住在瑞典牧师黑勒彼克（Helleberg）家。

如前所述，考察团的全体成员约定在百灵庙会合。但是，因为在出发时必须把箱子、篷布、水桶、布袋和行李等四百多件，共重四十吨的器物全部装载在二百多峰骆驼的背上，所以原来居住的院子就容纳不下了。因此，考察团又在包头（今东河区）的西北门外租了一所大栈房，并从五月十六日起，便把考察团所有的装备全部搬运到西北门外的大栈房里，以待出发。五月十八日，斯文赫定花一千六百五十圆钱租赁的二百二十峰骆驼到达包头。至此，考察团算是完成了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之所以要租赁骆驼，是因为在中瑞双方的协议签订之前，斯文赫定不敢预先买下大批的骆驼；而在协议签订之后派出去购买骆驼的人又已约定在百灵庙附近会合。因此，现在“只好租赁骆驼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八点十五分钟，考察团从包头（今东河区）出发，前往百灵庙。当时在包头出发的考察团团员，以及采集员、厨师和杂役

人员等共约五十多人，拥有骆驼二百三十二峰，还有“驻包军队的司令官为考察团配备的三十名骑兵”做卫队。“中国人、瑞典人和德国人骑着骆驼排成纵队，他们身上背着长枪、望远镜和照像机，在骆驼的黄皮鞍褥上放着或捆着暖水壶、干粮、日记本、手枪和子弹以及其他什物，华美而漂亮，八箱重银币驮载在四峰肥壮的大骆驼背上，放氢气球的三十八根钢管子用毛毡和干草捆在十五峰骆驼背上。”考察团的骆驼队浩浩荡荡，连绵数里，十分壮观。斯文赫定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这“简直不能说是一个旅行团，是十个或五个骆驼联络而成的小团成了一个火团。在亚细亚过的这些年里，见过无数的旅行团：我自己的；从阿拉伯和美索布达米（Mesopotamien）到甘肃和蒙古的商贾的；朝圣慕的僧侣的；波斯王到依尔布斯（Elburs）的旅行团；欧战时土耳其和巴比伦在雅得亚高原和西奈（Sinai）沙漠间的独峰驼旅行团。而在我亲眼见到的，我这一队算是最尊荣的了，是多么华美的外观啊！——这样灿烂、庄严、重大的一列远征队。太阳这时已上山头，在给这幅图画加上新的阴影，轻淡地映在地上，在作绿色的光闪。”〔注五〕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骆驼队从包头（今东河区）出发西行，经过井儿坪梁、二道沙河、大仙庙、毛鬼神窑子、公忽洞，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两点钟到达昆都仑口子（又名七爷口子，即前口子）宿营。这时虽然还有六位团员未到，但在宿营地上已搭起了十六个帐篷。一排兰色的蒙古式帐篷上缀着瑞云和“五福捧寿”的图案（即中间一个“寿”字，周围环绕着五只张开翅膀的蝙蝠，象征福寿绵长之意——编者注）。在这一簇帐篷中间，一座高大的绿色双层英国式帐篷，用一块不落地的遮日布遮蔽着，使帐幕的前部构成一道回廊，非常壮美，帐篷里面用木板和高凳搭成一张大桌子，桌子周围摆上折叠椅，作为考察团团员集会的场所。（考察团到达百灵庙驻地以后，因为人员和帐篷逐渐增多，所以斯文赫定便将宿营地称之为“幕城”，把“幕城”中的最大通道称之为“马可波罗街”。由此可见当年考察团驻地壮观情景之一斑了！——编者注）。

当帐篷搭好之后，徐炳昶、黄文弼、龚元忠、崔鹤峰、马叶谦、刘衍淮、李宪之等人，即前往在驻地西边约一里远的昆都仑召参观。入夜，由两个瑞方团员和四个骑兵士兵作警卫；军队通知全体人员不准离开营地，以“防备绑票，或是在转来时误中枪弹。”

五月二十一日早七点钟，在前口子驻地启程入山，沿昆都仑河河谷北



行，谷中村落甚稀，而山势颇佳，行二十里到沙坝子。途中时有国民军退却时遗留的炮弹、汽车和死马骨骼等。又走二十多里以后，由昆都仑河口子出山，下午两点钟到王营塔五分子宿营。三十名骑兵卫队在这里换岗后返回包头，由另外二十名骑兵接替护卫考察团。二十二日早七点钟，由五分子启程。途经榆林塔子、猜西科格峪、七分子、公义明、二滞泥沟、六分子、万利号等地，到脑包店宿营。二十三日启程三、四里后，入脑包山，经六叉湾沟（又译作牛肠湾沟——编者注）、架竿儿旗沟、察罕音格，到红瓦地公宗宿营。二十四日过兴顺西，再前行路右为巴彦脑包，又前行路左边有一大村落叫做同兴公，路右边也有一个村落叫做四诚公，复往前行路左是三舅子格巴，后又经公众塔、二极土、黑教洋堂，到白音玻勒干（又译为白云布拉克——编者注）宿营。二十五日，经乌叶儿图河（又译为呼皆尔图河——编者注）、库列迭拉苏而入草地，又前行四、五里到达艾布干河，河东南有一小村叫做崔家滩。因为这里有水，所以虽然还不到中午便倚河畔宿营了。二十六日，过谷崖、谷延，到达明安加沙（又译为“明安扎萨克”即茂明安——编者注）才十一点钟，但因由拉尔生派出去打听到归化买食品的那林和到哈龙乌苏去取骆驼的哈士伦等人下落的马泰喇嘛还没有回来，所以便倚阿木塞尔河宿营了。二十名骑兵卫队到此完成了护卫任务，返回驻地。晚上，马泰喇嘛回来报告说，那林和哈士伦等人驻扎在东边三十里的地方，那里水草很好。于是斯文赫定决定明天到那里会集。五月二十七日清晨，当考察团拆了帐篷正准备行装的时候，忽然洪动说，带队人的一匹白马跑掉了，驮手们四出寻找，因此，又在原地搭起了帐篷住下。晚间，斯文赫定又说，在两边三里多找到一处水草丰茂的地方，决定明天移居到那里去等候那林和哈士伦等人的到来。五月二十八日，驻地西移，约行一小时，到达阿木塞尔河上游的阿木塞尔河脑包附近宿营。

阿木塞尔河脑包东距百灵庙八十里，周围有小山环抱，中有清溪一道，并多鱼、蛙、藻类，水草十分丰茂，可称得上是草原上的风水胜地，而其西面地势平坦，是适于长时间驻扎的好地方——这已经是考察团的第八个宿营地了。这时正值初夏，虽然气温不超过二十七摄氏度，可是帐篷里的温度却高达三十八摄氏度。然而到了夜间，帐篷内外才只有一至二摄氏度。但是“因为风速在每秒二十米以上，所以经常有清凉的微风，用不着怨恨天热”。为了避免暴风雨的袭击和防暑，考察团把帐篷排为一列，帐篷门一律向南开

着，形成一条大街，非常庄严。

考察团之所以要在这里长时间地住下来，主要是因为所需要的骆驼还没有购买齐备。因此只好在这儿等候一段时间；同时因为这里有肥美的牧场，可以把已买的骆驼喂得肥壮一些，以便日后长途跋涉。

考察团到达这个驻地（五月二十八日）刚刚吃过早饭，哈士伦和李伯冷带着他们从张家口北哈龙乌苏安得斯那里买来的六十五峰骆驼赶来了。下午四点钟，“那林的骆驼队也赶到了，虽然六十峰骆驼只剩下五十一峰，但仍不失为很威风的一队。那林披散着长发，被晒得黑红的面颊下边缀着波纹的胡须，象个野人一样，徒步走在骆驼队的最前头。”又过了一会儿，华志、马学尔和新团员（翻译）生瑞恒等人也赶到了驻地。至此，考察团的全体团员和一些勤杂人员等均已全部到齐，共计六十二人。其中：中方团员十人，瑞方团员十八人（包括生瑞恒），还有采集员、厨师和伙役等三十四人。这时，驻地里搭设的帐篷有二十一顶，形成了一座“幕城”；考察团的全体团员第一次在会议大帐的会议桌周围聚齐了，实现了从哈龙乌苏、归化（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三个地方会集在百灵庙附近的计划。

考察团在驻地安顿下来之后，部分团员即参观了阿木塞尔河脑包（五月二十九日）和百灵庙（六月二日至三日）：

阿木塞尔河脑包的设置比较完备，其最高处是一大堆石块，上积松枝。脑包东南方向的前边有一列积石，中间插一柄带铁环的铁叉，两旁立了两块石头，再外边是两根悬挂经幡的立木。脑包的四隅各有一列小石块直达山下。

百灵庙与昆都仑召不同，是清一色的汉式建筑，在正殿里供奉着过去、现在、未来三尊佛像与内地寺院略同，前殿供有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像，两旁立着八尊佛像，前边还有两尊面貌狰狞的佛像。庙里的主持僧叫做齐木喇嘛，在主持僧之下，品位最高的是大喇嘛和“董哈旅”。庙里有一活佛级大喇嘛叫做竹尔罗斯喇嘛，另有一位七龄活佛叫做康蒲喇嘛。据说在大喇嘛之下学望最高的是百灵喇嘛。

一九二七年（兔年）七月十六日正值竹比山·禅巴的庆节，百灵庙从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大庆三天，热闹非凡，就连达尔罕贝勒王以及王子杜木罗南齐尔都参加了这一盛会。考察团参加庙会的部分团员也“被当作贵宾给予了最礼貌的款待。特别是大喇嘛竹尔罗斯活佛非常客气地招待了考察团代

表,并为考察团代表的安全颁发了特别命令。考察团代表给庙里送了五十圆的敬仪,同时给喇嘛们送了一些闹钟,小刀等礼品,并拍摄了一千一百米的庙会影片。”当考察团代表向活佛辞行的时候,活佛要求把在庙会上拍摄的影片送给他,并说要给考察团写一封对旅程很有用的介绍信。事后考察团特派出一个专使给他送去了照片,和一些别的馈赠,同时取回了大喇嘛为考察团所开的西行“神照”。

六月五日,茂明安旗旗长派游缉队队长带三个士兵前来考察团驻地回讯,经袁复礼与之交涉后,这位旗长代表表示:“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掘地,恐怕惊犯后土和山神,尤其不要扰乱山顶上的鄂博神,以免降下灾祸来。”次日,考察团派袁复礼和华志回拜了茂明安旗旗长——一位慈祥的蒙古老人,旗长对考察团的代表进行详细讯问,并说要亲自到考察团驻地回访。六月十二日,一位戴着大眼镜的、比较老的军官(徐炳昶记为:他自称营长,名叫满特耶勒——编者注),带领三个士兵来到考察团的驻地,以旗长的名义回拜了考察团。考察团用烟、茶款待了这位旗长代表,并为他拍摄了一卷影片。

考察团的部分人员(郝默尔、李伯冷和哈士纶等)在初到百灵庙附近的另一驻地时,还拜访了座落在百灵庙东北之贝勒王府,谒见了达尔罕贝勒王。“贝勒王是位很和气的人,好说笑话,热情地接待来客。拜谒的人们都给他送些杏子、点心,并敬献哈达等礼品。”六月二十日,考察团又派黄文弼到王府,谒见了达尔罕贝勒王,请其将劳伦苏木残碑移至百灵庙保存。至七月二十日,“考察团给达尔罕贝勒王送信的人回来时,带回贝勒王回赠的点心一匣、哈达一幅、椅毡一件,回信一封。信中问考察团有没有北京、汉口、上海的风景画片。”

六月二十六日,考察团在驻地欣赏了游动戏班子演出的四出二人台,并拍摄了影片。

自从考察团到达阿木塞尔河脑包驻地以后,便不停地进行着气象观测。考察团的气象测候所里安设着温度表、气压表和湿度表等,用以测量气温、气压和空气中的湿度。测量和观测云彩的高度、形态和运动方向,测试了风速和风向。为此郝德在不断地放风筝和放氢气球。到六月二十二日,即已放出了测试风向的第十七个氢气球了。从这次开始,在氢气球的下面缀一卡片,卡片上写着“请拾得的人将拾得的日期、地址、附近人口的疏密及距离

大路的远近详细记下，并将此纸一同寄到北京清华学校收讫。该校即当寄回报酬十圆无误。”同时决定自此以后，每次放氢气球都这样做。

考察团在阿木塞尔河脑包驻地逗留期间，考察团的部分团员还在附近作了一些地质、考古和民俗方面的考察。其中主要的有：

黄文弼在百灵庙南四、五十里的地方考察了秦长城。他顺着长城走了二十多里，认为这里是战国时代接续赵长城和燕长城的一段秦长城。同时发现一座汉代古城并拾得一些带花纹的古代瓦片。采集员靳士贵考察团曾经住过的地方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新石器时期的屋地，并用两天半的时间收集到新石器时期的古物一千零四、五十件，其中大半是作工精美的石刀、石斧和陶器。为此，靳士贵受到了考察团的奖励。袁复礼和采集员白万玉在距驻地三十六里的地方也发现了石器和化石骨节。在此期间，那林将驻地周围测绘成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斯文赫定绘制了一幅西行路程图。此外，考察团医生郝默尔在给考察团人员治病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蒙、汉族居民治病。并在治病的过程中进行了人种测定和血液检查。与此同时，考察团还收集了一些地理和民俗方面的材料。

考察团在阿木塞尔河脑包驻扎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购买西行考察所需要的骆驼。截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考察团共购买了二百九十二峰骆驼（不包括死了或跑掉的九峰，最多时达三百二十峰——编者注）。大批购买的价格是每峰为八十八块鹰洋；部分上等骆驼每峰为一百零五块至二百块鹰洋。在考察团西行出发之前，虽然“茂明安旗的地方长官并没有要求赔偿，但是考察团为了感谢地方为骆驼提供了肥美的牧场而给地方政府送去了一百块钱和一些小礼品，并对为考察提供劳务的蒙、汉居民发了酬金和奖赏。为此，考察团的会计米纶威在整天忙碌着。”

当考察团所需要的骆驼还没有完全购买齐备（只有二百一十一峰骆驼）的时候，考察团便开始筹划启程。全团分为三队：北队由那林为队长，同行人员有：海德、马森伯、贝格满、丁道衡和采集员靳士贵，以及四个伙役（其中有两个蒙古族人）、一个厨师，用二十七峰骆驼，携带三个帐篷和六个星期用的粮食；南队由袁复礼为队长，同行人员有：黄文弼和采集员庄永成、白万玉，以及四个伙役（其中两个蒙古族人），带十五峰骆驼和四个星期用的粮食（后因故，黄文弼带着庄永成去考察秦长城）。徐炳昶和斯文赫定亲率总队居中路，南北两翼分队均在距离总队二十公里的范围之内活动，

并经常与总队保持一定联系。总队部要求这三支队伍均以嘎顺淖尔为目标同时向西进发，并约定途中在三德庙（又译作善丹庙——编者注）地方聚齐。实际上，因为考察团各队的驻地总是要选择在有水和有牧场的地方，所以常常是两队或三队聚在一起宿营。即或三队不在一起宿营，或在考察途中活动时，也常有骑着连马都追不上的“快脚骆驼”的蒙古族伙役来作通信联系，以保持两翼队与总队的互相呼应。

因为北队担负着在考察行程的沿途以最大的准确性去测绘地图的这一最为繁难的任务，所以必须先行启程。为此，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北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由阿木塞尔河上游之阿木塞尔河脑包附近的驻地先行出发（南队于七月三日出发，总队延迟到七月二十二日才启程，而气象测候所的留守人员直到七月末才启程。——编者注），开始在大路北侧进行测绘。七月二日开始上路，向东北行三十里到达白音布拉克宿营。白音布拉克（汉译为富泉）“尽为花岗岩之露头，地势甚为平坦，略有丘陵起伏而已。惟北部山岭名曰白云鄂博向东西蜿蜒，颇为壮观。”〔注六〕丁道衡记述说，白云鄂博原名白云博格都（又译作巴彦博克图——编者注），其蒙古语意为富神，因其山顶上有著名的“鄂博”（“鄂博”是当地蒙、汉居民祭祀祈福的地方），故当地蒙古族居民“称此山皆曰‘白云鄂博’”。后来，丁道衡从参谋部的地图上查知此地似为“喇嘛托落海”，其蒙古语意为黑山头。〔注七〕七月三日早晨，丁道衡背负地质袋前往白云鄂博考察，于是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即今白云鄂博主矿——编者注）。丁道衡在自述发现时说：“负袋趋往，甫至山麓，即见铁矿矿砂沿沟处散布甚多，愈近矿砂愈富，仰视山巅，巍然屹立，露出处，黑斑灿然，知为矿床所在。至山腰则矿石层累迭出，愈上矿质愈纯。登高俯瞰，则南半壁皆为矿区。”〔注八〕

七月四日，丁道衡将此项发现信告总队。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这样记述：“五日接丁仲良（丁道衡，字仲良——编者注）信，报告发现白云博格都山为巨大铁矿。据说：‘矿质虽未析，就其外形而论，成分必高。且矿量甚大，全山皆为铁矿所成。……以衡（丁道衡自称——编者注）推测，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全矿皆现露于外，开采极易。’然则此地将来要成中国一个很大的富源。”〔注九〕后来，当斯文赫定同徐炳昶谈及白云博格都铁矿的发现时，徐炳昶高兴地对斯文赫定说：“我们早就梦想从包头到白云博格都（当时记为巴彦博克图——编者注）建筑一个（条）铁路，使

中国得着千百万的利益。”后来，考察团总队派詹蕃勳到白云鄂博绘制了一副二万分之一（发表时为三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丁道衡根据此图开始对白云鄂博主矿的地质情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并且在矿石和围岩中采集了岩矿标本。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丁道衡匆匆结束了对白云鄂博主矿的初步调查，随西北科学考察团北队一起，前往善丹庙（一译为“三德庙”——编者注），经海流图，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与考察团总队在额济纳河会合。

### （三）

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包头开始，对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约四百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高山、盆地、沙漠、戈壁、丘陵、河道、湖泊等自然地理状况进行了考察，并绘制地图，建立测候所，成绩卓著，其中不乏震动世界的重大发现。

白云鄂博铁矿主矿的发现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当年丁道衡在其报告中指出：“矿床因断层关系，大都露出于外，便于露天开采；且矿床甚厚，矿区集中，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唯距出煤之区如大青山煤田等处，距离稍觉过远，运输方面不能不精密计划，然此非大困难之事，唯资本稍须增加耳。苟能由该地修一铁道联接包头等处，即可与平绥路衔接，则煤铁可积于一地，非特铁矿可开，大青山之煤田亦所利用，实一举而两得其利。且包头为内地与西北各省交通之枢纽，四通八达，东行沿平绥铁路（今京包铁路）经察哈尔（今张家口一带）、山西直到北平（今北京），南下顺黄河河套可达陕西、河南等省，西行经宁夏、甘肃而到新疆，北上遂入外蒙（古）而达俄（苏）境，运输甚便，出路甚多。苟能于包头附近建设一钢铁企业，则对于西北交通应有深切之关系，其重要又不仅在经济方面而已。”〔注十〕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的序言中说：“丁仲良在茂明安旗内白云博格都（富神）山所发现之巨大铁矿，或将为我国北部之汉冶萍。”今日包钢和包头地区的发展，已经充分证实了老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科学预言。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其他成果是：

一九二八年十月，袁复礼在新疆挖掘的七具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被法国一家报纸渲染为“七个活恐龙在新疆发现”。袁复礼在乌鲁木齐以东博格达山至天山北孚远一带挖掘出大量爬行动物化石，较完整的有七十二具，其中有七个新品种，另外还掘到一具宁夏结节绘龙。在这之前，只有外国人在中国零星发现过几块白垩纪的恐龙化石。这次是中国科学家在自己的国土上短时间内发掘如此之多的二、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比过去的发现提前了一亿多年！这些发现使中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跃入一个新阶段。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教授由此而荣获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徐炳昶教授也以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荣获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注十一〕

瑞典团员贝格满和我国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挖掘的一万多枚居延汉简，同样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这批汉简“按协议运回北京，由北京大学教授兼故宫博物馆副馆长马衡及贺昌群、余逊、劳干等分别作了部分考释，贝格满博士也因研究这批汉简携眷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一九三七年北京的沦陷使这些国宝面临毁劫的恶运，沈仲章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辗转运往香港以后又被运往美国，现存台湾。劳干先生因研究这批汉简的成就而在一九五八年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时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注十二〕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河流域考察了高昌等诸古代遗址，在雅尔湖附近发现古墓葬群，得墓表一百三十多方、陶器八百多件，为研究古高昌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尔后，他多次入疆，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变迁和该地区古代诸国的兴衰及“丝绸之路”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法国籍团员郝德博士主持的气象观测项目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全部观测纪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及高空观测资料两大本（德文），成为此后二十余年中亚气象的权威性资料。”〔注十三〕

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这次科学考察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六名青年学生（马叶谦中途故去，崔鹤峰中途返回包头建立测候所，补胡振铎、徐近之）中，李宪之、刘衍淮二人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被斯文赫定博士推荐到柏林大学深造，均获得博士学位。“李宪之运用自己在新疆的观测资料，在对东南亚寒潮途径的研究中，提出南北两半球气象相互影响的突破性见解，当

时虽不为大多数气象权威所接受，却被二十多年后的卫星云图所证实。”

〔注十四〕刘衍淮抗日期间服务于空军，后去台湾从事教育工作，被誉为台湾气象泰斗。胡振铎在一九三二年考察结束后应国际极年纪念，去四川峨眉山筹建高山测候所，任该所主任。徐近之此后多次去西北边疆，建立了青藏高原第一个气象站，是我国深入西藏工作的第一位科学家，也是历史气候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注十〕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是获得了一批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同时充分证实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自强、自信、自立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非凡的聪明才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批驳了某些欧洲人所说的：“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这一蔑视中国人的滥调。〔注十六〕就连斯文赫定都钦佩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渊博知识和“为科学尽责，为祖国增光”的精神。〔注十七〕斯文赫定认为：中国的“一切参加者都聪明而有学识”，“科学的能力和知识十分充足”。“中欧间的这种善意的、友谊的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快愉的泉源；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有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若只是我一人或者同着一群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二千一百年前在噶顺淖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现在我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我说中国团员对于我的考察事业增加了无上的价值。”〔注十八〕

西北科学考察团于一九三三年五月结束了考察活动，历时六年，比原定计划延长了四年。

〔注一〕 引自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晨报》第六版——《京内学术团体联合反对瑞典远征队》。

〔注二〕 详见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晨报》第六版——《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

〔注三〕 引自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晨报》第六版——《各学术团体积极反对瑞典远征队。》

〔注四〕、〔注五〕 均引自斯文赫定著《长征记》。

〔注六〕、〔注七〕、〔注八〕均引自丁道衡《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

〔注九〕 引自徐旭生《西游日记》。



【注十】 引自丁道衡《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

〔注十一〕、〔注十二〕、〔注十三〕、〔注十四〕、〔注十五〕均引自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徐恒、王忱著  
《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

〔注十六〕引自徐旭生《西游日记》。

〔注十七〕、〔注十八〕均引自斯文赫定著《长征记》。



# 包钢建设初期设计工作片断

顾 钧

我珍藏着一张褪色发黄的照片，上面是包钢设计院现场设计室炼铁工地组的全体人员和设计院的几位领导，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包钢一号高炉建成投产前夕，在炼钢厂的办公楼屋顶平台上的留影。后面衬托着一号高炉的全景。当时，除了几位领导同志之外，设计人员几乎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看上去一个个英俊洒脱，风华正茂，神态中还流露着几分豪情。现今，这张照片上的人都已年过半百，有的人已经体态龙钟，两鬓斑白。其中已经有不少人在参加了包钢的建设之后，又走向祖国其他建设或生产岗位上去了。看着这张照片，不禁引起许多回忆，如同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一样，希望伴随着坎坷，叹息中夹杂着甘甜。快三十年了，已逝去的青春年华，有多少耐人寻味的往事。

## 一

一九五八年四月，是我们来包头的第二年。继包钢机修工程施工之后，包钢的主体工程——一号高炉和焦化厂的三、四号焦炉工程，相继破土动工了。设计院把工地工作的重点立刻转移到炼铁和焦化两个工地上来，我们工地工作组的一部分人员，参加了工地上的破土动工仪式。

焦化厂的施工设计，是国外提供的，现场设计管理工作，按分工应由鞍山焦化耐火设计院负责。由于当时包钢设计处已经并入设计院，并有焦化专业人员。因此，把焦化工地的设计管理工作承担起来了。

包钢炼铁工程主体部分的施工设计，全部由国外提供。其中包括高炉本体、料仓栈桥、卷扬机房、上料斜桥、热风炉、煤气除尘和煤气清洗系统、出铁场等。完全按苏联设计的图纸施工。我们要做的工作是现场设计服务，管理图纸，解释图纸内容或解决存在的问题，还有一项工作是监督

施工单位按图纸施工。苏联专家特别强调，设计是施工的法令，把这一工作称之为“设计监督。”

除炼铁主体工程之外，有多项辅助工程是国内设计院自己设计的，有铁水罐修理库，翻泥机房，供水泵房和各种动力管网和运输设施等。铸铁机房原采用国外施工图，后来国内修改了。

整个包钢炼铁工程技术复杂，工程量大，质量要求高，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工程，我们在工地上参加处理问题，都极为慎重。包钢公司的总经理杨维同志常常到工地上来，叮嘱我们要努力把住技术关，对国外设计的意图一定要去弄清楚，没有吃透意图，不能随便处理问题，更不允许任意修改国外设计。在工程质量上不得丝毫让步。杨维同志素来以作风严厉著称，但我感到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设计人员，还是比较客气和信任的。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设计人员，的确没有多少经验，唯一的方法是努力去学国外设计，把图纸和实物对照起来学。逐渐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经过一号高炉施工，不少同志逐渐成了行家。炼铁专业的洪义光同志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工地上的“活图纸”，施工安装单位的得力参谋。

## 二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号高炉基础混凝土进行灌注，1513立方米容积的高炉基础，混凝土工程量为1740立方米，其中埋置大量而且复杂的钢筋网，浇灌前现场工程指挥部组织了质量监督部门和设计人员，对绑扎好的钢筋进行了核对，然后才允许浇灌。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全部混凝土要求水平分层连续一次灌注成。施工单位事先作了周密的施工组织设计，一切准备就绪，浇灌于六月十四日上午开始。包钢公司副经理刘力子同志亲自参加现场指挥工作。我们设计工地工作组的土建人员在整个施工过程中配合这次施工。我和土建工程师姜三钢参加了夜间值班，亲临这一十分壮观的施工场面。工地上几百工人来往有序，有条不紊，搅拌机，震捣器轰鸣，混凝土从“象鼻”漏斗倒下去的声响此伏彼起，加上人声鼎沸，组成了一幅宏伟的图象和声响，使人心情振奋。到了夜里，灯火通明，更为壮观。当时虽已六月天气，半夜还是相当寒冷，我在工地值班，后半夜还用得着羊皮大衣。但在浇灌现场，却是热火朝天，工人们忙得满头大汗，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建设单位的领导干部刘力子同志，几乎我每到现场都能看到他头戴柳盔

帽，身穿蓝布工作服，脚穿长统胶皮鞋的魁梧身影，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想，有这样身先士卒的领导，就一定有能打胜仗的队伍。

浇灌工作紧张持续了22小时半，1740立方米混凝土按计划、按设计浇筑完毕。当工地上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似乎听见自己在说，我们成功了！

七月，我们又参加了一号高炉热风炉基础的浇灌。

### 三

公司提出了在一九五九年“六·一”出铁，“七·一”出钢的奋斗目标。

九月，高炉炉体金属结构开始安装。工地上的工作日趋紧张。

当时除了炼铁高炉本体工程之外，外围工程量也是很大的，如有为高炉送风的蒸汽鼓风机站、为高炉安全备用的3600立方米水塔、临时上料措施、以及供电、供排水、煤气、蒸汽管道、铁路公路等都要施工。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设计院加强工地的工作领导，成立了现场设计室，固定在炼铁工地上班的人增加到三十多人。除此之外，经常下现场的设计人员多达一百余人，昼夜配合施工。那时候从设计院到工地主要靠自行车或步行，加班不给加班费，也从来不发奖金，靠的是信念和热情。

经过各方面一年的努力，一九五九年九月，包钢一号高炉工程即将竣工，面对着我们付出辛勤劳动的巨大工程，感到无比兴奋。在高炉出铁的前夕，大家一起在炼铁厂办公楼屋顶平台上，留下了历史性的照片。

### 四

按照国内外设计分工协议，包钢炼钢工程施工设计由国内承担。

一九五七年末，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成立以后，就着手炼钢施工设计的准备工作。当时我负责包钢工程设计工地工作，对炼钢设计情况亦十分关心。

按照包钢初步设计决定，包钢炼钢厂采用三座250吨平炉和两座500吨平炉，有国外标准图可参考。在施工图设计时，决定全部改成500吨平炉一共四座。在车间平面布置上要作一些修改，从剖面上看，改动并不大。

500吨平炉炼钢车间的设计，我们过去没有做过，无论从平炉容积、吊车起重能力和厂房负荷各方面都是第一次接触，这项设计任务无疑十分繁重。设计院对待这项设计十分慎重，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谭振雄亲自参加领导

这项设计，具体组织工作有刘纯悛工程师负责，史星三院长一再嘱咐土建结构设计人员要对主厂房认真地做排架分析计算。炼钢工艺设计人员在宗之楠、雷家源两位工程师领导和主持下，全组加班加点精心设计，为各个配合专业编制了十六大本内容完整的设计任务委托资料，为设计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土建专业在赖宝翼工程师主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工作，作完了炼钢主厂房排架分析计算。充分掌握了厂房结构各部位的受力情况，并参考国外标准设计，作出了炼钢厂施工图。据设计院党委在一九六二年总结包钢工程设计中记载：“……由于设计人员思想革命和设计方法革命的结果，大大提高了设计工作效率，包钢炼钢车间设计大跃进前需一年以上时间，在五八年第一次设计时仅用了7800工日，五个月的时间，而在五九年重新设计时仅用2700工日，两个半月时间，……”充分反映了当时设计人员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热情。

炼钢工程施工在一九五九年炼铁工程施工的同时已经着手进行并逐渐展开。在一号高炉建成投产之后，设计院在炼铁工地留下一部分人继续配合二号高炉施工外，把现场设计工作的重点立刻转移到炼钢工地上来，在炼钢工地成立了工地工作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炼钢工程成立综合工地，我们代表设计一方参加了综合工地的工作。

当时全国是一片大跃进的局面，是“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开帐”的年代，照说对包钢建设是十分有利的。但毕竟我国国力有限，全国重点项目较多，建设需求大大超过了当时我国工业生产的承受能力。像包钢工程这样的计划内的重点工程项目，无论在材料供应和设备供应方面都十分紧张，这种情况在炼铁工程中已经出现，到了炼钢工程施工紧张阶段，问题更为突出。一九五八年六月，包钢公司决定建设“中包钢”，想由“中包钢”生产一些建筑钢材，缓和建材供应。而实际上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反而分散了力量。

我们在工地上每天都能接到施工单位提出的“5号钢没有用3号钢代行不行？”“螺纹钢没有可不可以用元钢代？”“没有镇静钢用沸腾钢代行不行？”……这一类问题。高标号水泥也奇缺，设备供应也是如此，马达、水泵、电练供应都紧张。在一九六二年设计总结中记载：……许多设备订货未定，设备资料没有而基础施工图先发，设备来了再重新割焊地脚螺丝，爆破基础，一、二号高炉施工时，所有的小风机、马达几乎绝大部分基

础返过工，……”情况可见一斑。我们在工地上处理的这类问题是大量的，一般设计人员都不大愿意处理代用问题，因为无论材料代用或设备代用，往往是以大代小，以多代少，从设计上看不尽合理，会使造价增加。有时牵涉到设计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疏忽，影响工程质量。然而当时为了包钢尽快“上马”，权衡轻重，经济帐只能服从“政治帐”。我们也就只得努力去做好这项工作了。

## 五

一九六〇年元旦，炼钢工程施工紧张阶段，设计院党委书记李刚，一清早就率领我们工地工作组的人员，到工地去实现“开门红”，照常上班工作。在“大跃进”年代，节假日加班是常事，一九六〇年春节工作更加紧张，五、六十年代，过节一般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看重。

炼钢一号平炉定在一九六〇年“五·一”投产，二月里炼钢综合工地改成指挥部，由李秋帆任炼钢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金志中任副总指挥，包建二公司全力以赴，经理王本源、胡舜寿等几乎日夜都在工地上。我们设计组同样不分昼夜有人值班。在炼钢厂办公室一楼大房间安设了设计工地工作组，除了安置桌椅资料箱柜之外，还放了两张帆布床，供夜间休息之用。设计院行政科亦派了专人服务到现场，为设计人员提供方便，做好后勤工作。

三月底，建成投产的日期将近，指挥部组织工程交工验收委员会，各专业设计人员，分别参加了各个专业验收组。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一号平炉如期建成，晚上八点二十五分，流出了第一炉钢水，我们面对着这场面，激动不已。

五月五日，包钢举行了一号平炉投产的一系列庆祝活动。

在工地的评比庆祝活动中，设计工地工作组被评为先进小组，我们得到了指挥部奖给的各种图书，每人1—2册。当时强调以荣誉奖为主，不允许发奖金，书籍就是最好的物质奖品了。

二、三号平炉及炼钢厂未完工程继续施工，工地工作组继续留在工地工作。二号平炉于十月十三日投产，三号平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投产。

## 六

平炉投产以后一段时间，生产总不正常，铁水供应、煤气、运输等原因

很多，公司号召全体职工都来保钢保铁。冶金部副部长刘斌、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的炼钢专家孙德和、马本师等也都来包头协助指导。我们设计工地工作组的人员也都投入了保钢的工作。平炉冶炼时间过长，是炼钢生产中各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其中运输周转不灵又是重要原因之一。领导要求我们从铸锭车、渣罐车、两条线路跟车，了解影响运输周转的原因，并进行疏通。形象地称之为“当红娘”。我参加了渣罐车这一条线路，去钢渣抛置场了解倒渣情况。钢渣线在废钢厂再往南的高道上，钢渣罐车拉到渣场以后，用火车吊翻罐，但往往由于钢渣在罐里放得时间长了，倒不出来，就用火车吊在倾倒的罐底后面敲打，有时弄得不好，连渣带罐一齐翻了出去。每天来车的次数不多，工人大部分时间闲着，天冷的时候，在休息的小工房里聊天。小工房在抛渣线高道另一侧的坡地上，是个临时性建筑，里面一铺板炕，一只火炉，烧水热饭全靠它了。工人都很年轻，大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农民，文化程度都较低，每天要翻几次罐，要求每一次作业在多少时间内完成，心里都没有数，一旦钢渣凝在罐里倒不出来怎么处理，职责也不明确。看着这一切，使人感到这种落后的操作方式和包钢这样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实在不相称。工业化大生产，是应该有一套科学管理和操作方法的，但现在还没有，也许是工厂刚刚建设，还没有顾及这些。我们当了一阵子“红娘”，无济于事，同时困难时期（主要是吃的问题）已开始影响到我们这活动能力，我们就慢慢地“收兵”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炼钢因生铁及煤气供应问题被迫停产，经过整顿，于三月中旬恢复生产。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包钢提出了“投资一变二，产量加一番，八年计划五年完”的口号。在四月份的《包钢工作简报》第六期中明确地提出把“投资省一半，速度加一番”作为包钢建设的奋斗口号。根据这个精神，要求设计院编制包钢总体设计节约方案。当时包钢总体设计早已经国家批准，规模已经确定，总图布置和主要生产设备都已经不能改变，而且建设摊子已经铺开，一些工程已经施工。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投资节省一半，已经不现实了。但这个“节约方案”不做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做，而且要做好，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在“大跃进”年代，革命和生产总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学习过“经济工作要为政治服务”的道理，我们都习惯于为实现“口号”而去努力

奋斗,是不是积极响应号召,常常被视为一个人政治表现的标志。一九五九年反右斗争中,要求我们结合设计工作从五个方面去对照检查是否“右倾”了。这五条标准是:1.对总路线、大跃进的态度;2.对群众运动的态度;3.是否能打破洋框框搞土洋结合;4.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是否摆正;是否走又红又专的道路;5.有没有干劲,革命意志是否衰退。当时如果在设计工作中不积极响应口号的号召,要被这五条标准检举出来是很容易的。后来我们知道,设计院有的领导同志就因为对“投资一变二、产量加一番”有不同看法被列为“右倾”而受到党纪处分的。

我们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后期迁来包头的,大家都明白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都不愿意再和“右”字沾边。对待包钢节约方案,既是技术问题,也有政治问题,这无疑是对设计人员一个严峻的考验。

设计院领导组织了各个层次许多次讨论会,让大家对“投资一变二”各抒己见,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经过大家冥思苦想,反复琢磨,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包钢工程建设应该节约,但不能大削大砍,不能伤筋动骨,要保证基本质量,要从长远考虑。具体来说,主要生产设备不能改变,主要车间的起重能力和厂房负荷也不能改变,节省投资的主要途径只能是采用缓建的办法,有的活动设备可以暂时不上或少上,其次是降低辅助设施标准,总之要留有余地,要考虑以后有恢复的可能。设计院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精心设计,反复计算,终于完成了节约方案,投资概算减少到10700万元。后来又经过一九六三年的“包钢修改初步设计”,一九六五年的“包钢一期工程填平补齐方案”,原先的“节约方案”也就面目全非了。

现在回顾,幸好当时没有大削大减,没有因节约修改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后来在包钢工程质量检查中,也暴露出设计修改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但毕竟是局部的。在一九六四年作了纠正和补救。

包钢“节约方案”和初步设计修改工作,给我的影响和教育很深,实事求是地对待设计要求和维护设计质量,是对设计人员的基本要求。通过这件事,包院这支年轻的设计队伍,经受了“大跃进”的考验,有了质的提高,逐渐成长起来。

本文作者顾钧,现任包头市政协副主席,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 包头钢铁公司科学技术的发展

于 俊

包头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建起来的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位于包头市昆都仑河畔，厂区和福利区都在昆都仑区。包钢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之一和我国主要的稀土生产基地。

它拥有富饶的宝山——白云鄂博铁矿等铁矿三座，还有辅助矿山四座。拥有采矿、选矿、烧结、钢铁冶炼、轧钢、焦炭化学、耐火材料、稀土冶炼等全套主体生产系统和机械加工、机电维修、动力等配套辅助系统，六个研究所，还有配套的生活福利设施及教育系统，近年又建成综合公司所属小型厂矿和工商联合体。

中国共产党一向致力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战争年代，致力于保护民族工业和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立即为建设和开发白云鄂博作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在比较详尽的勘探之后，1953年初决定建立包头工业基地，1954年4月，重工业部批准正式成立包头钢铁公司。1957年，厂区建设破土动工，1959年5月26日首次出铁，10月15日周总理亲临剪彩，1960年5月1日出钢。至1971年，第一期工程全部建成投入生产。以后，又陆续建设了新的厂矿。现在已形成年产钢150万吨的生产能力。至1987年底，职工总数已达7万2千余人，有工程技术干部4000余人，专业技术干部8000余人，所属综合公司3万余人。1987年，钢产量突破200万吨，年总产值11.7亿元，上缴利税2.1亿元。

包钢的建设，结束了内蒙古自治区“手无寸铁”的历史，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包头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繁荣局面。

随着包钢的建设，逐步发展了白云鄂博及包头地区地下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

包钢的建设和发展，是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取得的，是党的科学技术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伟大政策的丰硕成果。

包钢在建设以来，取得了数以千计的科技成果，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合理化建议，多数都已用在生产上，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我们现在只将获得各级科技成果奖的数字统计如下，至1986年，包钢公司级受奖项目229项，包头市级2项，内蒙古自治区级33项，冶金工业部级44项，国家级10项。

现在，我们划分几个阶段来介绍具体情况：

自1927年地质工作者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藏之后，陆续有一批科学家和地质工作者，发现了白云矿含有稀土、萤石、铀等142种矿物，71种化学元素，并进行了储量等有关调查与分析，这是建设包钢的基础（关于这方面情况，由另文叙述）。

### 矿山地质采选科研生产重大进展

建厂之初，继续对白云矿进行研究。1957年，中国和苏联科学院签订了关于白云鄂博铁、稀土研究的合作协议，1958年6月~1959年10月，进行了野外地质调查研究，并由中国科学院、包钢白云铁矿、苏联科学院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铁—氟—稀土和稀有元素矿床1958~1959年中苏科学院合作地质队研究总结报告》。1963年，国家计委、科委，组成了105地质队，进行勘探研究，编写了《矿区矿石矿物志》，1966年，提交了《白云鄂博铁矿稀土稀有元素综合评价报告》。1960~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共同研究，于1968年提交了《内蒙白云鄂博矿床的物质成分，地球化学及成矿规律的研究报告》。1965年，地质部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内蒙古地质局试验室，提交了可供综合利用前景的意见。1964~1980年，包头冶金研究所陆续提出研究报告，如1964年提交了《内蒙古白云鄂博白云岩型铀稀土矿石选矿样品物质成分研究报告》，1967年提交《内蒙白云鄂博都拉哈拉、东部接触带磁铁矿化白云岩选矿试料物质成分考查报告》，1979年和白云矿共同提出《白云主东矿上盘富钾板岩物质成分研究报告》，1980年提交《内蒙古矿区西矿9、10号矿体混合型大样物质成分研究报告》。

1978年以来，冶金部在方毅副总理的关怀下，组织了白云西矿地质科

研会战。会战期间提交了多种报告，如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易解石是白云矿山钽铌的主要工业矿物研究》等。并发现了国内外尚未发现的十余种矿物，如中华铈矿、褐钇铈矿、铍方解石、铀钍矿、碳酸钠矿等新矿物。1978、1979、1980、1981、1983、1984、1985、1986年，国家科委、经委，在包钢召开了八次白云矿综合利用会议，加上以前的共14次综合利用会议。1975年，召开了白云鄂博群地层学术讨论会。1975年，内蒙古编地层表办公室等单位，提交了《白云鄂博的时代问题》报告。1979年，召开白云鄂博地质科研学术讨论会，汇编了有关白云鄂博矿床地质科研论文27篇，其中有包钢矿山办公室和白云铁矿提交的《白云鄂博主东矿等矿石带状分布特征及成因讨论》、《浅述白云鄂博碳酸盐的成因特征》两篇论文。1981年，包钢矿办在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学术会议上，宣读了《白云鄂博矿铁、稀土、铈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白云鄂博共生矿综合利用研究的进展》两篇论文，白云铁矿提交了《白云鄂博铁矿的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的论文。1982年，在全国铁—稀土—铈矿床学术交流讨论会上，交流讨论了24篇论文，矿办宣读了《白云鄂博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成矿作用》论文。

1976年，包钢矿山地质工作者提交了《白云铁矿主东矿储量计算说明书》。八十年代，白云鄂博铁矿为了改革生产勘探手段，采用100A-F型小口径金刚石钻机进行水平钻代替槽探的试验，取得初步成果。地质人员为高炉炉瘤攻关提供了地质矿物资料。

包钢地质工作者，多年来，为密切配合矿山开采，积极开展了矿山地质、工程地质、勘探技术及配合选矿、冶炼进行了有益有害物质成分研究。采矿工作者也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矿研所采矿室和矿山合作，1980年研制成功冷加工聚丙烯酰胺抗冻浆状炸药，它耐冻性好，可长期储存，可塑性好，加工工艺简单，安全可靠，且可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获80年冶金部科技成果4等奖，金兆恩、朱天钢同志贡献较大。塑料导爆管1980年研制成功，加工简单，安全可靠，成本低。1982年研制成塑料导爆管传连器，使用安全，运输方便，获1982年冶金部科技4等奖。

乳化炸药及装药车，获包钢1985年科技2等奖和冶金部85年科技4等奖。

西矿氧化矿弱磁一反浮一絮凝选矿试验获得成功,已建立了车间。采用一种新的药剂再选重选粗精矿为68%品位以上的稀土精矿的试验研究成功。西矿氧化矿磁选扩大试验研究,获冶金部1981年4等奖。浓密机深砂浓度自动测量及过滤机给矿浓度自动调节研究,获1981年包头市科技3等奖。

矿山地质及采选科研,为包钢钢铁和稀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白云鄂博共生铁矿冶炼的技术进步

白云鄂博铁矿是多金属共生矿床,其矿石的冶炼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在建厂之初,即为探索矿石的冶炼特性,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1954年3月,包钢含氟矿石在石景山钢厂 $71\text{m}^3$ 的9号高炉上,进行了第一次冶炼试验,从此揭开了包钢白云矿冶炼试验的序幕。当时是和苏联合作试验的,包钢冶炼负责人杨行筒工程师,目的是试验白云矿直接入高炉冶炼的可行性和效率,氟及稀土金属在冶炼产品中的分布规律,对高炉炉体的影响,炉渣的理化性质,氟的逸散及危害等。出铁41炉,其结论是包头矿可直接入炉冶炼,出了含硫量为0.0024%的优质铁。

第二次试验在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 $1\text{m}^3$ 高炉上冶炼,目的研究氟在炉内的运动和含氟炉渣的特点,最后写出了《高氟炉渣粘度及溶化性研究报告》,得出了高碱度渣冶炼100%的包头矿可以用粘土砖炉衬的结论。

第三次试验是1956年5月,在鞍钢 $47\text{m}^3$ 高炉上冶炼,试验组长邵象华。结论之一是冶炼白云矿要采用碳砖炉衬。

第四次是1956年7月,在石钢 $78\text{m}^3$ 高炉上,结论是炭砖炉衬能经得起低碱度氟渣的侵蚀。

按冶金部在1956年关于石钢 $10\text{m}^3$ 小高炉进行包头矿冶炼试验问题的决定,开始了第五次试验,历时14个月,写出多份报告提供给设计单位。

1957年10月,在石钢 $17.5\text{m}^3$ 高炉上,进行了第六次试验,试验证实了炭砖对炉衬的抗蚀作用,证明小高炉冶炼包头矿可使炉子顺利进行。

第七次试验,是在石钢 $413\text{m}^3$ 炉子上进行。结论是否定了包头矿性能

好,不应该结瘤的看法,特别是在大高炉不能结瘤的看法,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第八次试验,是在“中包钢”的13、55、80m<sup>3</sup>高炉上进行,时间1958~1959年,提出了风口损坏的问题。

第九次试验,是在1959年7、8月间,在首钢413m<sup>3</sup>高炉上进行。进一步确定了合理的操作制度,结论是大高炉冶炼包头矿,炉温要高些,碱度要低些,为大高炉开炉配料提供了依据。

以上九次是开炉前进行的。

第十次试验,是在1980年4~9月,在包钢55m<sup>3</sup>高炉上进行的。目的是用包钢大高炉当时配料比,采用最合理的操作工艺制度,考虑可否避免结瘤,和在结瘤时研究结瘤机理,系统研究包头矿冶炼过程和普通矿的不同点,包头矿容易结瘤的原因和机理,寻找防止结瘤的办法。

这次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加深了对白云矿的认识,丰富了白云矿的冶炼理论。白云矿不仅含氟高,钾钠也高,并在炉内积累,积累严重时将导致结瘤。结瘤原因弄清楚了,找到了基本措施。

这次试验写出了十五篇报告,1983年12月,钢铁杂志以专辑形式发表了部分报告。

这次试验,毕群为组长,杨文政、冯志坚等为副组长,42位主要参加人,北京钢院和钢研院有不少人参加。

冶炼试验和“三口一瘤”攻关一起,为大高炉冶炼白云矿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为包钢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包钢矿石由于它的独有特点,在实际冶炼生产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难关,这就是对风口、渣口、铁口的快速腐蚀造成损坏,以及结炉瘤等。

最早的铸铜空腔风口,个别月曾损坏334个,比别的铁厂高20倍以上。1960年公司成立攻关队起,多年来多次组织攻关组,在结构、材质、操作速度等方面下功夫。1972年研制成高压水冷却螺旋管铜管焊接风口,1978年经改进后,全面应用,效果良好。1982年举行风口技术鉴定会,专家们公认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1978年获包钢科技成果奖。

渣口原也是铸铜的,后经攻关改为铜板焊接渣口,保证了正常生产,国内专家一致认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铁口损坏也较严重。1978年前后,炉前技师陈荣贵等同志,试验成功泥

炮无水泥料，解决了铁口问题。1985年，冶炼和耐火材料各方专家合作，解决了铁口部位密封耐火材料和密封方法难题，即采用高铝碳化硅作骨料的磷酸盐耐火可塑料捣打灌浆，加上维修措施，保证了铁口的使用寿命和 不冒煤气，保证高炉高压操作，因此获得包钢1986年科技进步1等奖。

炼铁厂主任工程师王育修，参加了全国液压矮泥炮的攻关组，设计了其中一个主要部件。该BG-400型泥炮解决了堵铁口问题，已在全国大型高炉上普遍推广。该泥炮获冶金部1986年科技2等奖。他还制作了炉顶检修机械设备，使快速检修炉顶成为可能。

从1986年起，包钢高炉开始喷煤粉，这是由科技处组织实现的。在喷煤粉过程中，计量处张毅等同志，用带压力补正的电子秤系统，解决了双罐双系统连续喷吹的计量问题。获1986年包钢科技3等奖。

### 区域配煤炼焦和烧结矿重大发展

炼铁的精料方针是要有好的焦煤和熟料，熟料就是人造富矿—烧结矿和球团矿。

焦炭由于需要量大，指导方针是使用运输距离近的煤，所以建厂之初就开始了区域配煤炼焦的试验。

这项试验是在1953年“五·一”节开始的。首先是收集调查内蒙古地区（首先是石拐区）各个煤田的煤炭资源分布、储量、煤种、煤层、煤质有无粘结性能，现有煤矿的生产装备水平、生产能力、交通运输状况。1954年4季度，又收集了内蒙古西部卓资山、乌达煤矿的情况，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煤源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1953年8月，煤样运到石钢。9、10月间，在石钢用200公斤小焦炉开始了配煤试验。

1954年初，在石钢进行了为包钢、武钢准备焦炭的大规模配煤炼焦试验。为包钢炼焦配煤作好了准备，也培养了技术人员。

内蒙古是一个盛产煤的地方，附近的煤田日多，多年来经常提到炼焦的日程上来，因此焦化厂经常作区域配煤炼焦试验。因为内蒙古煤运距近，节省铁路运力，经济效益好。1977年，内蒙古表彰包钢33项科技成果，就有区域配煤炼焦一项。1983年，洗煤厂、原料处等单位，为扩大利用内蒙古煤而进行的原煤可选性试验研究，获包钢1983年科技2等奖。随着新煤田的开发，这

一工作仍在进行，为此，焦化厂建立了研究室和200公斤小焦炉。

1976年，煤炭部、冶金部组织人员，对国内烟煤资源进行考察。焦化厂周学山代表参加，对烟煤进行了分类，目的在于合理利用煤炭资源，并指导工业生产。由于烟煤的成因及其性质十分繁杂，很难进行科学的分类。但终于采用较先进的方法进行了分类。此项成果获1981年度冶金部科技成果2等奖。

烧结的重大科技成果，当属高氧化镁烧结矿和厚料层烧结。

烧结矿氧化镁含量，由1%提高到3%时，其开始还原温度可提高 $90^{\circ}\text{C}$ 以上，熔点提高 $10^{\circ}\text{C}$ 以上，还原粉化率减轻30%左右，去除氟、硫、钾、钠率有所提高，是防止高炉结瘤的一大技术措施。1983年4月用于工业生产。获包钢1983年科技成果1等奖，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主要人员有周同藻、李炯、王继多、傅纬国、马燕生等20人。

厚料层低碳操作烧结工艺试验，烧结机投产后即开始搞，料层原厚度200~220mm，很快提高到340~350mm，台时产量提高17.58吨，煤耗降低4.7公斤/吨，烧结矿质量改善。

该成果获1983年包钢科技1等奖，主要人员为李炯、王继多、陈德民等10人。

1985年，烧结矿料层厚度达到420~430mm，获包钢技术进步2等奖。

## 高超的中磷铁水炼钢技术

多年来，有人似乎形成了一个偏见，即包钢的炼钢技术不过硬。这是由于不识内情，凡内行人来到包钢，无不称赞包钢的炼钢工人，确确实实掌握了特殊的中磷铁水的炼钢技术。钢质逐渐稳定，由建厂之初只炼沸腾钢发展到炼镇静钢，现在镇静比可高达70%。

平炉实现了单上升道改造，实现了三枪吹氧，转炉实现了顶底复合吹炼，重轨钢实现了吹氩以提高钢质等措施，这些都得到包钢科技奖。为60公斤/米重轨配套的大型钢锭114钢锭，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型钢钢锭，为提高重轨和提高收得率作出了贡献。该钢锭模的试制获包钢1986年科技1等奖。

500吨大型用氧平炉烧乳化油，是包钢首创的。乳化油俗称油掺水，在国外也是一项新技术。1981年列为公司重点科研项目，试验在1号平炉上

进行。经过两年的准备和试验，并同时作了大量的钢样对比检测工作，1983年元月正式试用，证明掺水量 $9 \pm 1\%$ ，可节油 $8\%$ ，乳化油对钢的含氢量、低倍组织、机械性能等无不良影响。

此项目获冶金部1985年科技成果4等奖，主要人员为张祝安、金浩川、邵绪斌、李先波、范魁福等人。

铁水预处理试验，几年来取得很大突破，现在试验工作接近尾声，为铁水预处理装置的正式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炼钢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新钢种上。18钼钢，是包钢利用本身资源优势而研制成的低合金钢，主要为满足铁道部门制造内燃机车纵梁结构件，和国民经济对高强度型材的需要。从1971年开始研制，1972年转为工业性扩大再生产，至1985年，已生产32万吨18钼钢工槽钢。

该钢种在1985年9月12日，通过了冶金部技术鉴定，获得1984年包钢技术进步1等奖，1985年冶金部科技成果3等奖。

主要研制人员为白景璋等人。

此外还有多种新钢种。

随着炼钢技术的发展，耐火材料也有较大发展，以满足炼钢的特殊要求，如滑动水口，打箍滑板，270吨盛钢桶用砖，高铝砖和电炉顶砖等。绝热保温帽和轻质绝热板都获包钢科技成果奖。

## 突飞猛进的轧钢技术

包钢的轧钢厂包括初轧厂、轨梁厂、无缝钢管厂、线材厂、焊管厂。

1965年初轧厂投产，1968年轨梁厂建成，1971年无缝钢管厂投产，1978年线材厂建成，1981年焊管厂建成。

轧钢是把钢锭变成材的关键工序，包钢的轧钢技术，这些年来可说是突飞猛进。

单侧上烧嘴均热炉调焰烧嘴，是初轧厂、钢研所会同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研制成功的。由于火焰可调，达到炉膛两端温差缩小的目的。温差 $\pm 10^{\circ}\text{C}$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单产可提高 $14.9\%$ ，降低燃耗，单坑经济效益达13万元/年。获1986年包钢科技2等奖和冶金部86年科技3等奖。

轨梁厂的技术进步表现在更多方面。

加热炉是轨梁厂的咽喉。在建厂之初，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对照苏联



原设计，进行施工设计时，基建科长刘家畦、加热技术员陈巨，即和设计院研究，修改了苏联设计，采取汽化冷却系统、余热装置、上烟道等先进技术。

投产之后，由于“文革”中包钢生产不正常，由烧煤气改烧重油，陈巨、煤钳工隋国栋、技术员于俊等同志，进行了多次改烧嘴试验。包院参加了这一工作，将高压蒸汽油喷嘴改为低压油喷嘴，使加热炉初步适应了燃料的变化，而维持正常生产。

1976年以后，陈巨、刘家畦、于俊等同志，制订了加热炉技术改造的系统方案。最先在包钢使用了可塑性耐火材料包扎炉底管，热工仪表更新换代，后又将圆形炉底管改造成矩形炉底管，试验新型热滑轨，初步取得成功。据当时全面测试，炉子热效率达49.1%。后来，在热滑轨研制的基础上，机总厂试制出铸钢30铬20稀土半热滑轨获得成功，该钢种已成为机总厂耐热钢的主要钢种。

1980年实现第二步计划，陈巨、于俊等人参加，同设计院共同研制低压煤气重油两用烧嘴成功，解决了轨梁厂时常由于燃料变化而受到的停产威胁，该烧嘴获1984年包钢科技三等奖。

轨梁厂开工几年内，曾轧制出全套轻型大号工槽钢系列产品，翁绳厚孔型设计，方圆钢和50公斤重轨，由高桓仁设计。

当时，由于铁路运输负担太重，铁道部和冶金部预感到50公斤重轨已不能适应日益繁忙的铁路运输，必须向重型化发展。铁道部设计了60公斤重轨断面尺寸，高桓仁孔型设计，于1976年12月26日，一举试轧成功60公斤重轨。1978年9月，第二次试轧，仍由高桓仁设计孔型。1979年5月第三次试轧，翁绳厚对原孔型进行重大修改，为以后大量生产做出了贡献。

1987年，60公斤重轨年产20万吨，新建的运煤主干线大秦线，全部用包钢60公斤重轨。几年来该钢轨已生产36万吨。

为炼制60公斤重轨的钢种60U74，包钢和炼钢厂作了重大努力。

27号平行腿工字钢和BW—500型钢板桩，都是难度极大的新产品，由现在担任轨梁厂总工程师的翁绳厚高级工程师设计孔型，公认达到国际水平。该同志被誉为包钢的孔型专家。

矿用11号工字钢，是在1980年钢材滞销，轨梁厂开发的新产品，翁绳厚、张天绪设计孔型。

钢轨整体加热全长淬火新工艺,是包钢的重大创举之一。重轨经热强化后,寿命可提高一倍以上。此工艺于1966年开始试验,1981年通过冶金部鉴定,并获冶金部科技成果奖。参加单位很多,轨梁厂、科技处、钢研所,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等。

75公斤重轨也是包钢重要新产品。它的试制成功,将使我国铁路跃上世界先进水平。1984年3月27日试轧成功,孔型由翁绳厚、张天绪设计。冶金部、铁道部、内蒙古冶金厅都发来了贺电。

重轨超声波探伤,也是包钢为其拳头产品重轨,作出的重大科研成果,它安设在重轨冷加工作业线上,可探测重轨的内部缺陷,从而可保证重轨的质量。1981年7月,包钢重轨全部探伤出厂,为保证铁路行车安全做了贡献。

1971年,工程师张慧生创造了组合式重轨型钢矫正圈,节省了几十万元资金,又创造了重轨卧矫新方法等一系列科技成果。

DZ40套管和API石油套管,是由无缝钢管厂生产的。1975年6月首批试轧,1982年4月,又生产出符合API标准的石油套管,为石油工业出了力。

姜景利、张建勇关于提高钢管壁厚精度研究,获1984年包钢科技4等奖。

我国过去高强管材长期依赖进口,为此,包钢于1970年开始研制高强套管,确定40锰铌稀土钢种。

1970年9月,应燃化部要求试制抗硫套管。1971年5月,包钢与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设计院签定了试制协议,并于1975年成立了由包钢、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北京钢院等单位组成研究小组。

从1971年~1979年冶炼4200吨,分别在山东湖北作井下试验,同时制作了氧气瓶,证明该钢种具有良好的抗硫化氢性能,可作为抗硫化氢及普通高强套管用钢。

1977年获内蒙古优秀成果奖,1985年获包钢新产品2等奖。

1975年12月,包钢与煤炭部签定了试制30锰铌稀土液压支架管协议,1976年开始试生产,经多年试用,证明该钢种可作液压支架用管材和千斤顶用管材。

1987年12月30日,通过了冶金部技术鉴定。

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包钢的轧钢技术在前进。

## 蒸蒸日上的稀土工业

包钢的稀土工业发展，是从1958年建厂开始的，现在已建成四个稀土生产厂，它们是选矿厂、稀土一厂、稀土二厂、稀土三厂。

稀土科研于1953年开始进行大量的试验工作。1957年起研究选矿流程，1965~1966年，冶金部组织稀土选矿大会战。1969年，冶金研究所开始应用烷基异羟肟酸盐作扑收剂，从主东矿中贫氧化矿直接选别稀土试验研究。1975年又进行萤石矿小型试验，品位和收率有较大提高。1976年5月，稀土三厂首次从重选精矿中，用异羟肟酸作扑收剂，选出高品位（60%）稀土精矿。包钢选矿厂、三厂、冶金研究所用异羟肟酸铵作扑收剂，获得高品位稀土精矿。1978年，从混合浮选泡沫中选出高品位稀土精矿。现在，多种扑吸剂在应用，已选出多种品位稀土精矿，高品位可达68~70%，1984年8月，达到70%以上。稀土收率也逐步提高。

在湿法冶金方面，硫酸焙烧法曾是主要方法。后来，新碱法分解稀土精矿工艺工业试验成功，技术先进，收率高，时间缩短，经济效益显著，每吨成本降低200元左右，获得1984年包钢科技1等奖，主要是程世纯等人。氟化物电解制取铍—铁合金，获1984年包钢科技2等奖。从重选稀土粗精矿中分选氟碳铈矿工业试验，是选矿厂试验成功的。氟碳铈矿纯度达97.56%，系国内首创，1984年12月通过冶金部鉴定，1984年包钢科技2等奖。采用新药剂体系轻重稀土全萃取连续分离工艺应用成功，实现三出口。

湿法冶金生产混合稀土、稀土氧化物、氯化物、氢氧化物以及单一稀土等。

火法冶金制取稀土中间合金。1987年稀土精炉矿热炉生产稀土硅铁合金通过半工业试验，现在已成为主要方法。稀土精矿研制成精矿固结球和压块新工艺，生产出的球和块，满足稀土合金冶炼的要求，对稀土精矿炼合金全流程打通具有重要作用，1984年通过冶金部鉴定，获1984年包钢科技1等奖，和1984年冶金部4等奖。30%品位稀土精矿用矿热炉脱铁，电炉炼稀土硅铁合金工业试验，工艺先进，经济合理，综合利用好，1984年通过冶金部审定，获1984年包钢科技1等奖，获1984年国家3等奖。主要研究人员程永聚、漆光瑯、宋焕臣、李慧清、惠林等人。稀土合金粉剂研制成功，获1986年冶金部科技3等奖。目前，包钢的稀土中间合金发展很快，正在研制系列

的球化剂、孕育剂、变质剂，并促其尽快系列化，以满足国家需要。

包钢的稀土铈，在钢铁上应用成绩显著。15.5m<sup>3</sup>20号稀土铸钢渣罐，获1986年冶金部科技3等奖，铈铸铁缸套获1977年内蒙古奖和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18铈钢是包钢大量生产的钢种之一。

各种稀土产品是包钢的主要出口产品，稀土产品的利润占包钢的十分之一，年出口换汇达4万美元。

### 环境质量迅速改善

包钢环保和劳动卫生方面的科研成果十分突出，环境质量迅速改善。先后研究了氟烟气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稀土毒性、远期生物效应及防护措施研究，获包钢科技2等奖。包头地区氟污染源调查，为制定包头地区氟化物大气标准，提供了基础数据，获1984年包钢4等奖。1985年完成了包钢工业污染源调查，建立了一整套档案，为评价环境质量，提供了主要依据。天然铀钍放射性下限的规定研究，查阅国外资料，调查了现场情况，提出修改我国天然铀钍放射工作下限值，已被国标GB4792—84所采纳。

包钢的生产发展，是在国家和国际科技发展的大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在包钢科技人员的努力和高等院校及设计研究单位共同合作取得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职工团结奋战取得的。

回顾三十多年的创业历程，我们感到自豪，我们也有着更加奋发努力的壮志。

由于文章的篇幅和笔者能力所限，难免挂一漏万，那只能在有机会时再补叙了。但是，作过贡献的科技人员和职工是不会被埋没的。

在“团结、奋进、严细、创新”的包钢精神鼓舞下，包钢正在腾飞，驾起科学技术的翅膀。

本文作者于俊，系包钢科技处工程师、科长。

#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

王兆才 宋炳刚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是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直属厂，主要任务是承担印刷中、小学生用教科书及文化教育图书。现有职工381人，年生产能力为6万令纸，生产课本1200万册，是自治区大型书刊印刷厂之一。

该厂隶属关系几经变化，解放前是国民党绥远政府包头县党部的机关报印刷厂。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后，由中共包头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7月2日，《包头日报》正式改刊，为“中共包头市委机关报印刷厂”，有职工25人，主要承担报纸印刷和少数的社会零活。当时的设备非常陈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政府在出版方面的落后状态。

当时的厂址在东河区和平路南端路西的一个大院里，只有三栋简陋的平房。设备仅有手摇铸字机一台，几副五号字架和几副题目字架，一台16开平台机，一台圆盘机，一台切纸机，没有电动机做动力。印报机都是手摇式的，摇一下印一张，劳动强度很大而效率很低，印报工人每次干完都累得精疲力尽。铸字用的是摇把铸字机，摇一下出一个字，因手工操作有毛刺，还要进行细加工，用铁锉一个一个地锉，这样干使工人手上都磨起了血泡。

改刊后的印刷厂，生产上归报社经理部领导（经理部包括财会、总务、发行等），赵玉柱同志任经理。

1953年下半年，为了加强报社印刷厂的领导，上级从《内蒙古日报》社调来了李本睦同志任厂长。李本睦同志上任后，首先抓管理，从严治厂，并处处以身作则，改善了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解决了电源，~~佛~~印报机安上了电动机，~~圆~~脚踏改为电动，使工人们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印刷厂也迅速发展起来，人员厂房设备都有所增加和更新。1954年以后，为了让报纸图文并茂，增添了照像制版设备，为了更好地接收新华社电讯稿，增添了摩尔斯收报机和海尔模写机。还有一台32开平台机。

1956年，在南门外（包头制油厂对过）盖了新厂房，厂房面积由原来的400多平方米，发展到1500平方米。1958年大跃进时，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职工增加到300人。当时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很高，工厂生产形势很好，被东河区区委评为先进单位。

1959年，报社在昆区现包头医学院院内新建了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1960年搬迁工厂。由于当时水源、取暖等配套设施没有搞好，加上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纸张供不上，又进了几十吨青壳纸无法利用，积压了资金，被迫于1961年“下马”，只留下两台32开机印报，其它设备外调，人员大部分调入市内各印刷厂和其他行业。

1962年下半年已调在市工业局的李本睦同志又重新回报社工作，决心重整旗鼓。工厂重新“上马”，由小变大。到1964年，人员又增加到近百人，增添了机器设备，工厂由医学院迁到民族西路现址。在“文革”军管期间，印刷厂除了印报外还印装《毛主席语录》和马列著作等，设备也有所更新，又新进了二回转，双色胶印，全开折页、18代配书机等，使生产能力达8000令纸。

由于“文革”期间派性问题和产供销方面的实际困难，1972

年，包头市革委会决定报社和工厂分家，人员设备一分为三，工厂一分为三。报社留40多人，一台轮转机，两台32开机印报。去市革委20余人印文件，剩余136人印书刊；成为市第三印刷厂（现为内蒙古教育印刷厂），隶属市轻工局领导。

在归属市轻工局的1972年11月至1976年的7月1日这4年里，厂子有所发展，但步子较慢，设备没有更新，生产处于亏损边缘，如：1976年亏损达9.9万元。

1976年7月1日，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内蒙古教育厅正式接管包头市第三印刷厂，改名为“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并派来教育厅政治处主任崔挺献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在厅领导和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制定了一个迁厂规划，需资金900万元，由于国家财政困难，计划未能实现。

内蒙古教育厅接管厂以后的几年间，生产形势转好，变亏损为稍有盈利，到1982年盈利5.193万元，1983年盈利9万元，1984年盈利9.7万元，产量达3.8万令纸，产值达200万元。

1984年10月，教育厅领导根据中央关于城市改革和干部的“四化”要求，派来工作组，对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任命于宗鲁同志为厂党总支部书记，王兆才同志为厂长。厂领导班子平均年令为40岁。新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大阳开拓、勇于改革、使厂里的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一个兴盛时期，厂里先后购进铅印轮、转骑马联动、双色胶印、国产放大机，照像排字机，胶配联装机、订包烫联动、204双色双面胶印轮转机等大中型先进设备。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成为工厂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生产能力是1976年教育厅接管时的8倍，跨入全区大型书刊厂的行列，全厂设备总台数为104台，印刷专用设备93台，1987年产值达551万元，产量达6万令纸，实现利税37.5万元。

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厂里成立了蒙文排字车间，在保证完成课本印装任务之外，还为社会承印了一些期刊杂志、报纸，有《包头广播电视》报、《包头社联》、《包头园林》、《包头医药》、《鹿原》丛书、《塞风》、《向导》、《宣传战线》、《包头文史资料》、《昆都仑文史》、《钢院学报》、《师专学报》、《内蒙古高等教育》等。

此外还承担了全区高等学校、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考卷任务，做到了万无一失，受到了自治区3个招办和教育厅领导的表扬。

1986年6月初，世界国际银行外宾由国家教委、内蒙古教育厅、教育出版社领导同志陪同到厂里进行考察，并同意给予贷款90万美元，更新设备，发展生产。

内蒙古教育印刷厂计划在“七·五”期间生产能力实现翻一番半，达到年产12万令纸，产值增加到1000万元，利润达到百万元。

近几年来厂里进行了两个文明建设，厂容厂貌发生了变化，建起了考卷生产大楼，招待所、小礼堂、食堂、浴池、创办了《红黄蓝》小报，满足了广大职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受到了教育厅机关党委书记刘永胜同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社长哈木等同志的赞扬。现在全厂上下正满怀豪情、坚定信心为实现翻一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

本文作者：王兆才，内蒙古教育印刷厂厂长。宋炳刚《红黄蓝》报编辑。



# 白手起家的昆区文化用品厂

李长江

包头文化用品厂，隶属昆区领导，是个白手起家的小型集体企业，厂址座落在昆区团结大街九号街坊，南与包钢矿山研究所为邻，北靠莫尼路，西是昆区老干部家属楼，东临阿吉奈道。到一九八七年底，共有固定职工一百一十人；新厂址占地面积4459平方米，建筑面积1331平方米，固定资产12万元，现有流动资金5.5万元，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6万元，产品品种由原来的只生产钢城牌浆糊，发展到墨汁、墨水、胶水等十四个品种，并建起了为本厂生产服务的塑料加工、包装箱加工等车间。由于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社会信誉越来越高。

文化用品厂的创建与发展结束了包头不生产办公用品的历史，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二十七个春秋。在这二十七年的历程中，既有艰辛，也有坎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然而，广大职工始终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了今天。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党的十三大胜利召开了，全厂干部、职工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目前他们正在认真学习十三大文件，决心在新的时期沿着党指引的方向，深入改革，继续前进，为国家为社会再做新贡献。

## （一）诞生

文化用品厂的前身是在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化以后，在

大跃进的形势下，由现在的冶金工业部包头黑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原称包钢设计）院职工家属组成的，隶属昆区跃进公社的一个街道生产服务点。由于一九六〇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处于罕见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灾荒，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妇女本是半边天，要为社会做贡献”，在街道干部高素云等同志的组织下，一哄而起，当时有六、七十人报名参加，其中女同志占90%以上。开始没有占脚之地，在设计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把家属楼中间的一座简易房屋让出来，并派国家干部钟富魁同志协助街道党支部负责组织领导，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发扬大庆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捡砖头、搭锅灶、砌围墙，经过一番热火朝天地实干和艰苦的努力，组建后的服务项目有：代洗衣服、代看小孩，缝纫、翻新补旧、生产汽水、浆糊等。由于白手起家，没有资金来源，全体同志三个月没发工资，全部收入用来购置生产必需的原、辅材料，靠勤进快销加速周转来维持生产。后来经济情况逐步好转，但工人们月工资仅仅20元左右。

开始浆糊生产时后，设备简陋，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不稳定，完全靠手工操作，工人们起早贪黑，累得腰酸腿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加之头脑简单不懂经济规律和生产管理方面的知识，接踵而来的困难和阻碍此伏彼起。当时产品没列入国家计划，原材料不予供应，生产的产品全靠自己销售。为了搞好供销关系，女同志们不怕严寒酷暑拉上板车往各零售商店送货，上门服务。往东河区送一次货，就更辛苦了，往往早晨四、五点钟出发，送完货还要从废品收购站买一车旧瓶子拉回来，到家常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尽管劳动强度这样大，但同志们不怕条件艰苦，干劲足，热情高，知难而进，脏活累活抢着干。

汽水生产组生产的汽水，季节性强，但是资金有限。为了加速周转，她们边生产，边销售，沿街叫卖，早出晚归。汽水

瓶子是专用容器，为了扩大生产，女同志们走街串巷去收购，经过开水消毒继续使用，这样也曾一度解决了生产旺季的燃眉之急。

洗衣组的同志们都是自带洗衣盆和搓板来上班。缝纫组的同志主动把自己家的缝纫机抬来，就连裁剪工具也是自备，而她们劳务收入除个人应得的一小部分外，大部分留给集体，作为公共积累，用来扩大厂子的再生产。

一九七〇年以前由于生产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个人收入少，再加上当时社会上招工渠道多，一般年龄较小、略有文化的都陆续找上正式工作，最后只剩下三十来名女同志。人员大减，有的服务项目无法进行，只保留了《钢城牌》浆糊的生产。

## （二）创业

一九七〇年一月，驻昆区军管会党委研究决定：责成生建部配合区工交局正式接收了原昆区跃进公社（现前进办事处前身）的六个服务点和一个浆糊厂，成立了跃进综合厂，归昆区工交局领导。接收过来的全部职工，由社员转为国家正式集体职工，同时组建党支部并派出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干部邢铁锁同志任跃进综合厂党支部书记，高英俊同志任厂长。邢、高二同志到职后，紧紧依靠广大群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使企业逐步走向正规。在日常工作中，他们身先士卒，处处起表率作用，凡要求群众做到的，他们首先做到；凡要求群众不做的，他们首先不做。厂长高英俊同志既是业务员，又是采购员、推销员，工人们称他是“不知疲倦的人”。

昆区跃进综合厂成立后，工人们兴高采烈，都感到有了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劲头与日俱增，尽管当时正处在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社会上生产停顿、派性横行，但对跃进综合厂基本影响不大，工人们始终响应党的号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业余时间“闹革命”。因此，他（她）们在不断拓宽钢城牌浆糊的生产和销售的同时，工人们敢想敢干提出：“我们包头是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大小工厂成百上千，竟没有一家生产办公用品的！”于是在书记、厂长的带领下，经过调查研究，终于闹清了之所以无人生产办公用品是因为工艺复杂，利润微薄，最后在上级有关部门和商业经销单位的支持下，派出人员到外地学习红、兰墨水的制造工艺。当时厂内外群众有热情鼓励，也有冷嘲热讽，但工人们坚持实验、坚持生产的决心坚定不移，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

一九七二年全年共生产红、兰墨水四十万瓶，虽然当年发生亏损一万多元，但他们闯出了前进的道路，掌握了技术要领，摸到了生产规律，购置了一批生产必需的设备，经过算账对比，使大家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

一九七三年跃进综合厂撤销在原有网点的基础上成立了昆区被服厂、文化用品厂，高英俊任文化用品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当时文化用品厂的家底有流动资金两万元，厂址占地面积360平方米，简易厂房有120平米。厂长会计等八名行政人员在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内联合办公，开大会厂房就是会议室，砖头代替凳子，大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并不觉得艰苦，反而乐在其中。

### （三）发展

一九七六年国家投资5.1万元为文化用品厂建厂，当年十二月中旬新厂址落成并交付使用，厂党支部决定立即搬迁，成立了搬迁小组，各车间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为了节约搬运费，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起早贪黑，迎着刺骨的寒风，硬是把全部

家当用人力平板车一车又一车地拉了过来。当时还提出“搬迁不误生产并要为生产服务”的口号，人人顾大局、识大体，严格区分轻、重、缓、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边搬迁边生产，按时实现了一九七七年元月生产任务“开门红”。

一九七九年三月份，常富好同志调任厂党支部书记，高英俊任厂长，加强了领导力量。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份李时忠任厂党支部副书记，常富好退居二线，高英俊调团结办事处。

新厂址厂房耸立，环境优美，院大墙高，新旧厂址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工人们风趣地说：“我们的新厂房远看像个高低柜。”

自一九七三年文化用品厂正式成立，产品纳入国家计划，产、供、销逐步走向正规化。至一九八七年底共完成工业总产值三百八十九万七千一百元；实现利润二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四元；上缴税金二十五万余元；上交管理费四万余元。产品品种由原来的只生产钢城牌浆糊，发展到能生产红、兰墨水、碳素墨水、墨汁、胶水等十四个品种，其中高级兰墨水被评为市级优质产品，并远销到伊盟、巴盟等兄弟盟市，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 （四）“一厘钱精神”永不丢

文化用品厂生产的产品，都是服务于千家万户的小商品，用量少，离不了，生产工艺复杂，产品利润有限，生产一瓶浆糊需要九道工序，净利润只有二分钱；一瓶墨水从开始到成品七道工序，而且操作规程要求很高，而利润只有三分钱左右。目前，这个厂生产的十四个不同品种的产品中，只有六种可以获利，其余品种均为微利、保平和亏本，加之近年来原、辅料不断涨价，但他们从来不搞违犯物价政策的事，而是坚持用“一厘钱精神”治厂，从自身生产环节上着眼，从增产节约中求效益、求发展。如：

一九八四年至八六年三年中全厂生产盈利为4.15万元，而各项节约相加总数为4.63万元，工人们说：没有节约，企业就没有利润，不搞节约，企业便发生亏损。二十多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治厂的方针，为企业弥补了亏损，增加了效益。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搞节约的呢？请看下边几例。

一九八七年以前，产成品出厂时的外包装纸箱，均从外地购买，这样全厂每年需要支付三万余元的纸箱费。这笔可观的开销引起了群众注意，工人们在党支部的带动下，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经过反复试验，一套翻新纸箱的土设备终于诞生了。商业部门的废旧纸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货源，他们以每斤八分钱收购回来，按照本厂产品的包装要求，经过剪裁加工，印上自己的商标，和从外地买来的一样实用，扣除一切费用，每只可节约四角钱，全年需要纸箱三万个，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一万二千余元。剪裁下来的边角下料也舍不得丢掉，而是积存起来五分钱一斤再卖给造纸厂。旧纸箱上的凹形钉，拆下来集中起来，经过修整废物再用，小小的凹形钉，每年可节约五百元。按说一个工厂三、五百元钱，本不值一提，可是对文化用品厂来说，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数目了。

一九七八年以前，文化用品厂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用玻璃瓶做包装，这样全部玻璃容器，从外地购进，损耗大，价格高，直接影响着产品利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开始试制塑料瓶，工人在经过反复试验，多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了，同原来的玻璃瓶相比，一年可节约一万余元。

厉行节约已经成为这个厂干部及广大职工的优良传统。为了压缩行政经费的开支，行政人员大都身兼数职，而且规定包括书记、厂长所有行政干部，必须长期坚持下车间参加劳动，一切为生产服务；进出厂的一切货物装卸，行政干部包了下来，这个厂二十七年来从来没花过市内装卸费。因公出差从不坐卧铺车；联系

业务能打电话解决的，不轻易去人，能用电报解决的，不挂长途电话。

“一厘钱精神”使文化用品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步步走向兴旺，为国家做出了应有贡献。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耳闻目睹了这个厂发展与创建的艰辛历程，原来的三十多位建厂老同志，有的已经作古，健在的也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她）们的业绩和文化用品厂的今天紧密相连。

本文作者：李长江，现任中共昆都仑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 放声歌唱党的爱国统一战线

### 热烈祝贺政协昆区二届会议

区政协委员、包头民进副主委 张 铎

#### (一)

兔年花甲喜逢春，  
清明民进市委会，  
党的恩情深似海，  
知情出力展宏图，

统战政策暖人心，  
热暑政协昆都仑；  
社会主义是灯塔，  
改革开放献终身。

#### (二)

炎黄子孙盼统一，  
全心全意三服务，  
两个文明并蒂开，  
一线两点亮晶晶，

中华振兴担重任，  
一国两制大功成，  
民主法制比翼飞，  
政通人和喜盈盈。

# 昆区商业简述

鲁玉华

昆都仑区商业的发展，是随着包钢建设发展起来的。

昆都仑区商业局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成立，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撤销。此期间，共经营15个行业，即百货、五金、副食、煤炭、饮食、浴池、洗染、旅店、理发、照像、钟表、食品、土产、废品、蔬菜。一九八五年七月又重新组建了昆都仑区商业局。

一九五六年，包钢正在筹建，昆区仅有百货、土产、食品、副食、饭馆、修表、照像、洗染、旅店等零星商业点。

一九五七年，包钢建设正式开工，昆都仑区人口已有75807人。随着人口的增加，商业也在相应地发展。当时有百货、煤炭、副食、服务4个行业，31个门点，有职工753人，全年销售额为953万元。所有商业网点分别由昆区百货、副食、煤炭、饮食服务4个管理处管理，管理处由市各专业公司领导。

一九五八年，包钢生产建设速度加快，昆区人口增到161369人，原有商业体制已不适应。因此，于七月一日成立了昆区商业局。党的机构设总支委员会，各商店设支部。总支书记由区委财贸部长宁清英兼任，李振忠为专职副书记。行政设正副局长。局长由副区长杨云歧兼任，副局长先后为胡国顺、王旭初、牛鸿今、康福、贾秀山、王勇、赵志、李尚清。局下设人事、秘书、财务、副食、业务、生产、饮食服务七个科室。下属12个企业单



位（第一、二百货商场、南牌道、乌兰道、白彦道、白云路、张家营子五个糖业商店、煤建商店，饮食商店、“浴洗旅”商店、“理照钟”商店副食品、加工厂），共50个门市部，从业人员共1896人，行政管理人员169名。购进额为1988.8万元，销售额为2200.8万元，费用水平8.2%，利润96万元。

一九五九年，金福全增为区商业局党总支副书记。局内又增设了保卫、物价、基建三个科。下属企业单位增至16个。另有3个公私合营单位（恩义成饭庄、新民食堂、兴三照像部），共107个门市部，从业人员有2623人，行政管理人员293名。购进额为4563万元，销售4812万元，利润281万元，费用水平6.42%。

一九六〇年，局党总支书记由李振忠担任，谢巨瑞、斯日古楞为副书记。原有的3个公私合营单位归饮食服务公司领导。全区共有115个门市部，从业人员是4594人，行政管理人员是416人。经营品种有8373种，是昆区商业局成立以来，经营商品品种最多的一年。购进额为6101.6万元，销售额为7261万元，利润399.8万元，费用水平为5.8%。

一九六一年，局党总支增张秀卿任副书记。机构由原10个科合并为6个。局下属单位有21个。在社企合一方针的指导下，建立了哈业胡同、哈林格尔、麻池3个农村供销社。同时，还成立了共青农场综合商店。

年底，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市区的公司、商店、经理部、加工厂、饲养场按行业合并为4个公司，即百货公司、副食品公司、煤建公司、饮食服务公司。郊区的3个供销社和1个综合商店组成了供销联社。

上述企业单位共有128个门市部，从业人员有3631人，有行政人员341名。经营品种为4715种，购进额为3412.8万元，销售额为3817.3万元，利润119万元，费用水平8.7%。

本年，昆区商业局的职能由“政企合一”体制改为“行政机

构”，各项业务归口，分别由市各专业公司领导。昆区商业局负责检查督促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完成上级规定的各项任务，做好紧缺商品的统销、定量供应商品的分配和审批工作。

一九六二年八月，撤销了昆区商业局建制，商业系统由市专业公司直接领导。这种隶属关系，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撤销了包头市饮食服务公司。凡属昆区范围内的饮食服务网点，交昆区领导，由裴进学、高登明、宁子华、苏继臣、白玉山五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负责筹建饮食服务商店。

一九六九年十月，昆区饮食服务商店成立革委会，裴进学为主任，宋长海为副主任。

一九七〇年九月，将昆区饮食服务商店革委会改为昆区商业科，宋长海任科长。

一九七一年，包头市饮食服务公司恢复建制。同年八月，昆区商业科撤销，饮食服务网点仍归市饮食服务公司领导。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一年八月，昆区饮食服务系统共有8个行业，89个门市部，从业人员1119人，管理人员46名，每年的平均营业额为571万元。

一九八五年六月，经市政府决定撤销市各大大专业公司，中小型商业企业下放，由各区管理。因此，于一九八五年七月重新成立了区商业局。局党委书记由刘俊林担任，方效志、李克文任副局长。局下设人事、业务、财会、党委办、局长办五个科室和工会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有13个局属企业单位，125个核算点，165个商业网点，从业人员2833人，管理人员250人，经营商品3140种，全年销售额为4571.8万元，利润111.5万元。

一九八六年前半年经过调整，区商业局由纯管理型转变为管理经营型的经济实体。下属17个企业单位共184个网点，2808人，经营商品3500种。昆区商业发展较快，特别民办商业。

本文作者鲁玉华，现任昆区档案局副局长、区政协文史委员。

# 包头市民族教育

[蒙古族]阿古拉

## 序 言

包头民族教育事业，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随着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迅速蓬勃地发展。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解放时，全市无一所民族学校，而今天，全市有民族中学三所，小学八所，幼儿园四所，高中、初中、小学的在校学生12212人，超过了解放初期全市少数民族人口（当时9,938人）。包头民族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确实鼓舞了我市少数民族人民。民族教育组织机构，在市教育局设了民族教育科和民族教研室，少数民族集中的五个旗县区也设了民族教育股，已成体系。

包头民族教育简史分为：“清朝时期民族教育”、“民国——解放前夕的民族教育”，“解放后的民族教育”。解放后的民族教育可分三部分：“民族教育发展和繁荣时期”、“民族教育十年浩劫”、“民族教育恢复和发展”。

## 清朝时期的民族教育

在蒙古社会中，蒙古人读书的颇少，故老师在蒙古社会中颇受人尊敬。蒙古族读书人少，原因与畜牧业经济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凡贵族子弟念书，先持羊、酒行叩首礼，其后每次见面，必向老师叩首。至学会书写结业时，再谢以白马一匹、白衣一件（蒙古袍子），或布帛、缎匹等物，随贫富而定。自明代北元的阿勒坦（俺达）汗与明朝建立通市关系后，中原地区的纸张输入蒙古，但蒙古人一般还是用板和皮。

阿勒坦汗时代,由于蒙古社会的稳定,广大蒙古族人民迫切需要文化学习。阿勒坦汗仿藏族地区,在寺庙中设立各种学部,学习蒙文、藏文字,传习经典、佛教哲学以及医学、天文、历数、艺术、占卜等,满足广大蒙古族人民学习文化的欲望。

但是,由于明、清王朝对蒙古族采取宗教控制和宗教统治,致使蒙古青少年一半以上出家当喇嘛,在家的青少年还当毕丁,入学青少年几乎没有了,加之包头乾隆二年(1733年)才设置为“包头村”(当时萨拉齐厅辖境内一个平常的村落),包头的整个教育事业发展也晚。嘉庆年间包头定居者增多,道光时期商业发展,人口增多,学龄儿童逐渐增加,才有少数私塾的设立,这是包头教育事业设施的萌芽。到了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全国废除科举,兴学校,此风所及,也波及到包头。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萨拉齐县同知余宝滋在包头利用马王庙旧址,成立了两等学堂,这是包头第一所完全小学。

包头地区的第一所民族学校,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据一九四〇年宝音达赉编写的《萨拉齐县志》中:蒙小两等合设学堂,在萨拉齐城内东街前,建校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将育才书院登商生息之本,制钱六千串及生息完全提作此校,常经费仍动用息款,不准挪用。学堂监督由同知余宝滋兼任,并聘请地方绅士赵振九、王玉如为副监督,办理学堂一切事务,还聘请了王溶文为正教员,赵运鼎、曾继孔为副教员,学生区为蒙学(即初级小学)、小学(高级小学)两级,教授经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光绪三十年同知余宝滋莅任呈准征收绒毛、渡口船筏等捐以增经费,添收学生,校务逐渐扩充。光绪三十一年,改聘赵其博为正教员,光绪三十二年改聘王迎祺为正教员,光绪三十四年取消副监督名义,聘张贤为堂长(即校长),宣统二年又聘王绩古为堂长,贾清齐为正教员。

又据清朝旗历史档案“清文政”0081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廿八日,土默特右翼六甲参领都格扎布,禀包头续设立初级学堂,蒙汉合设有障碍,请批示祇遵由。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六日绥远将军贻谷批准成立“包头镇半日初级小堂,”校址在包头镇召梁街福徽寺。经费由土默特地方捐筹。招收学生,先尽蒙古族子弟,如有余额,可补招汉族子弟入学。课程为经学、修身、国文、算术、体操。旗历史档案“民教字8号”记载:清朝宣统三年九月停办校,其原因是因练兵无饷,遂致停课,其款移作军糈。

这两所学堂,在清朝末年,由于外患紧逼,清朝为推行“新政”,清政府采取了在内蒙古各旗驻地建立一所蒙、汉文书塾,大概与二、三王府联合设一书塾,其费用由王府或创办人负担这一措施下创建的学堂。

清朝政府推行“移民实边”政策是一九〇二年,在这以前,清朝政府长期以来没有决定推行这个政策,后来因清朝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急需才推行了“移民实边”这一政策。同时,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叶,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在清朝政府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而蒙古族王公在清朝政府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从一九〇二年开始,清朝政府派出大量推行“移民实边”政策的官吏来到内蒙古各地,督办开垦事务。这些清朝派来的官吏带领武装,逼着蒙古王公报垦,然后一段一段地进行仗放。清朝政府对内地汉族人开垦内蒙古各地草场的进行奖励,并在汉族农民聚居地区设治府、厅、州、县管理,于是汉族农民便蜂涌进入内蒙古各地。有的草场都被开垦,使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受到打击,蒙古族牧民受到无草地放牧之苦,牧民生活濒于绝境,加之清朝政府继续推广喇嘛教,以致束缚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并给包头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 民国 解放前夕民族教育

民国初期,辛亥革命后,教育事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一般人所认识。包头地区少数民族也认识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特别是蒙古族人民都想望把子弟送入学校读书,不愿送入寺庙当喇嘛。回族人口逐年增多,回族儿童没有上学的学堂,回族迫切要求办学。在这种情况下,包头当局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为他们的政治服务,兴办起了民族教育事业。

民国政府成立后,原萨拉齐蒙小两等合设学堂由刘聚章、赵子征、祝藻、马定国、郭万福、刘昆、张登熬、张登江、王培仁等相继为校长。在王绩古为校长时,可称为极盛时期,因经费充足,职教员办事认真,在民国六年奉令改蒙小两等合设学堂为高等小学校,民国十四年改高等小学校为县立第一小学校,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后停办。新政成立后,积极倡导教育,派员整顿该小学校,由大东街搬到大北街棋干巷内,已开课,有六个班级,学生173名(全部男生),教员8名(全部男性)。

萨拉齐私立清真小学堂(萨拉齐县志),建于民国二年(1913年),萨拉齐县县长王建屏督同和回民俱进会的马善元筹建,由回民集资,在城内南街

三道巷购买了民宅一处，从清真寺回民的月钱收入拨出部分款，购置桌椅板凳等设备，聘请王培元为堂长（即校长），招收回、汉学生30多名，设初级班一个，授课是国文、算术，经费由回民桥（牲畜交易市场）、屠（屠宰）两行征收附加捐作开支。民国六年改聘富维新为堂长，增设为两个班级，学生70多名，民国十二年改校名为萨拉齐县清真高级小学校，改聘董介安任校长。民国十四年改聘王则三为校长，增聘两名教员，增设高级班一个，学生达90余名。民国十七年改任马登云为校长。民国二十年马登云辞职，李瑞霖为校长，小学校改为县立。民国二十五年李瑞霖调离学校，刘忠任校长。“七·七”事变后，萨拉齐沦陷，该小学校被日本军营的伙房占用而停办。民国二十七年又恢复了“县立清真小学校”，选陶琛（回族）任校长，教职员5人，班级5个，学生99名。因日寇侵占时期，故学生授课以日语为主，教育措施和管理手段完全推行奴化教育。日寇投降后，由县教育科接收“县立清真小学校”，复校后，改校名为“县立第三小学”，仍由陶琛为校长。

民国初期，在包头落户定居回族日益增多，回族儿童和青年除了少数在清真寺学阿文和教义外，没有上学念书的学生，处于愚昧无知状况。辛亥革命后，回族群众要求兴办学校。经马铁和杨楞乡志等人四处奔波，积极筹办，由“包头回教俱进会”会长王益卿出资，以承租过约手续购置了福徽寺（包头召）蒙古族巴福缠的祖遗地皮及地皮上马环环、马二圪旦房屋（原广生荣马店），购置了四十副桌椅以后，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学上课，定名为“包头镇清真学堂”。第一次招收40名学生，其中汉回各半，还有几名蒙古族学生。经费由“包头回教俱进会”和学董负责筹办，除由回族群众以“散包帖”的形式募捐资助外，主要是靠回民屠行附捐收入。“包头回教俱进会”规定，回族屠行，每宰一只羊交附捐五分，每宰一头牛交附捐一毛，附捐也叫学捐，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包头解放。第一任校长由萨拉齐县知县委任傅日新担任，傅日新聘其弟傅维新为教员。民国四年（1915年），王益卿又去归绥（今呼和浩特）聘请了王锡恩（字相庭）为“包头镇清真小学堂”校长。来包头镇前曾任“归绥回教俱进会副会长”，来包头镇后，还兼任包头教育会副会长、绥西游击司令部参谋、包头设治局咨议等职。王益卿去世后，王锡恩兼任了包头回教俱进会会长。王锡恩担任校长整十年，王锡恩病故于民国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因其办校严谨，成绩显

著,颇受回族称赞,故为王锡恩立碑,碑文称:“王相庭先生慷慨好学,热心兴学,在包头创办清真两等学校,芳心孤诣,惨淡经营,树回友百年之人才……以造育人才为己任”。王锡恩任校长期间,学生逐年增多,到一九二三年有学生120名,并将“包头镇清真学堂”改名为“包头清真两等学校”(两等意为高、初级学校),教员有陶瑾(回族)、杨锦斋、李跃堂、邬堃等四人。王锡恩病故后,陶瑾任校长,次年陶瑾辞职,聘请张立献任校长,一九三〇年又聘请马逸尘(回族)任校长。当时“俱进会”会长吴俊杰(回族),学董穆生荣,又增聘丁冠英(回族)、马宪民(回族)为教员。这时的学校规模逐渐扩大,一一一四年级还是复式班,五、六年级则分班教学,学生增到167名。一九三六年马逸尘辞职回了宣化后,聘请了王质武(回族)兼任校长。

日寇占领包头后,成立了“包头回教支部”,把清真两等学校改名为“包头清真小学”,由回教支部管理,聘请了丁冠英任校长。一九三八年丁冠英辞职,吴懋功(回族)任校长。一九四二年马宪民任校长。国民党政府将清真小学改为“召拐子小学”,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召拐子小学”合并到包头第四完全小学(原东门大街第一小学),校址归还清真大寺,大寺又让给“私立崇真中学”使用。

日寇侵占包头时期,为日军侵略上的需要,从思想上灌输“王道乐土”、“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一整套奴化教育。他们曾公开宣传要为开发大西北培养中坚人才,而实为他们培养奴才和工具。于一九三八年成立了“包头回民青年学校”,校址在草市街,第一任校长吴懋功(回族),日本教官初由马任德兼任。一九四〇年吴懋功任包头回教支部长后,校长由马逸尘(回族)接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共办七期,第二期的日本教官是营生兼任,第四期日本教官又由嶂岸丰卜兼任,第六期又改由吉本庆正兼任,直到第七期,共有回族青年120多人参加受训和学习。“包头回民青年学校”是短期全日制成年半军事化的学习训练场所,受训的时间每期为三个月,有的是十个月。学员从包头、萨拉齐县两地选择,学员条件是回族男青年,年令20岁左右,身体健康,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拥护蒙疆政府和大日本帝国,并愿为效劳,由包头回教支部保送。一九四〇年后学员不足,便又成立了“回民青年团”,由于参加者少,于一九四二年流产自灭。

一九二五年国民军统治时期,乌拉特三公旗(西公旗、中公旗、东公

旗),在包头成立了三公旗小学,校址在马王庙街,学生近150名,其中汉族为多数,蒙古族为少数,其原因是有权有势的王公子弟才能进城上学,一般蒙古族牧民子弟无权进城上学。该学校虽然汉族学生多数,但都要学习蒙文,是包头第一个学习民族文字的小学校。该学校毕业的学生,胡尔查必力格(蒙古族)留日学医,解放后,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必和敖其尔(蒙古族,汉名叫何守兄)也留日学医,陶德斯琴(蒙古族,汉名叫郝世凯)留日学法律,曾担任八路军乌兰察布盟副盟长。

一九二六年,包头镇改包头县后,包头当局把宣统二年停办的“包头镇半日初级小学堂”恢复后,改成“土默特第三初等小学堂”,校址还在福徽寺(包头召)。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南京办了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是蒋介石兼任。为了笼络边疆地区的上层统治者和边疆青年,一九三四年春,派张锁临来包头筹建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的工作,同年建立了伪“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首任校务主任是张锁临,当时包头分校指定招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四省的学生,并且规定以蒙古族学生为重点,所以学生均由各蒙旗保送蒙古族籍学生,事实上蒙古族学生很少,都是汉族人中那些与蒙旗王公、协理有联系的子弟,弄了个保送书就进校了。包头分校名誉是培养师资,但是,国民党为了他们的政治服务,该校学生都是国民党预备党员,教育经费直接由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拨发,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学生生活用品、衣服、被褥、鞋袜均由学校发给。包头分校课程和一般中学课程相同,加学蒙文课。一九三七年包头被日本占领,包头分校随之带领学生60余人,教职员20余人,迁到青海西宁。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十月十七日包头沦陷。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推行的所谓教育方针是:“防共,民族协和及东方道义精华发扬;德性陶冶,授以实际的技能,培养坚实的人物,并根绝共产思想、抗日思想,确认东亚民族团结的必要”的奴化、侵略、殖民的反动政策。

为着日寇长期侵略,日伪当局于一九三八年把原三公旗改成为“包头蒙古中学”,或称是“巴彦塔拉盟包头蒙古中学”,校址在包头马王庙街。包头蒙古中学最初的校长是额宝斋,实际上额宝斋是名誉上的校长,是个傀儡,而学校的一切权力全部操纵在日本人甲斐主任手里。全校有8名教员,其中有两名蒙文教员,一名喇嘛教员是蒙古族外,其余校政人员都是日本



人。建校之初学生有119名，其中一半学生是达拉特旗人，剩下的一半则是其他蒙旗的学生。包头蒙古族中学设有附属小学。中、小学的区别不是以学识高低，而是以年龄区分的。凡是年满十三周岁以上的学生全部在中学部上课，而不满十三周岁的学生在小学部上课。日寇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学校所有的课程，除了蒙文一课用蒙语讲授外，其余课程全部用日语授课。

日伪当局为了制造民族之间的矛盾，学校日本人向学生灌输民族仇恨毒素。他们向学生训话说：“汉人同化蒙古人，汉人侵占蒙古人，他们是长城以南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赶回去。”鼓励学生说：“成吉思汗的子孙是勇敢的。你们出去只能打胜架，不能打败架。打坏打死的汉人，我们来作主，要是打败了，就得吃皮鞭子。”在这种破坏蒙汉民族团结的教育下，蒙汉民族团结受到了破坏，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了。

在蒙古中学内部，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统治，最严厉的是“阶衔相统治”：一年级的学生要绝对服从二年级的学生，二年级学生必须服从三年学生的统治，这就是所谓“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一九四二年把“巴彦塔拉盟包头蒙古中学”改名“厚和(今呼和浩特)蒙古中学包头分校”。改名后的蒙古中学校长是布勒图穆吉图，日本人前田实任副校长，学生100余名。一九四三年春，又将“厚和蒙古中学包头分校”改名为“包头兴蒙中学”。

日寇的这一套法西斯奴化教育，在包头蒙古中学确实毒化了一少部分青年学生。但是，绝大多数青年学生还是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在学生中反对日本法西斯、欲求民族解放的情绪，随着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加强而日益加剧。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这种情绪更加高涨，使得日本人在包头蒙古中学无法工作。一九四五年初，日本侵略者一怒之下，将包头蒙古中学解散了。一九四五年十月，解放军围攻绥远和包头时，蒙古中学的许多学生在解放军的影响下，策动了伪军的起义。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达赖同志，是该中学的学生。

阿都赖（应写“阿都沁艾力”，汉语“牧马村”）蒙汉小学，建校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校址在阿都赖村的庙内，有一个教师，十几名学生，一九四〇年（咸纪735年），有二年级学生15名，三年级学生13名，校长兼教员是海春清。一九四一年（咸纪736年）校长是巴文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派张民元同志到包头、萨拉齐一带搞地下工

作,他到了阿都赖村后,为做党的地下工作方便,他便当了教员,以教员的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经常与党的地下工作者奎壁、王逸伦、刘仁等同志进行联络,并向他们汇报情况,使得大青山抗日游击活动更加顺利地展开。张民元同志为搞好党的地下工作,他办校认真,教学有方,深受当地群众拥护。后来,党的地下工作需要,把张民元同志又派到日伪绥远联军仍搞地下工作,后又转到傅作义部任职。张民元同志走后,没有经费而停办了阿都赖蒙小。

党三尧(现在包头市土右旗管辖)蒙古族小学是奇子祥创办的准格尔旗第一所蒙古族小学。奇子祥是西官府的协理,奇子祥又名奇天祥,蒙古名阿拉坦保鲁特。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奇子祥是蒙旗师范的“高才生”,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回旗参政的。

党三尧蒙古族小学成立于一九三八年,最初校址设在将军尧村任柜院内,一个教学班,一至三年级复式,学生40余名,校长由奇子祥兼任,教师有赵根屯、宋德扎布,课程是蒙文、日语、算术。一九四〇年,奇子祥在党三尧村建筑旗政府和城墙的同时,兴建了学校。第二年春,由将军尧村搬到党三尧村,从三个年级增加到六个年级,占用教室两个,一个是初级复式班,一个是高级复式班,学生80余名(当时全部招收男学生),教师又增加了黄达赖和黄维新,课程仍是蒙文、日语、算术。一九四三年,教学班由两个增加到五个,一、二年级复式外,其余四个年级均是单班授课,学生100余名(秋季招收了一部分女生),学生的食、住、服装、学习用具从创办以来一直免费供给。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到包头伊盟蒙古中学上学,一部分到蒙疆学院学习,还有一部分去蒙古学习(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九四四年春,中国共产党党员、地下工作者云连科,化名勇夫,通过“关系”到党三尧村任奇子祥的上士文书,并以学校为中心点,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在勇夫的领导下,学校教师杨达赖、黄达赖和一些革命青年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队伍,学校随之停办。

伊盟中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原在再生召(现伊金霍洛)的国立伊盟中学于一九四五年十月搬到包头金龙王庙街沙王府,校长是经天禄,学生400余名,其中汉族学生多数,但全校学生都学蒙文,这是包头地区第一个学习蒙文的中学。一九五〇年,校长是伊锦文(现在内蒙古大学

图书馆工作），开设了蒙文班一个，从伊盟、乌盟招了三十名蒙古族学生，当时的蒙文教员是兰陶先生（现在包头蒙古族中学工作）。一九五二年内蒙古拨款25亿元（现在的25万元），搬到伊盟东胜。

一九四三年，乌拉特中公旗在昆都仑召（现包头市管辖）创办一所小学，校名为“乌拉特中公旗昆都仑召蒙古族小学”，教师有1名，学生从大不灿沟（现在包头市郊区管辖）、白石头沟（市郊区管辖）、卜尔汉图（市郊区辖）、阿嘎如图沟（市郊区辖）等地招生，当时占用庙房作教室，费用由乌拉特中公旗支付，课程是蒙文、汉文。一九四七年搬迁到卜尔汉图，巴图吉布任教师，学生30名，一九五六年迁到中公旗沙徒盖村。

民国时期近代学校教育的出现，逐渐排挤和取代了喇嘛教寺院的宗教教育和旧式的封建官衙教育，给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受教育的机会，使之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思想和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教育事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国民党当局推行了民族歧视政策，加之日寇的侵略，民族教育事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 解放后的民族教育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了，包头获得了新生。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包头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包头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解放前的包头民族教育是一个灾难深重，一派萧条衰败、破烂不堪的景象。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包头市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怀民族教育事业，随着包头经济的迅速发展，包头民族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但我市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经历了十六年的发展繁荣时期，也遭受了长达十年的浩劫。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市民族教育事业也从濒临毁灭的绝境中得以挽救，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 民族教育发展和繁荣时期

（1949—1965）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由旧社会惨遭民族压迫濒临灭亡的民族

教育事业,获得了新生。

包头市人民政府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成立,三月十八日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定了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一方面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组成国营经济,另方面维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商业,使遭受破坏的、陷于瘫痪的社会生产,逐渐恢复。

一九五〇年,人民政府接管了“萨拉齐县立第三小学”,本着“既承认历史,又照顾现实”的原则,将原萨拉齐县立第三小学命名为“萨拉齐民族小学”,由董英任校长,初级班四个,高级班两个,学生259名,教职工12人。一九五八年政府加强民族学校领导,提拔了回族教师马国章为校长。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间,还办了蒙文班两个,学生70人。一九六一年,全校有十四个班,学生660名,教职工28人。

一九五〇年八月,把包头七个清真寺里学习阿文的班联合起来,改为“回民联合小学”,当时教导主任是王际春(回民)同志,学生半天学阿文,半天学汉语文。为了加强回民联小的教学力量,一九五一年八月,政府把从北京回民学院分配给包头的五名回族师范毕业生中的四名分配在这个民办学校,同时,从其它学校抽调了几名教师充实了力量,教职员工增加到11人,政府任命丁冠英(市政协委员)兼校长,麻永清为副校长,马真为教导主任。同年九月政府决定正式接管这所学校,从此,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私立民办的历史,成立了由国家管理的公立学校,并决定原召拐子清真小学地址归还回民联小,一一一六年级完全小学,学生增加到440余名。当时,教室不够用,将清真大寺后院、直鲁豫寺、大仙庙等三处为分校上课。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正式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组织。一九五二年春,党中央毛主席派出的少数民族慰问团来到回民联小,慰问团团团长彭泽民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毛主席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关怀,并把毛主席亲自题词的“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赠给了回民联小。一九五四年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和教育工会。一九五六年在东营盘梁新建了拥有二十个教室的校园,一九五七年秋天开学,学校改名为“包头市东河区回民小学”,全校800余名师生,同年东河区委派一名党员干部,建立了党小组。一九六〇年九月被东河区委和区政府命名为“红旗标兵学校”,一九六二年自治区确定为预备重点小学。

一九五二年,哈业胡同乡梅力更召嘎拉舟比扎拉僧活佛办起一所蒙古族小学,教育经费由活佛本人支付。活佛因此受到政府的表扬,并被选为绥

远省佛教协会理事，该校有教师6人，学生40多人，一九五六年，该校并入乌拉特前旗的蒙古族小学。

一九五六年，阿都赖小学又重新在永富村恢复办学，由教育部门委派吴仲会同志担任教师，学生近30名，这时的学校叫“新蒙小学”。一九五七年由永富村迁址到阿都赖。一九六一年，仅用1000元盖起了面积为162平方米的教室和59平方米的办公室。同年十月，市教育局局长吴文彬同志参加了该校的校庆活动。吴仲会同志多方联系并经上级批准，聘请了一名蒙古语教师，叫郭景荣（蒙，女），开始加授蒙语课。一九六二年少年先锋队组建。一九六三年上级拨给6000元，建起了一栋面积为162平米的三个教室和八间家属宿舍。教师有8名，学生有70多名。一九六二年升学考试中，该校首届毕业生以100%的合格率全部升入包头市蒙古族中学。

一九六四年发展为完全小学，学生有120人，教师有12人。

一九五四年以前，实行“旗县并存，蒙汉分治”体制，萨县境内的蒙古旗聚居区属当时土默特旗第六区管辖。一九五四年以后，绥远省人民政府考虑到这一体制对民族团结不利，公布结束“旗县并存”实施方案的命令，蒙六区划归萨县。一九五六年，首先在小召子乡鳞太营子村成立了民族小学。村民们自筹资金，兴建起三间土木结构的教室，聘请了两位民族教师，一位叫李继东，一位叫常志忠，学生有78名，采取加授蒙古语文的教学形式。一九五九年后，除鳞太营子民族小学外，又分别在萨拉齐回民小学附设两个蒙古族班，将军尧小学附设一个蒙古族班，仍以加授蒙文。一九六三年，将军尧小学蒙古文班发展到四个（三到六年级各一个班）。一九六六年，经上级批准，建成土右旗将军尧民族中学。

一九五七年初，在全市推广斯拉夫蒙文（新蒙文），由市政府决定，市教育局主办的在职干部学习新蒙文班，学员有38名，学习时间为六个月，学习班教学负责人阿古拉，教员有5名，胡和、森格、杨吉玛、杭日玛、乌云格日乐，学习班地址在青山区自由路。后来推行新蒙文的工作停止而学习班也停办。职工学习蒙文的班次设在市职工工业余学校，当时教员有2名，一个叫那木海，一个叫胡和。

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决定在包头建设钢铁基地。一九五六年，随着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包头民族教育为适应包头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

育事业的需要,中共包头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昆都仑区乌兰道北,建立一所蒙小,由市教育局负责筹建。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完成基建任务,市教育局委派阿古拉同志筹备开学工作,阿古拉同志筹备一段时间后,调到市政府办公厅搞翻译工作。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式开学,当时校名定为“包头市蒙民小学”,直属市教育局,第一任校长李贵同志,蒙文教员有:杭列玛、杨吉玛、格三同志。招收汉、蒙古、回、满、朝鲜和达斡尔等各族儿童入学,一九六〇年,蒙小党支部书记巴德玛(达斡尔族、女)。同年,兰清泉校长代表蒙民小学曾出席过全国群英会。一九六一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到蒙民小学参观,蒙哥马利元帅让孩子们唱蒙古语歌,当孩子们唱了蒙古语歌后,蒙哥马利高兴地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共产党伟大!”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由市里投资,于一九五七年筹建一九五八年落成的一所设备完善、初具规模的汉、蒙、回、朝鲜、达斡尔等各族幼儿的乐园——包头市民族幼儿园。第一任园长巴德玛同志。保教人员共有21人,入托幼儿100名,设四个班,每班一名老师,两名保育员,分日托、全托两种。一九六〇年巴德玛同志调到蒙民小学,由韩素贤(蒙古族,女)任第二任园长,这位年轻妇女无儿无女,她爱国如家,工作兢兢业业,老师们叫她韩大姐,孩子们称她韩妈妈。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为了减少国家负担,韩素贤同志带保教人员到后山狩猎打黄羊,进一步改善了幼儿们的伙食。家长们都说:“生活在民族幼儿园的孩子们,幸福极了!”

一九五〇年春,固阳县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固阳私立知行中学由县人民政府接管,校名改为“固阳新生中学”,高晓峰为校长,学生有100余名。一九五二年四月乌盟迁到固阳后,“新生中学”改为“绥远省立乌盟中学”,每年级招收蒙古族学生一个班。一九五二年七月乌盟政府盟长毕力格巴图、人事处长杨森茂召见达瓦泽拉森、高晓峰,宣布了乌盟中学校长为达瓦泽拉森,副校长兼教导主任为高晓峰。一九五六年达瓦泽拉森校长调盟委,由斯日敖道同志接任校长。一九五八年,乌盟政府迁往集宁,固阳划归包头市管辖,乌盟中学蒙古族师生随乌盟政府迁到集宁,把这所中学的名称改为“包头市立第十中学”,校长是王显启同志。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包头蒙古族中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参加典礼的有副市长张定安同志和副市长云世英同志,并讲了话,还有市有关部门

的领导。校长是德格尔胡同志，教导处和总务处负责人为吴景海、薛清元二同志，教职员工有30余名，学生130余名，是包头十四中学蒙生部的学生。包头十四中学在巴盟乌拉特旗白彦花苏木境内（当时包头市管辖），分四个教学班，初中三个班，全部蒙文授课，高一一个班，部分课程汉语授课。包头蒙古族中学校址在昆都仑区青年路十二号街坊（现在的包头歌舞团院内）。一九六三年，为了改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为祖国建设培养蒙汉兼通的人才，对教师队伍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先后调入了大专毕业生18名，将部分教师调到小学和改做其它工作，80%的教师达到大专程度，其中本科生占三分之二。

包头蒙古族中学建成时，正处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校舍简陋，设备条件较差。当时学生来源主要是乌拉特前旗和固阳县农牧民子弟。党对民族教育的“公办为主，寄宿为主，助学金为主”的政策在包头蒙古族中学实行后，极大鼓舞和调动了全校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由四个教学班发展到八个教学班。包头蒙古族中学当时受内蒙古教育厅和包头市教育局双重领导，各级政府对办好包头蒙古族中学很重视，内蒙古教育厅厅长戈瓦、包头市市长云世英等领导同志经常到校视察工作，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问题。一九五六年首届高中毕业生升学率达70%。这批学生中，现在有的成为工程技术人员，有的担任盟市旗县级领导工作，有的成为内蒙古摔跤、马术、射击等运动队的优秀运动员，温都尔玛主持内蒙古电台蒙语节目，被听众誉为“草原百灵”。

## 民族教育十年浩劫

（1966—1976）

一九六六年前门饭店会议上，“揪出”了乌兰夫同志之后，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掀起了揪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运动高潮。这一运动波及到包头，把包头的民族学校领导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干将、骨干，被揪斗关进“牛棚”。一九六七年一月由上海掀起的反革命的“一月风暴”全面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包头市民族学校的权也被夺了。

一九六八年，滕海清等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全自治区开

展了“挖肃活动”——“挖乌兰夫黑党”、肃清“乌兰夫黑帮”流毒的运动，又一次揪斗了民族学校干部和老师，把“包头市蒙民小学”改成“包头市东方红小学校”，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包头市革委会常委会议作出了取消“包头市蒙古族中学”的决定。特别是挖内人党开始，把民族学校的民族教师和有些学生，打成“新内人党”，揪斗关“牛棚”，有的教师被赶出包头市，落户于牧区。在这年代里，民族学校深受灾难，民族教育遭受了十年浩劫。

### 民族教育恢复和发展

(1977—1987)

“一唱雄鸡天下白”，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结束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深受浩劫的民族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包头市蒙古族中学恢复正式开学上课，新校址在昆都仑区青年路东段，占地三十亩，除教学楼外，还有学生食堂和四栋平房宿舍。阿尤拉同志任学校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玛喜巴雅尔、刘雪同志任副主任。学校有教职工101人，有600多名学生。

一九七九年四月，原校革委会撤消，任命丁守义为“包头市蒙古族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玛喜巴雅尔为副书记，刘雪、浩特志同志为副校长。同年十月，在校园南墙扩建了一栋学生宿舍楼，占地十五亩，一九八〇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确定为首批民族重点中学。15名教职员从政治上全部平反，并在生活、工作等方面妥善安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民族政策，全校前后发展党员21名，其中蒙古族13人，占62%，校内提拔到科级以上干部22人，其中蒙古族15人，占73%，一九八二年，内蒙古教育局投资五十万元，建教工宿舍楼一栋，改善了50多名教师住房条件。一九八四年，根据机构改革“四化”的要求，包头市蒙古族中学的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吉格木德同志为校长，哈斯、亚璜二同志为副校长，丁守义任党总支书记。教学班25个，在校生达830多名，教职工有164人，其中任教的104，（专科以上学历者有86人，占82.6%，其中本科生50人，占48%）。



从复校到一九八六年底,包头蒙古族中学共毕业学生2021人,其中初中九届1413人,高中六届608人。在历届高考中,有72名学生考入高等院校,考入高中中专59人。郝永贵(蒙古族)老师一九八四年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

一九八〇年九月以来,包头市蒙古族中学先后与日本“熊猫俱乐部”、“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日语教材赠书会”建立了联系,共接受日方赠送图书资料六十多种,一千余册。

土右旗民族第二中学,前身是土右旗蟒太营蒙古族小学,建校于一九五六年,“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办。一九七五年十月正式开学,蒙古族学生198名,教学班五个,小学四个班级,初中一个班,教职工20人,校长是奇柱柱,教导主任是段德荣。一九七九年土右旗委,旗政府正式批准将“蟒太营蒙古族小学”改名“土右旗第二民族中学”,同年七月首届初中毕业生102名,均被包头市、呼市土中录取,升入高中。校长是奇柱柱,副校长是杨志国,程德荣,教导主任是黄玉玺。学校建筑面积达4505平方米,校址占地面积120000平方米,教学班增设到十四个,其中小学八个班,初中六个班,在校生705。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六年,初中毕业生八届十六个班,1070名毕业生,其中25名考入大专院校,一名叫郝茂荣(蒙古族)同学考入研究生,175名考入中等专业学校,128名参加了工作。教职工增到68名,其中蒙古族47名,汉族21名。

土右旗第一民族中学,建于一九八〇年,同年九月交付使用,建筑面积为2637平方米,一九八二年又落成教学大楼,使用面积为3542平方米。一九八四年秋季,建成面积为948平方米的大礼堂。这几年,建筑费一项就投资了一百五十多万元。一九八〇年,土右旗委派旗教育局副局长白景升(蒙古族)同志筹建土右旗第一民族中学,并兼任校长。一九八一年秋,白景升同志调回教育局,由郝子贞(蒙古族)同志任校长。一九八二年冬由云和平(蒙古族)同志任校长。一九八四年六月由云广聪(蒙古族)同志任校长。一九八六年元月由奇柱柱(蒙古族)同志任校长。

一九八〇年,招收初中班四个,学生185名,高中班一个,学生45名,教职工79人,授课汉文为主,加授蒙文。一九八三年五月,腾出原来的平房,成立了“土右旗民族幼儿园,”招收5—6岁蒙古族儿童,经过两年的蒙古语对话学习,升入纯蒙古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三年级加授汉语文

历年投资、设备、受奖情况表

年度	投资	设备	获 奖	
			集 体	个 人
1974	6万元			
1977		28马力拖拉机		
1978	2.8万元		包头市先进集体	
1979	3.1万元	汽车一辆	" "	郝存柱市级先进工作者
1980	7.6万元		" "	奇柱柱市级优秀教育工作者
1981	2.65万元		土右旗先进学校	杨治国市级优秀党员
1982	4.15万元		土右旗民族团结先进集体	高勇旗级民族团结代表
1983	1.55万元		" "	奇慧敏自治区级优秀班主任
1984	1.9万元		包头市先进集体	黄小勇市级优秀班主任
1985	2.78万元		包头市先进学校	祁石柱自治区级优秀班主任

课。一九八三年秋季设立了小学部，一九八六年，全校有幼儿班2个，小学班8个，初中班6个，高中班5个，在校生987人，其中蒙古族学生425人，教职工120人。

建校以来，初中毕业生六届十一个班，530人，高中毕业生三届五个班，230人。历年考入大中专生70名。

包头市回民中学，建校于一九八四年。我市为了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一九八四年，自治区和市政府拨款一百二十万元，腾出东河区一所小学，兴建了规模壮观、具有民族特色、占地4050平方米的回民中学，

并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受到了全市回族人民的称赞。校长由刘忠同志担任,副校长由雪家琦、李贞同志担任。教职工42人,其中教师20人,行政人员22人。设八个班,高中两个班,初中六个班,学生388名。一九八六年又拨款10万元,建立了语音室、电算室、电教室。教职工79人,其中教师54人,行政人员35人。十八个班,高中六个班,初中十二个班,学生有905名。

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曾一度被改为“东方红小学”的“包头市蒙民小学”又恢复了原来的校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了民族教育,一九八一年起,由蒙汉合校逐步过渡到纯蒙古族学校,根据包头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从一九八一年秋季,只招收蒙古族学生,面向全市招生,设置了学生宿舍和食堂,配备六名保育老师,负责200多名住校生的食宿工作。一九八一年八月,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来蒙小视察工作。现有教职工63人,其中少数民族教职工40人,全校有五个班蒙语授课,五个加授汉语的蒙古生班,有两个朝文班,蒙古、朝鲜,达斡尔、回、满等七个民族的学生243人。一九八〇年,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蒙语对话能力,学校组织蒙语授课班师生赴巴盟乌拉特前旗白彦花苏木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一九八〇年,莫日根老师参加了内蒙古优秀班主任座谈会,一九八二年,海日图老师被评为内蒙级优秀班主任,郝云凤老师被评为内蒙古优秀辅导员。

三十年来,共毕业了一百零七个班,其中加授蒙文的三十个班,纯蒙语授课的五个班,并输送毕业生6568名,其中蒙古族学生1215人,蒙古族学生脑干、汉族学生宋璐璐现已留美求学。

一九八五年,市政府拨款一百万元,重新建设教学大楼,现正在施工之中。

郊区阿都赖村蒙民小学,一九八一年,由原“新蒙小学”蒙汉分校,改称“阿都赖村蒙民小学”,该小学毕业生云文彬(蒙),在初、高中后,考入吉林大学,现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专攻高能物理。

一九八三年,为了集中办好民族小学,把原郊区梅力更蒙小、阿彦沟蒙小、柏树沟蒙小、卜尔汉图蒙小等四个合并成为“郊区阿嘎如太蒙古族小学”。

一九八一年,固阳县成立了“固阳县蒙古族学校”,校长乌力吉图。现有

学生196名，教职工46人。

东河区回民小学，一九七八年被自治区确定为首批重点小学。五年级每年毕业生的合格率逐年稳步上升。

年 度	合 格 率	年 度	合 格 率
1978年	40%	1979年	52.7%
1980年	68.5%	1981年	74.2%
1982年	76.6%	1983年	79%
1984年	97%	1985年	98%
1986年	99.3%		

一九八一年十月，五年级一班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的“红花集体”，班主任回族教师哈秀英同志一九八二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模范班主任”，一九八三年五月被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命名为“全国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一九八四年一月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获得金质奖章。

一九八四年七月，东河区回民小学五一中队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学雷锋小组”、“全国优秀中队”，五年级回族学生王晓霞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代表会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现在包头市东河区回民小学共有一至五年级十五个班，有753名学生，其中回族416名，蒙古族6名。教职工41名，其中回族13名。

三十多年来，先后毕业了八十七个班，学生3563名，其中回族2259名。

近四十年来，我市民族教育，逐步形成了从幼儿、小学、初中、高中的民族教育体系，市教育局设立了民族教育科，少数民族聚居的五个旗县区教育局也设立了民族教育科，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我市少数民族87000多人，其中蒙古族26696人，占全市人口的1.6%，回族27445人，占全市人口的1.67%。包头市民族教育主要是蒙古族和回族的中学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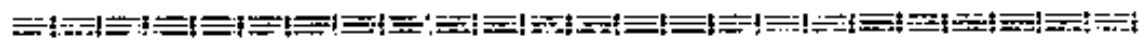
据一九八六年统计，全市共有中学生119469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5605人，占全市中学总数的4.8%，蒙古族中学生2750人，占全市中学生总数的2.37%，回族中学生1802人，占全市中学生总数的1.55%。其它少数民族学生1045人，占全市中学生总数的0.9%，全市共有小学生105508人，其中少数民族小学生6237人，占小学生总数的3.77%，蒙古族小学生

2750人，占小学生总数的1.66%，回族小学生2368人，占全市小学生总数的1.48%，其它少数民族小学生1119人，占小学生总数的0.68%。

包头市民族中小学校十一所（统计表附后），其中小学七所（蒙小五所，回小两所），中学四所（蒙中三所，回中一所），民族幼儿园两所（昆区民族幼儿园、土右旗民族幼儿园）。

包头市民族学校分布在昆区、东河区、土右旗、固阳县、郊区等五个地区，十一所民族中小学校中市属两所完全中学（包头市蒙中、包头市回民中学），旗县区直属七所（土右旗两所中学，其中十一年制一所，八年制一所，郊区完全蒙小两所，固阳县一所，昆区一所，东河区一所），苏木（乡）属两所。

本文作者：阿古拉，现任包头市民委主任、市人大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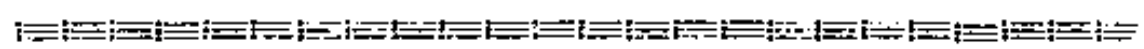


## 钢城遍地

### 映朝晖

易 磐

龙年春早待佳音，  
东望京畿朝气腾，  
六千贤士商国策，  
十大任务负艰辛。  
民主自由推陈腐，  
集思广言开先声，  
国运昌隆多舜尧，  
赤诚奉献一片心，  
人大政协并蒂开，  
千树万花报春回，  
东风有意寒食雨，  
北疆多骄清谷雷，  
济济人才倾肝胆，  
耿耿忠言表心微，  
三项指标要实现，  
钢城遍地映朝晖。



# 蒙古族中学的过去和现在

高志昌 王新洲

包头蒙古族中学前身为包头市第十四中学蒙生部，校址在今巴盟乌拉特前旗白彦花苏木。1962年11月24日，迁到包头市昆区青年路（现为市歌舞团所在地）。从此，包头市第一所蒙古族完全中学诞生了。德格吉尔胡同志担任了蒙中第一届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当时，学校规模小，校舍简陋，设备不齐。教学班仅有四个——初中三个年级各一个班，高中一个班。学生共有130多名。教师30来名，有专科学历的教师仅五名。图书、教学和实验仪器都很短缺。由于上级领导的重视，到1966年，师资98%达到专科学历，本科生占三分之二。教学质量不断提高，首届毕业生的升学率就达70%。那些当年的娃娃今天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人才。宝音德力格尔现任巴盟副盟长，阿拉坦初鲁现任巴盟乌前旗副旗长，敖日浩岱是辽宁阜新市电厂的工程师，温都尔玛以她响亮的歌喉被誉为“草原百灵”……。

正当这座蒙古族中学健康发展的时候，一场罪恶的“大革命”开始了。一个好端端的学校很快陷于瘫痪。几经折腾，沧桑变迁，结果使蒙古族中学在“挖肃斗争”中并入了市二十六中学。直到1974年，市革委会决定恢复蒙古族中学，由上级投资，着手在阿尔丁大街与青年路交叉处建新校舍。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一座占地45亩、建筑面积6000m<sup>2</sup>的品字形四层教学大楼拔地而起。1977

年9月1日，包头蒙古族中学正式复校开学。阿尤拉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9年阿尤拉调自治区教育厅，丁守义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包头市委、市政府十分关心蒙中的建设。1982年5月，蒙中批准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市政府特颁《包政发(82)4号文件》，分给蒙中八套楼房，同时决定新建一座住宅楼，教师住房得以缓解。学生的助学金与细粮供应标准也有了提高。同时从几所学校抽调部分骨干教师充实加强了蒙中的师资队伍。1984年4月10日，机构改革时，蒙中定为准县级，总支书记由丁守义担任，校长由吉格尔木德担任。党的民族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全校教职员办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办学思想端正了，教学质量提高了。1979年蒙中被教育部、体委、卫生部、团中央命名为“体卫工作先进单位”，同时被评为内蒙古群体工作先进单位。1984年被评为“自治区民族教育先进集体”。1980年至1985年连续被评为包头市先进单位，并获区、市二级文明单位称号，还评为市学习使用蒙文蒙语先进单位和民族团结先进集体。1984年以来，《包头日报》、《内蒙古日报》、《内蒙古教育》、内蒙古电台等新闻单位报道蒙中先进事迹达三十多次。

现在的包头蒙古族中学，校院宽敞，四层教学楼装饰富有民族特色。内设理化生物仪器室，电教室内有显示器、投影机、录相等设施；电算室配有50台电算机；语音室56个座位，设备齐全；音乐、美术室各一，另设有教工之家、荣誉室等。教工图书室藏书27800余册，其中蒙文图书500余册。学生图书室藏书8000余册，供教师和学生阅览的图书、杂志和书报种类齐全，应有尽有，阅览条件也是较好的。

校园内另有教工住宅楼一座，平房宿舍两栋，学生宿舍楼一幢。新建饭厅兼礼堂面积1300m<sup>2</sup>，浴池（包括洗衣间、理发室）200m<sup>2</sup>，简易托儿所三间、大小车辆三辆。另辟勤工俭学“天骄

商店”门市部一月，年收入万余元。

蒙中现有教学班24个，其中蒙语授课班8个，职业班两个。共计学生830多名。住校生600余名，全部享受助学金。学生都来自包头市所属八个区旗县。蒙族学生占94%，其余皆汉、满、回、达斡尔、藏等民族学生。教职工队伍也在逐年壮大，成为一支有良好教学素质的骨干力量。现在全校共有教职工174名，主体民族占53.6%。中层以上干部12名，全部大专学历，主体民族占75%。教师104名，本科生49%，专科生占33.7%，主体民族占58.7%。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通习蒙汉两种语言。在今年的职称评定中，有15名教师被评为高级教师，其中蒙古族8人，回族1人；一级教师54人，其中蒙古族27人，满族1人；二、三级教师60人，其中蒙古族41人。广大教师忠诚党的民族教育事业，热心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许多人被评为盟市级和国家级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等。陈甫清老师在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评比中榜上有名；郝永贵老师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荣获金质奖章。还有内蒙古、市、区三级人大代表各一名，市、区两级政协委员各一名，全国教育工会第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一名。有不少教师在各科学会中担任理事长、秘书长等职务，有十几名教师被评为区、市级优质课教师。1984年以来，有二十多名教师撰写教学论文28篇，其中17篇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或在学术会上交流。刘致同志的论文在全国化学学会上交流，莫日根老师的论文被内蒙古高等院校教材编译部采用，郑国存老师的《初中化学练习册》印刷17000余册与兄弟学校交流，贡嘎老师编写的蒙、汉、日三语对照的《日语常用词词典》有关部门予以充分肯定。

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学校工作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指导，在教学上强调教学方法改革，大力开辟第二课堂。1985年以来，开始在初一进行“数学自学辅导课”的尝试。实践证明，实验班比普通班成绩提高的幅度大。1986年又在高一蒙古语授



课班进行了部分课程汉语授课的实验，这一尝试既培养了学生的汉语听、说、学的能力，又使学生的思路扩展。这对培养蒙汉兼通的人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教育结构改革方面，蒙中主动创办了“蒙、汉、英”三语为主的“旅游服务职业班”。第一届毕业生在包头宾馆实习期间受到了好评，有五名学生被聘到北京燕泽饭店工作。

学校积极贯彻民族教育的“两主一公”政策，即学生以住校为主，以助学金为主，学校为公办。奖学金比例也逐年有所提高。为培养蒙汉兼通人才，设立了“三语奖”。此外，还组织了电算、摄影、生物、放映、文艺、体育、美术等各种课外活动小组。其中蒙古语组的蒙文文艺刊物《春芽》与汉语组的文学社《朝花》特别活跃。《春芽》月刊与兄弟盟市民族学校进行交流，有20多篇学生蒙古文作品发表于盟市级刊物上，《朝花》文学月报为85届高二文科班主办。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课外活动，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浓厚兴趣，而且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该社主编赵东同学在1986年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系。在大学期间，他又组织了“诗社”，出版了诗集，受到院党委、团委的好评。

蒙中是一所完全民族中学，初、高中学生来源都很分散，各校教学差异很大，加之教育教学起点低，基础差，给教学带来一定困难。但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成绩还是显著的。从复校到1986年止，共送走初中31个班，1169名学生；高中19个班，毕业生634人，其中116人考入区内外大学。其中上国家重点大学的就有25人。1984年升学率为25.9%；1985年为30%。1986年考入大中专院校学生32名，在内蒙古十五所民族重点中学中，包头蒙中名列第四，1987年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就有19人。

包头蒙古族中学也是对外开放单位。几年来，接待了多批日本、美国、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及联合国的参观旅游团和教

育考察团，给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日本“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熊猫俱乐部”、“日语教材赠书会”有直接通讯往来，接受赠书共七批60种，计1100余册。有较多的学生与日本中学生保持通讯联系，这对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做了有益的工作。

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是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维护和加强民族团结，是民族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二十五年来，包头蒙中的蒙、汉、回、满等民族的教职员工，团结互助，和睦相处，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在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导下，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包头蒙古族中学将继续努力探索，不断实践，为现代化建设培养蒙汉兼通的四有人才，为振兴包头民族教育事业而奋斗。

本文作者：高志昌、王新洲均系中共包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辑。

## 迎 宾 客

——在访问座谈会上

赵 炳 鸿

包头渝州情意浓， 万里征途传真经，  
遥远相望今相逢。 认真学习记在心。  
满怀热情迎宾客， 发挥职能生效益，  
欲望诸君助亲朋。 钢城改革建功勋。

（作者为重庆市大渡口区原政协主席）

## 发展中的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远峰 阎充英

座落在昆都仑区的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包头市建立较早的一所医院，她随着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和我市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断成长壮大，现在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医院，基本上能适应高等医学院校的临床教学需要。30年来，她为包头市及邻近盟市、旗县人民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障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完成了包头医学院的临床教学任务，为培养造就医学卫生人才贡献了一份力量。

### 艰苦创业 曲折前进

1956年，在大青山南麓的昆都仑河西岸，包头钢铁基地的建设全面铺开。随着包钢的大规模建设，市级领导机关迁往新市区，商业服务网点纷纷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市里决定在未来包头的中心，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她就是第一附院的前身——包头市第一医院。1955年冬，市政府及卫生局确定了筹建方案。1956年4月，由华北建筑工程总公司承担的面积为8426平方米的病房大楼开始施工。同年9月，在当时的包头市人民医院成立了“综合医院筹备组”，由韩振武任组长，负责新医院的人员集结和设备购置等工作。

1957年初，市卫生局决定，将在昆都仑区新建立的医院定名为“包头市第一医院”，原在东河区的包头市人民医院改称市第二医院。原市医院抽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及骨干医生到第一医院，成为这个医院的基本队伍。

包头市委和市政府对第一医院的建设相当重视，从医务人员的配备到建设进度，主要领导都亲自过问。1957年春，病房大楼刚刚完工，正进行外部

装修工程时，一次蔓延很广的流感波及到包头，威胁着包钢建设者的健康。为了迅速制止病情的蔓延，市委决定第一医院提前开诊。市委第一书记苏谦益亲自对医院筹备组负责人康子铮等说，不要等交工了，你们马上准备开诊，边打锣鼓边唱戏吧！包头市副市长张定安亲自到医院，听取汇报，具体研究解决开诊的有关问题。市委决定邢青云任院长，康子铮为副院长。按照设计规模，当时医院拥有病床200张，人员230多名，其中医务人员160多名。

4月1日，第一医院正式开诊。为了全力对付流感，开诊时只设流行性感冒门诊（即内科、儿科）。5月份，流感患者逐渐减少后，才陆续增设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门诊。

医院在应急情况下提前开诊，困难很多。大夫少，护士缺，设备不足，而流感严重，病人骤增，工作量十分繁重。全体医护人员不叫苦，不喊累，团结一心，迎着困难前进。人员不足，大家加班加点，互相支援。门诊大夫上班前到病房查房，下班后再到病房照料。设备短缺，同志们想方设法，以代用品顶替。放射科的同志自己动手安装X光机，及时配合了临床诊断工作；制剂室及时配制出葡萄糖等，满足了治疗的需要；化验室的生化、血清、细菌培养等均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配合临床需要及时进行的。就这样，经过全体医护人员艰苦奋战，开诊3个月，共接待门诊病人18,584人，平均日门诊量达300多人次。

第一医院的提前开诊，不仅在防治流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支援了刚刚开始建设的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为新兴市区——昆都仑区奠定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础，为包头市的医疗卫生队伍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

创业是艰难的，前进的道路则是曲折的。

开诊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始了。一些积极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外科医师潘世辉被错打成“右派”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诬为“反革命”，判刑劳改。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不仅把群众的高度政治热情搞成了得不偿失的无效劳动，而且打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这时，全院病床增加到300张，日门诊人数保持在400至800之间，医院职工236人，其中医生仅24人，护士

44人。10月，院内建起了小高炉，全院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搞“大炼钢铁”，其余医护人员白天上班，晚上砸矿石、炼焦炭。同时，还抽调1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4个医疗队，到“钢铁前线”服务。当时，昆都仑水库正在兴建，这个医院又组织了11人的医疗队，为水库建设者治病。这样，留在医院的同志只得一人干几个人的工作，临床科室人员的工作时间经常在12小时左右。

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科室之间的界限被打乱了，许多规章制度被破掉，搞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新名堂：如实行所谓“四合一”（即医师、护士、护理员、卫生员“四位一体”的协作），取消了卫生清洁员，由医生、护士担任卫生清洁工作，美其名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取消了病房探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病房，还搞了病历下放、取消挂号、分科打针等所谓“方便群众”的措施。在科研方面，提出“人人搞科研，个个献厚礼”，大搞什么“超声波”，当时把它吹得神乎其神，百病皆治。由于它缺乏科学根据，结果是一阵风，昙花一现。总之，在“大跃进”中，医院工作不仅没有什么“跃进”，而是大大后退了。

在三年困难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医院的工作才回到正常轨道，把医疗工作真正当作中心抓了起来，恢复了正常医疗秩序和各项规章制度，抓医护队伍的建设，使医院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60年，全市普遍出现浮肿病。根据市委指示，医院专门设立了浮肿病门诊，随之各科也开展起一些新的业务，如内科的防痨门诊和高血压、溃疡病专科门诊，眼科的角膜移植，耳鼻喉科的教室成型术，外科的肺叶切除与食道癌手术等。与此同时，医院加强了对医护人员的业务培训，组织医士学习医学基础理论；给护理人员讲授药理学、实验诊断学等，大抓注射、输液等基本功训练，形成了一种浓厚的钻研业务的学习空气，许多中、高级医务人员，积极学习外语，翻译外文资料，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医疗水平。

1963年2月，包头医学院58级学生进入生产实习。医学院已由东河区原址迁来昆区，原位于东河区的教学医院（即第二医院）因交通、住宿条件所限，无法适应包医学生生产实习需要。为此，市委决定将市第一医院改为包头医学院附属医院，任命包头医学院副院长李汇文兼任附属医院院长、党总支书记。

包头医学院下马后，1965年5月，经市委领导批示，附属医院又恢复了第一医院的名称，但仍担负着当时包头医学专科学校的临床教学任务。这段时间内，医务人员在完成教学任务过程中受到锻炼，教学促进了医疗工作，也促进了医院的发展。1965年医院职工人数超过400名，日门诊量达1000人次以上，全年就诊人数达三千多万人次。同建院初期相比，七年中，门诊工作量增长了两倍多。

正当这所医院在健康发展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时候，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又经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在“文革”中，几乎所有领导干部和高级医务人员都遭到批判、揪斗。一些全市著名的高级医务人员，如李汇文，康子铮，陈燕，白之炯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剥夺了看病的资格，被长期强迫到洗衣房劳动，打扫厕所，走廊，倒炉渣灰，挖防空洞。在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制造的内蒙古“三大冤案”中，这个医院有20多人被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100多人被点名批判，150多人被打成所谓“内人党”，有的受到各种摧残和折磨。各种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彻底破掉，正常的医疗和工作秩序再一次被打乱。在所谓“学习解放军”的名义下，连各科室的名称都改为“班、排、连”建制。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医院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根本不懂医疗的“大老粗”在医院发号施令，主宰着医院的一切，知识分子则被视为“臭老九”，只有接受改造的义务。长期的无休止的派性斗争，严重地破坏了职工队伍的团结，使一些同志之间形成很深的隔阂，成了包头市有名的“老大难”单位之一。后来医治这种心灵上的创伤，消除派性，增强团结，医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1971年，包头医专招收第一批学员后，医院又开始担负临床教学任务。次年5月，第一医院改名为“包头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1978年，教育部批准包头医专改为包头医学院后，医院也随之改名为“包头医学院附属医院”。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原建工局职工医院划归包头医学院为第二附属医院，原附属医院改称为“第一附属医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第一附属医院开始了她的发展史上新的里程。

### 救死扶伤为人民

从建院起，医院就非常重视医疗队伍的建设，千方百计提高医疗水平，

更好地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

在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每年都从全国著名医学院分配一些毕业生到这里，逐步充实了医疗力量。医院几乎每年派人到北京、上海等著名医院进修学习，主治医师以上的人员，都进行过专科对口进修学习。医院还抓住各种机会，邀请一些医学专家、学者到本院会诊、讲学，这也是使本院医生开阔眼界、提高学术的好机会。如北京医学院教授谢荣、内蒙古医学院教授王聘臣等来包时，都曾请他们来院讲学、会诊。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医院的医务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些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先进人物。儿科医生蔡化理，刻苦钻研业务，采取中西结合办法治疗小儿毒性痢疾，取得了明显成绩，出席了1960年召开的全国高教系统“群英会”。妇产科医师蒋焰，全心全意为产妇服务，曾于1964年代表包头市青年出席了全国青年联欢会，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口腔科主治医师屈昭文、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白玉琳等，都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高教系统的先代会。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成治，多年把自己的爱都奉献给了患者，多次被选为先进工作者、包头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他连续几次当选为昆都仑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随着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开诊半年后，他们就成功地完成了门静脉高压症外科分流术，并在临床运用了低温麻醉法。这种分流术在当时是相当细致而复杂的操作方法；低温麻醉法则是当时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医院刚刚推广的新技术。到1965年时，医院已经能够担负比较复杂的二尖瓣分离术、食道癌切除、输尿管移植等手术了。

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以高超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良好服务态度，为人民解除病痛，使许多危重病人得到及时抢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1959年，帮助包头建设的一位苏联专家的夫人库雷金娃，患慢性肝炎多年，在苏联、东欧好几个国家久治无效，经过这个医院著名中医白之炯用祖国传统医学诊治，很快痊愈。库雷金娃回国后还给白之炯写信表示谢意，并索要处方。

同年，包头热电站送来一位烧伤面积达68%的伤员，经过医护人员精心医护，患者渡过了休克、感染等难关，安全护送到北京。北京积水潭医院曾高度评价了这个医院及时而正确的抢救工作。1963年10月23日，张××骑

自行车与高速行驶的摩托车相撞，当时停止呼吸，送医院后，经人工呼吸，心脏恢复跳动，但入院后持续昏迷25天。其间多次窒息，最长一次停止呼吸达12分钟之久，是罕见的严重颅外伤患者。为了把这位病人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在其昏迷的25昼夜中，医院先后组织了23次会诊。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高锦明、内蒙古卫生厅副厅长朱明辉，曾亲临现场，指导和鼓励抢救工作。经过全体医护人员几个月团结一致地精心治疗和护理，终于使这位患者战胜了死神，痊愈出院。当时我市外科界都认为，这个病人能救活是极罕见的，是包头市医务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近几年来，医疗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曾成功地实施过小儿肠系膜上静脉与髂静脉吻合分流术，抢救过急性肾功能衰竭、腹膜透析14天的患者，配合北京来的医生做过肾移植手术。

多年来，这个医院还担负着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等地危重、疑难病症的诊治与抢救任务，为这些地区的医疗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个医院的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临床实践进行的。不少医务人员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出学术论文，有的还出版了专著。在包头市卫生局和医药卫生学会1963年编印的《1961—1962年包头市医学论文集》近百篇论文中，这个医院的就有27篇，占四分之一。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发起的征集论文活动中，附院共有22篇论文获奖。已出版的作者计有：内科副教授、主任医师康子铮的《发热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内科疾病症状诊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外科副教授孙声和主治医师高全练、马秉良等，在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专门论著《甲状腺外科》；原小儿科副主任、主治医师王有德的《优生优育二百问》和原新医科主任、主治医师张浩的专著《急性腰扭伤的诊治》，也都是他们自己多年临床实践的总结。

为了培养一支能够适应医疗工作需要的护理队伍，医院做了大量工作。建院初期，护理人员严重不足，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无法满足医疗要求。有时，医生不得不负担护理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医院一方面抓在职护理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提高，另一方面自力更生举办各种培训班，解决护士来源不足的问题。

医院经常组织技术交流、业务学习、基本功训练和表演等活动，促进护理人员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一些骨干护理人员还被送到包头市护校以



及其他城市进修学习。

1959年初，为了提高初级医务人员的文化水平，开办了“红专学校”，讲授政治理论和数理化，这是医院办学、培养人材的开始。1965年9月，举办了半工半读护校，学制三年。1981年开办脱产的护士培训班，学制两年，已办两期。上述办学的主要教学力量都系本院医务人员，毕业生除大部分本院留用外，还支援了兄弟医院一部分。

由于有计划地抓了护理人员的培训，使医院的护理质量不断提高。60年代初，进行复杂的胸外科和脑外科手术时，护理人员都能很好地配合，顺利实施治疗方案。在对一些危重病人的抢救过程中，由于护理人员精心护理，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使有的患者免于意外。

这个医院在担负繁重的门诊和住院治疗任务之外，还承担着地段医疗卫生普及、计划生育和巡回医疗工作。这个医院所负责地段内，约有一万余人，每年的卫生防疫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从建院以来，共为数万名儿童接种了各种疫苗。仅1983年间，就为700多儿童接种。卫生普及和宣传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医院经常派出医务人员向地段内的群众宣传普及卫生知识。

1958年，医院曾开设避孕门诊，指导和普及避孕知识。1963年，以妇产科为主，加强了避孕技术指导工作。当年有200多人接受了电吸引后，有59人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术后效果良好。现在，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医院的经常工作之一，设立了“计划生育指导中心”的机构。近两年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组织下，曾先后派出4个计划生育手术队到固阳等地协助工作。1983年，妇产科门诊做人工流产1541人次，上节育环688人次，没有发生过一例事故，医院被评为包头市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

巡回医疗工作。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件所谓“新生事物”。1963年3月3日，医院第一次派出医疗小组赴乌拉特前旗医院，为当地一些卫生单位开办业余学习班和短期专业训练班。这个小组的活动持续了14个月。后来又相继派出人员赴五原卫生院帮助改进护理工作，赴自治区东部支援克山病的防治工作。

1964年5月，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下，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了包头市统一组织的农村医疗工作队，赴郊区哈业脑包公社乌兰计村。同年9月，由医院11名医务人员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农村医疗

工作队到达伊盟伊金霍洛旗。9月22日,院长李汇文带领几名医护人员进入郊区麻池公社。

从此,几乎每年都要派出巡回医疗工作队、组,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至数年在农村、牧区为农牧民服务。到1977年为止,共派出过424人次。“文革”期间,则简直把派遣医护人员下乡当做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惩治:1968年一年即派出112人下乡,占当时医院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971年更“动员”72名医护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

巡回医疗工作虽然对缺医少药的农村起过一定的防病治病作用,受到农牧民的欢迎,但这种不切实际情况,大量抽调骨干医务人员的做法,打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使其负担的主要任务——城市的防病治病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方法上也有许多“左”的教训值得记取。

### 搞好临床教学培养合格人才

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临床教学任务,始于60年代。1961年5月2日,内蒙古医学院56级的32名学生到这里进行毕业生产实习,原定时间6个月,因特殊原因,7月8日提前回校。虽然仅两个月,但已基本按该院毕业生产实习大纲完成了实习任务。这是正式担负包头医学院教学任务之前的一次很好的预习。

1962年3月,包头医学院58级学生进入附院实习。为此,各临床科室成立了教研组,制订了教学计划,以极大的责任心和热情努力满足教学需要。有的教学所需的病例,门诊和病房均没有,他们便千方百计地查找。如内科在讲完毒性甲状腺肿病症后,缺乏病例。他们就凭记忆,找到曾在内科就诊过的这种病人家中。病人起初拒绝,经再三说服动员,才同意让学生实习。

当时医院的师资力量缺乏,也想法设法解决。如局解手术是空白,便请来天津医学院郭世德讲师主讲,同时抽人专门随郭大夫学习。这样,既完成了教学任务,也培养了自己的师资力量。第二学期,这门课便能自己开设了。内科也曾邀请内蒙古医学院的周波池副主任讲血液和内分泌代谢等课程。

良好的开端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到1965年四年间,先后有包医(包括包医撤销后改为卫生进修学院和分出来的包头卫校)本科59级、60

级、专科60级以及中专的医士助产班、护士班、医士班等各类学员进院实习。同时还接受过内蒙古医学院57级学员的实习。绝大部分学生通过实习，初步掌握了各种常见病的诊断和处理，学会简单的手术操作。除此之外，大量的课间实习，也由于医务人员的热心辅导，得以顺利完成。

“文革”初期，临床教学停教。1972年，做为包头医专附属医院，曾担负了工农兵学员的教学任务。从1974年到1977年的四年间，先后有5个年级560名工农兵学员在这里实习过。在“开门办学”的口号下，他们还由搞教学的医务人员带领，先后到集宁、土右旗、达拉特旗、五原、托县及包头矿务局医院等进行实习。

1977年以后，医院同时也是包头医学院的医疗系，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实习课时不断增加，内容也越来越丰富。1980年共完成教学1870学时。现在这个医院已经基本上按照卫生部颁发的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实习大纲完成主要课程的教学和相当一部分实习任务。

此外，这个医院还曾多次接受兄弟医院的进修人员，为培养提高我市及兄弟盟市医务人员的技术业务水平做出了贡献。包钢医院建院时，曾为其培养了18名医师、31名护士。近年来，由于旗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许多地方纷纷派人到这里进修。培训进修人员成为医院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接受进修人员71人，1981年接受44人，1982年37人，他们在附院合格地完成了进修项目，回到当地成为医务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 在改革中开拓前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医院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现在，医院的建筑面积共14100多平方米，拥有病床400多张。进入医院大门，平坦光滑的沥青路面，代替了过去的满地黄沙。医护人员自己动手在房前房后、道路两旁，植树种花，美化环境，使医院旧貌换新颜。近年来，市里投资为附院修筑了4400多平方米的沥青路面，新建了600多平方米的干部病房，床位33张，使老干部们有了比较安静舒适的医疗场所。1984年又扩建手术室200平方米。

第一附院现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眼科、口腔科、

耳鼻喉科、神经科、皮肤科、传染病科、同位素科、手术麻醉科、放射科、检验科等40多个科室。近年来投入使用的检查肝、胃、脾等人体重要脏器的彩色同位素扫描仪、远距离操纵的X光机、B型超声波、血气分析仪、人工起搏器等设备，都是比较先进的医疗器械，还有包括超声心电图、高频宽幅心电图等全套检查心脏系统的仪器。

医院现有职工780多人，医护人员554人，其中副主任医师34人，主治医师149人（包括麻醉师，药剂师、检验师等）。他们中有11名担任着中华医学会内蒙古分会各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的职务；有17名担任着中华医学会内蒙古包头分会及各科学术委员会、中华护理学会包头分会、中国药学会包头分会、中华中医学学会包头分会、中国防痨协会包头分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的职务。

本文作者：阎充英，包头医学院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王远峰，院办秘书。

\*\*\*\*\*

浪  
淘  
沙

雨

弓  
水

茫茫地连天，  
银珠飞溅，  
滂沱如注溢城街。  
何惧汪洋不见边，  
水中欢颜。  
犹记五八年，  
暴雨连绵，  
昆都仑河洪水泻。  
弹指三十今又是，  
人定胜天。

\*\*\*\*\*

# 对我市业余文化学校的回顾

易 磐

从1954年到“文革”前夕，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一直在包头市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工作，亲身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业教生活。离休后，我的学生常来走访，谈起学校变迁，往往口若悬河。其中自然也要提到一些不愉快的事。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供同行共勉。

## (一)

包头市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成立于1949年冬。当时，全市不足10万人口，仅限于今日的东河区旧城。普通中学只有一所，小学数量也很有限。党和人民政府针对职工群众文化素质差的实际情况，责成市工会牵头，教育行政部门配合，首先在发电厂、面粉厂和皮革厂三个企业单位办起了职工业余文化学校。由工会派出张同文、杜孟飞二同志负责，宣布学校的诞生。这时，对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的职工，一律组织在职补习。不久，又在其他行业中连续办起两所业校，地址分别设在金龙王庙与马王庙两所小学内。并派赵守义、王进山、马相韩等负责组织本市商业、饮食服务系统的职工参加进修。很快，学员猛增到千人以上。至1951年春，业余工校发展到五所，分设在官井梁、东门大街两个小学和文化馆内。遂又增派安立言、陈建平、张恩普、杨桂林等主持各校工作。他们根据在职学习的特点，都把授课时间安排在一早一晚，每次约一个小时。代课教师多是从当地中、小学聘请去的。

由于主管部门将学员进修成绩列为考核职工进步的依据，因此学习热情十分高涨，截至年底，在校人数接近两千。这在当时全市职工不及万人的情况下，比数是很可观的。

1954年春，也就是我到教育战线工作的时候，业校实行了统一领导，办公地址设在金龙王庙街六号，由金熙泓同志负责，这时已配备专职教师40余名，担负着全市50多个行业二千学员的教学任务。另外，还代培两个小学七十余名教师的进修课程。

到1955年，业校复由各厂自办，各行业的职工业余文化学校，遂改名为职工中学。这些学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0—1962年），先后都停办了。及至1963年，市工会重振旗鼓，成立了七所职工联校，其分布情况是：

一联校在东河区西脑包，学员来自财贸系统，负责人杜泽民；  
二联校在东河机械厂，学员来自附近各厂，负责人陈汝江；  
三联校在东河耐火器材厂，学员来自附近各厂，负责人郭宗禹；

禹；

四联校在东河印刷厂，学员来自本厂，负责人鲁子亮；

五联校在东河制帽厂，学员来自本厂，负责人姚振声；

六联校在青山区文化路，学员来自本区各单位，负责人张永集；

七联校在昆区一电厂，学员来自一电厂，负责人陈建平。

这七所职工联校，拥有200多名专职教师，承担近万名职工的业余文化教育。几年来，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批的职工群众，从这里拿到了高中或大专文凭，对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普遍成为技术骨干、理论尖子、管理能手。如三电厂的青工郭俊英，原只有小学四年文化，坚持业余学习十年后，取得大专文凭，经过刻苦自修科学技术，现已做了呼市电管局的总工程师。

## (二)

除以上所述之外，包头随着钢铁工业基地的发展，从1955年起，又分区建立了干部文化学校（简称干校）。市直机关的干校诞生于1953年，校址在东河区南门里8号（今包二中南院），设有教室、实验室、办公室等，由王陵负责。专职教师曾多达30余名。开设了初、高中语文、数学、物理、代数等班次。市党政干部踊跃参加学习，学员曾有1500人之多，班级30个，每周除星期六晚、星期日早授课外，其余时间每天早晚业余均上课个半小时。为减轻学员负担，一般是采取单科结业后领取证书的办法。据1960年底统计，单科结业的初、高中学员共有二千一百人，其中有520人领到毕业证。

由于干校创办的成功，在中共包头市委的建议下，从1957年起，专门成立了两个老干部文化补习班，集中了百余位科、处级中不是初中程度的老同志脱产学习二年，多数都取得了毕业文凭。如市文化局前局长田霖同志，在取得初、高中毕业证书后，又在大专班完成了单科学业，被群众赞为真正有文化的局长。

如前所述，当我市两个新区（青山、昆都仑）初具规模时，区级干校遂即建立。青山区干校设在哈达道东侧，由李承泰负责，约有区级机关干部学员400人；昆区干校设在鞍山道（今牛奶站路东），由邬庆华、张镇二同志负责，约有区级机关干部学员450人。两处干校共有教工30余名。1964年两处业干校归并到东河区干校统一办校后，由金熙泓同志任校长，陈磊东、崔亚雄任教导主任，校址设在包二中对面，建有教室、实验室、图书室、宿舍，是一所较完备的业余文化干校。

这所干校，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停办。从1960年起，改为市干校后，曾开设过大专班，设有文艺理论、语法修辞、文学史、现代文学、逻辑学、习作等六门课；数学班开过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等三门课；物理班开过普通物

理、物理化学两门课；化学班开过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三门课。教师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原有老教师中选拔的，计有：吕来芹、张滋生、尹孝元、梁巽龙、李寄萍、戚继豪、易磐、王文正、巫金昌、高守义等。截至1966年“文革”为止，共培养大专毕业学员百名以上。1964年内蒙教育厅秦风川厅长、总工会蒋毅主席等自治区有关部门领导，来校参加大专毕业典礼时，为学员颁发了毕业证书。

### （三）

正当这两所职工、干部业余文化学校蓬勃发展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了；广大学员有口皆碑的业教阵地，一个晚上，居然变成了“牛鬼蛇神”的大本营。上百名的人民教师，被赶进“牛棚”，集中在市工会接受“审查”。在这期间，包括我本人也毫无幸免地被戴上各种“反革命”帽子，遭受着“造反派”的惨绝人寰地轮番摧残。其中被折磨含冤致死的，即有陈汝江、陈绍商、任天元、王沛等多位曾经在业教战线做出贡献的老教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有受害的同志（包括死难的教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之后，我又在包头第七中学，重新登上讲台，度过了幸福的花甲之年，还被组织推荐为昆区政协委员。现在已经光荣地离休了。

本文作者：易磐，系昆区历届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会委员。



# 我所知道的绥远省文工团

郑 玢

## 一、丰镇建团

座落在昆都仑区白彦道的内蒙古话剧团，她的前身是绥远省委文工团。

绥远省委文工团成立于1949年9月11日，是在绥蒙边区党委宣传队的基础上扩建组成的。团址在丰镇县土塘子村。全团共200多人，年龄最大的26岁，最小的12岁，都享受供给制，每月能领到6斤小米的津贴（刚够买条肥皂），还能吃上一顿白面馍或素糕。

文工团的第一任团长是由当时宣传部长王文达兼任，后由刘启焕同志任团长，副团长理为民、张涵，指导员林生。下设戏剧股、音乐股、创作股、美术股、儿童队。曾任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的王世一同志当时是音乐股的股长，现任内蒙古广播电视厅总监的李德隆同志当时是儿童队队长。我当时是戏剧股的演员。

文工团的团歌是由张涵同志作词谱曲的，歌词如下：

我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连，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  
面对着青山大草原，  
要把沙漠变良田。  
要学习工农兵走向民间，  
要喊出受苦人千载的屈冤，

要扫除千百年落后封建。  
这就是大家伙战斗的誓言。  
在工作中，  
要组织新文艺的统一战线，  
在斗争中，  
我们要锻炼成文武双全。  
跟随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  
高举着大红旗永远向前。

文工团虽然是由汉、蒙、回、满、藏多民族组成，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但是相处得很融洽，团结友爱。

刚建团，适逢绥远省“九·一九”起义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我们分组深入到各村宣传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意义。10月1日，我们4、5点钟就起床化妆，背上腰鼓，第一次坐着敞篷大卡车进丰镇城，为庆祝开国大典组织街头演出。从旭日东升，到晚上点起了“旺火”，我们唱啊跳啊，沉浸在欢乐之中，和丰镇人民欢度了最难忘的一天。

我们在丰镇演过的剧目有：《白毛女》、《李大娘送子归队》、《向着八路军》、《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这些演出，在丰镇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 二、迁驻归绥

1949年12月下旬，我团奉上级命令迁驻归绥市，团址在原“恒清中学”。

刚解放的归绥市，满目疮痍，黄沙漫野，人民饱受国民党统治、压榨、盘剥以后，精神上的创伤也很严重，而尽快地医治这种精神上的创伤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我团刚进城就接到上级指示，要求深入到工厂、学校去辅导秧歌、腰鼓、革命歌曲、小型歌剧等。这样做，一方面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将新文艺介绍给

新区人民；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我们学生出身的同志多深入群众，体验劳动人民思想感情，增强劳动人民气质。我们分成几个辅导小组分赴毛纺厂、面粉厂、电厂、卷烟厂、邮电局、铁路机务段、各中学，一个月的时间，归绥市街头就出现了十几个秧歌腰鼓队，活跃在各个地区，使得这个古老而陈旧的城市充满了生机。老乡们乐得喜笑颜开，议论说“归绥城头一回这么红火”。

### 三、春耕宣传

春节后，省领导高克林同志将刘启焕同志找去，分析绥远省的形势。绥远省虽是和平解放的，但问题较复杂。绥远省解放得晚，早解放地区内的地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有很多逃窜到这里“避难”。当地的土匪既熟悉地形，又有亲朋掩护，虽然人不多但危害大。尚未整编或正在整编的国民党起义军，他们内部有潜伏特务和反动分子，如鄂友三的土匪兵，白天穿解放军的制服，晚上当土匪抢老百姓，败坏了我军的名声。另外，各种反动会道门及地富分子，这些人趁我军刚刚进驻、老百姓对我党各项政策不了解的机会，大肆造谣、诽谤，说什么“共产党呆不长”、“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鼓动老乡不种粮食种大烟，说什么“共产党不让种大烟不要紧，国民党回来收大烟”。咱们农村工作组的同志还有被敌人杀害的。老乡们人心惶惶、不备耕。有的老乡把衣物收拾好准备“逃难”。为此，高克林指示，让我团下乡搞一次春耕宣传。一方面争取解放后的第一年能有个好收成支援前线，支援国家；另一方面，争取人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从而靠近共产党。这也是我们与敌人争夺阵地的一场较量。

刘启焕同志接到任务后，连夜制定方案，根据时间短、任务紧（农时不等人）的情况提出走马宣传即巡回宣传。具体办法是将200多人的大团化整为零，分成演出小分队，沿土地肥沃的产粮区大黑河流域一路行军一路宣传。白天行军时，小分队深入到各

个村子去宣传，晚间到指定的大村集合演大戏，并请来各村的老乡观看。这个方案很快被省里批准，并根据刘启焕同志的要求拨给了武器。全团投入了春耕宣传的准备工作：创作股编写歌词、小戏，音乐股配曲，演员股排练新节目，美术股赶绘宣传画，总务股将新编的材料刻印成春耕演唱材料。团部从各股抽调有战斗经验的男同志组成警卫排，他们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担负起全团的保卫工作。同志们发挥了连续作战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带的节目有《大家欢喜》、《夫妻识字》、《一站虚惊》、《兄妹开荒》及各种小演唱等。1950年2月，200多人的宣传大军，扛着三八枪、背着行李、排着整齐的队列，冒着刺骨寒风，在团长刘启焕的带领下踏上了险峻的征途。

从归绥出去朝东南走，第一个村子桃花坂。我们到村后，司务班早已将开水烧好等在村口。我们在老乡打谷场上用锣鼓声将老乡“请”出。扭着秧歌绕场一周，宣传演出开始。这时司务班又向下一站去烧开水。美术股则在全村刷写大标语。一个小时的节目演完后，演员休息。美术股向老乡展览春耕宣传画片。总务股将春耕宣传演唱材料发给老乡。团长则带领创作股人员召集村里的积极分子、军、烈属开会，征求意见，了解情况，创作股随时根据情况编写新节目。速度之快，今日难以想象。演员休息起来，就能拿到新编的节目，边行军边背词，到村里便要演出。因为是新区，老乡对八路军感到很新奇，再加上农闲时节，来看节目的人很多，有的人跟在我们后面走到下一站继续看演出。我们到了落脚的大村子去吃饭时，后面跟的人早已坐在“台”下等开戏了。我们每天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的演下去……

有一次，走到半路下起雪，赶到大村时天已黑下来。雪停了，又刮起大风，气温骤降。团长看这种天气怕老乡露天看戏会冻病，就决定不演了。我们刚睡下，团长就把我们叫起来化妆。原来老乡听说有戏看，竟冒着严寒等在村口戏台下，任凭团长再

三解释、劝说，就是不散。团长只得把大家从热被窝里喊出来演出。我们从台上看到老乡穿着皮袄挤在一起，一边跺着脚取暖，一边津津有味的看戏，深受感动。

有的村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老乡对我们很冷淡，有时司务长连房子也号不到，我们就只好冒着严寒在院子里休息。有一次，当我们正挤在一起取暖时，老乡的门终于打开了，女同志被让进屋，男同志也都安置在马棚里住。

因为经常分散宣传，迷路的事也是常有的。有个小分队宣传归来，走进一片冻了冰的沼泽地，杂草丛生，走着很费劲，又加迷了路，用自制地图查了半天也分不清方向。天渐渐黑下来，寒气逼人，在四无人烟的荒滩上，同志们奔跑得又冻又饿，疲惫不堪。正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刻，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有狗就意味着有村子，真是绝路逢生！大家欣喜若狂地跳了起来，朝着狗叫的方向奔去，这才找到一个小村子住下来。第二天经老乡指路才找到大队人马。

舞台工作队的同志是最辛苦的，每到一个大村，我们都去吃饭，他们饿着肚子去村口舞台上布置。他们要扫去长年积下的尘土，拴绳子、吊幕布。农村没电，他们用粗铁丝窝成圆圈，上面做一个钩挂在舞台两边的绳子上，然后用碗倒上麻油，用棉花搓成芯放在油中，再将碗放进圆圈里点燃，这是自制吊灯、演出时满台飞黑烟。我们化妆时，他们跑着去吃饭。有时怕误演出没吃饱就跑回来。如果碰到没有舞台的村子就得临时搭，再遇上刮风天更苦了。刚装上的幕布被风刮得在架子上乱飞，象受惊的野马，抓都抓不住，好不容易抓住了又压不住，无论是搬来大石头或大铁砣都无济于事。遇到这种情况，就由舞工队中体壮的男同志将幕布尾部（通常幕布拖地后还有一米多的富余）缠在身上，再头对脚的睡在舞台地上，只要不把他们刮跑，这个幕就算装好了。当三四个小时节目演完，从地上拉起这些同志时，他们都快

冰僵了。他们是用生命来保证演出啊！

舞工队还要负责道具、幕布等运输押车任务。宣传接近尾声时，大家很疲劳，走路都处于半睡眠状态。有一次，照例天不亮起床行军，轮到十五岁的小于押车，小于爬在车上睡着了，牛车走进水渠上的小桥时，牛低头喝水，车子失去了平衡小于被甩到水渠里。当车倌将车拉过桥时，小于才从水中爬到岸上，浑身都是水，被风一吹很快结了一层冰，象铠甲一样。他跟着车子跑，发出哗啦的响声。跑到老乡家，蹲在热炕头上，老乡帮他衣服烤干。幸亏棉衣很厚，只湿了外面一层，否则真要把他冻坏了。

春耕宣传正是刮风季节，每天刮得黄沙漫天眼睛睁不开。全团只有一副用布裕襟做成、眼罩上面镶两块圆玻璃片、罩两边各有一条带子可以结在脑后的土风镜。每到行军，警卫排的一位同志就戴上这风镜走在前面，其它人一个揪着一个，闭着眼睛往前走，到村里时才能睁得开眼，这时如果不是两个眼睛能转的话，一个个真象是用黄土做成的土人哩！鼻孔里都结成两个沙子块。警卫排不仅行军中走在前面，到了演出时还要巡逻，晚上还要户外放哨。他们除自身的行李以外，还要多背一支枪和子弹、手榴弹。有一次，行军途中突然迎面遇到鄂友三的骑兵，刘启焕很沉着，挥手令警卫排的同志上前，命其它同志隐蔽在土坡下、地垅里。警卫排的同志面无惧色，严阵以待。鄂友三的土匪兵在正气凛然的警卫排面前只打了个照面就掉转马头跑了。还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大村子的中途，司务班的同志从该村返回报告，说村里住着国民党军的营部，周围的自然村住满了国民党兵。团长想了想，决定天黑进村，专住在他们的营部驻扎地。（如果他们中有人胆敢放肆，就先控制他们的“官”）。当天夜里，警卫排的战士一夜没睡，巡逻站岗、放哨喊口令。大约因我们有二百多人，拿的乐器都用布套罩着，（老乡常误以为是缴获的美国最新武器），所以使国民党军官产生了误会，第二天清晨才发现这个营

的官兵跑得无影无踪。可以说：每到关键时刻，警卫排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我们这次宣传，沿途还受到解放军的大力协助和保护。常常在行军的路上，路一边是解放军，而另一边就是国民党军，我们就走在两军之间。在铁帽村演出时，土匪混在观众中间伺机闹事。解放军就派了战士在演出场地周围巡逻。在察素齐演出时，我军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因为当时有两股土匪逃到大青山，当地驻军为了保护我们顺利演出，还在台口及演出场地四周架设了机关枪，使我们的演出顺利进行了。可是在离察素齐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却受到土匪的袭击，土匪趁演出时抢劫了老乡，并把炕扫帚点燃烧老乡的肚皮，还抢了烟土等物。

有一次，演出后睡下不久，大约凌晨2点左右，团长的通讯员用暗号敲醒我们，用口令密集放哨的同志，传达了马上出发的命令。我们明白是有了异常情况，敏捷地打好背包，悄悄地撤到团部驻地。我们踏着夜色静静地走，尽量不使脚下发出声音。走出离村子很远，团长才轻声告诉大家：“咱们派到起义部队的政委那儿，来了人，向咱们传递消息，说有人很注意这支宣传队，到处打探咱们的情况，问有多少人，多少支枪，多少男的，多少女的？为了安全起见，他建议咱们赶快撤离这个村子。”团长接受了政委的忠告，神不知鬼不觉地带领大家转移了。

有时我们会被密集的枪声惊醒，心中明白，一定是解放军和土匪接了火。好几次土匪被追击得乱窜，从我们住的房上“咚咚”地跑过。开始，一些儿童队的小同志吓得“猫”在被窝里，后来司空见惯了，也就无所谓了。

这次春耕宣传演出是在政治环境非常险峻而生活环境又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演出经过归绥、和林格尔、托县、萨拉齐四个县。行程二千多里，历时两个月。宣传人次为三十多万。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建团初期这段历史是很珍贵的。一方面通过深入工厂农村大面积、大规模广泛地宣传演出，使工人农民了解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消除群众的疑虑，起到了巩固新生政权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文艺战士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提高了思想觉悟，增强了自身的劳动人民气质，为后来在舞台上创造工农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郑玢：内蒙古话剧团干部





# 昆都仑地区文化事业散忆

张 清

昆都仑区现在的城区建国初期是隶属于包头郊区的一片黄沙滚滚、蒿草遍野的荒原。1953年开始勘测兴建包钢，1955年大批建筑工人源源迁入，1956年8月设置行政区。

自古以来，一个地区的文化事业发达与否，直接反映着这个地区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的进程。建区初期，这里工人的居住条件和物质生活是艰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风沙多，歌声少，是这个时期南牌地的特点，唯独职工的文化夜校办得好。那时候来包建设的多数是老工人，有的家属还未搬来，他们文化程度低，识字少，所以学习起来很认真。我和杜春雯（现在包钢教育处工作）当时就分别兼任过鞍建公司职工夜校语文和数学教员，在刚建校的钢铁大街一小授课。

昆都仑地区文化组织、文化机构设施、专业艺术团体等文化事业的发展，是随着包钢建设的深入发展、职工人数的逐步增多，为适应广大职工对文化娱乐活动的迫切需求而逐步建立和发展的。

1956年昆都仑区居民总户数为7643户，总人口40464人。虽然大约只有现在人口的八分之一，但是在与日俱增，这就决定了建造文化设施，开展文化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56年下半年，市文化局电影放映队下放到各市区，昆都仑

区就有了电影放映队。放映人员带上机器深入到厂矿、工地露天放映。同年区文化馆建立后，便在文化馆院内露天放映。1958年又在南区建立了一个露天放映场地，看的人很多。六十年代初，还曾下乡为农牧民演出，很受欢迎。后来放映机增加到三台。当时的“小包钢”派入人员到放映队学习后也在青年路一小那宽阔的沙土校院露天为居民放映过。昆都仑区的电影队直到1964年又归回市电影放映队。建区初期，包钢厂矿企业于新春期间还组织过“秧歌舞”、“高跷”、东北“二人转”等民间文艺的街头演出。1956年末，包钢职工俱乐部（现二冶职工俱乐部）在钢铁大街30号街坊建成，解决了职工看电影难的问题。同年昆都仑区文化馆在白云鄂博路北段建成一座四合院式的馆舍，这是昆都仑区最早建立的一个群众文化设施。当年还没有正式书店，年初在“大红门”广场西北角的临时市场设立了一个帐篷售书点——南牌地门市部。书店人员除了在帐篷营业，还到包钢工地和周围农村流动摆摊售书。本年我在昆都仑区度过第一个春节，当时包钢职工俱乐部以东还是一片荒沙滩，只有稀疏的几处新建房屋。

进入1957年，昆都仑区的人口达到57 807人，包钢进入大规模建设高潮。本年夏季，在昆都仑区召庙举办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跳鬼”文艺庙会，吸引了成千上万职工去观看。同年，座落在少先路26号街坊的包钢职工第二俱乐部（即今包钢职工俱乐部）建成。夏季，市政第一座大型影剧院昆都仑恰特在青年路西段动工兴建。昆都仑区新华书店门市部也于本年11月在白云鄂博路北段钢铁大街31号街坊建成营业。昆都仑区第一个体育设施灯光球场亦在同年建成。10月22日，中共包头钢铁公司机关报《包钢报》创刊。至此，昆都仑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改善和丰富。1958年，昆都仑区的人口已上升到119700多，同年昆都仑恰特竣工，基本满足了群众观看影剧的迫切要求。在此期间，由于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出现的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1959年又搞了一场反右倾、拔“白旗，”人们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人人谨小慎微，事事斟酌，跟着潮流吹，说假话，唯恐被打成“老右”。所以人的情绪受到压抑，文化生活受到很大的局限。大跃进年头虽然掀起了群众性的民歌创作活动，但多为政治口号式的词句，无限制地夸张，脱离现实生活，艺术性差，没有生命力。1958年以后，昆都仑区设有两个曲艺馆，一个是在今包头百货大楼北鞍山道西侧的东风曲艺馆，一个为今五金商店大楼西端处的百花曲艺厅。主要以说书为主，演出山东快书、快板书、河南坠子、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天津时调等曲艺节目。东风曲艺馆1962年由市文化局下交昆都仑区文教局管理，1964年改为昆都仑区图书馆。这两个曲艺厅（馆）“文革”前都已停办。1958至1962年期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图书发行工作也受到一定的干扰。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3年以后又有了发展，当时提出面向包钢、服务基层的口号，深入厂矿流动售书，到1965年图书发行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

1959年9月26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投入生产。当年，昆都仑区人口猛增到201373人，几乎比1958年增加一倍，各行各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文学从来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如火如荼的包钢建设更需要通过文学的手段加以反映。

1961年上半年，昆都仑区成立了第一个文学组，吸收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以区文化馆为阵地，开展文学创作活动。同时创办了文学小报《昆河钢水》，为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后来不少迈入文坛的作家、编辑等文艺工作者曾经是昆都仑区文学组的组员。建区初期我在小学任教时的学生、现《民族团结》杂志社编辑、作家包家骏，十七岁上高中时就是这个文学组的积极参加者。昆都仑区文学组的组建和《昆河钢水》的创办，抗美援朝时

期的随军记者、现昆都仑区政协委员、离休干部杜守恒同志自始至终是一个热情的耕耘者与组织者。由于“左”的思潮的冲击，昆都仑区文学组连同其著作发表园地《昆河钢水》只活跃了三年时间就分别被迫解散和停刊了，然而它给许多文学爱好者留下的印象却是难以忘怀的。

1962年，昆都仑区文化馆建立了业余文工团，曾演出《千万不要忘记》、《祝你健康》等剧目。1963年解散后又组建了乌兰牧骑，曾深入到工矿、农村演出，受到工人和农牧民的欢迎。到1964年，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阶级斗争”越斗越深，文化活动便难以开展了。

从昆都仑区建区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十年中，除文化馆、曲艺馆三处文化活动场所外，建影剧院、俱乐部五处，加之驻区大厂矿建立了业余剧团（或文艺演出队），充分活跃了职工的文化生活。“文革”开始前后，二冶相继建造了二公司、四公司、机电公司、筑炉公司等俱乐部。其间，各影剧院除本地专业剧团演出外，还接待了不少外省市剧团的来包慰问演出，其中有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王玉山，著名京剧演员尚小云、荀慧生，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等。

“文化大革命”中，昆都仑区的文化事业同全国一样，遭到严重破坏。文化机构瘫痪，文化设施被抢占，文艺团体被解散。大多数戏剧、电影禁止演出和上映，文艺书刊大部分停止了印刷发行。书店摆的都是“语录”和“阶级斗争”的书籍、横竖幅的语录、诗词条幅等。舞台上，电影里，广播中每天翻来复去播放演出的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那八个“革命样板戏”和“语录歌”、“诗词歌”。当时的昆都仑区文化馆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以后的文化课也主要是学“语录”，唱“语录”歌。这十年，是“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生活的十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迎来了文艺的春天。翌年夏秋之交，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中央民族歌舞团赴自治区各地作了慰问演出。那时，我正在土右旗美岱召公社为下乡知识青年带队，在河子大队观赏了方明等著名演员的演唱。同时昆都仑区各族人民在包钢体育场欣赏了著名歌唱家蒋大为、郭兰英的演唱和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姜昆、等所作的精彩表演。

1976年10月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同其它各项事业一样，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文学艺术雨后春笋般地复兴起来；文化管理机构、文艺活动场所、文学艺术团体，一切都在相继恢复、重建、发展。1978年10月，建筑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的自治区最大的综合性书店包头市新华书店在昆都仑区钢铁大街建成，进一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各类图书的需求。文化活动设施也逐步增加。1978年，昆都仑区开设儿童影剧院。1981年<sup>1</sup>月，目前自治区最大的设有1,339个座位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包钢少年宫落成，规模宏伟，造型新颖，设施完善，配有立体电影设置。1985年，包头第一热电厂在钢铁大街西段路南建成一座俱乐部。截止1986年，昆都仑区连同“文化大革命”后建成的军分区礼堂(对外放映电影)、市一化工厂俱乐部等，有较大影剧院、俱乐部八处。

1981年昆都仑区成立文化科，并出版了文学报《朝花》。昆都仑区文化馆开展各项活动，图书馆开始对外借阅，并开辟了阅览室。全区科研、文化单位和大、中学校拥有图书馆(室)40多个。原文化馆馆舍于1986年拆除，1987年重建为包头市第一流的区级文化馆。与此同时，驻区厂矿普遍重视了职工的文化生活，纷纷设置文化娱乐场所。近年来，文化娱乐厅、舞厅相继开办，大大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区文化局每年都要组织大型文艺汇演，盛夏时节举办文化夜市，使钢城人民的文化生

活日趋丰富多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昆都仑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以包钢、二冶等大厂矿为主，组织高跷、秧歌舞等文艺队进行街头表演并举办元宵灯展和燃放焰火的喜庆活动，男女老幼倾城出动，塞满钢城，春意盎然，景象万千。在1986年庆祝昆都仑区建区三十周年和1987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区文化局会同厂矿文艺演出队举办了多场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活动，使全区各族人民沉浸在无比欢乐的幸福之中。1987年，女歌唱演员朱明英等来昆都仑区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各族各界的热烈欢迎。

1978年以来，昆都仑地区成立了摄影、美术、集邮、歌曲创作等小组，成立了业余文艺演出队和少年儿童合唱团4个。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讲座和各种展览，为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输送了人才。业余创作活动也空前活跃，创作了大量摄影、歌曲、书法、美术作品和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1986年1月、5月、7月，1988年7月分别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乌盟凉城县、巴盟乌拉特前旗和首都北京等地举办了昆都仑区青年画家温六恩个人画展。

1986年底，昆都仑区成立了文学、摄影、音乐舞蹈、书法美术四个协会。各协会积极开展活动，会员的文学、摄影、歌曲、美术作品大量涌现，不少作品发表在自治区内外的报纸、杂志上，其中50余幅摄影作品、40首歌曲以及10个舞蹈表演，分别获得全国、自治区和包头市的奖励。1985年3月28日，昆都仑区召开首届文代会，正式成立了昆都仑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会员达190余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内蒙古分会副主席、作家张长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分会副主席、诗人贾曼，内蒙古日报社科教文艺部主任李杰生以及包头市文联主席许淇等特地到会祝贺。昆都仑区文联的成立，标志着该地区的文学艺术在改革之年迈出了新步伐。区文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邀请

了作家、学者讲课，组织作者讨论作品，努力创作，向各级文艺报刊投稿，取得了可喜成绩。歌词作者张建中、诗作者蒙原等的作品均在全国奖赛中获奖，赵勇、潘新民的歌词和谱曲，巩丕铨的“新爬山调”，陈玉胜的硬笔书法以及苏玉忠、周占光的摄影作品分别在全国和省级报刊登载或影展中展出。在1986年庆祝昆都仑区建区三十周年和1987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昆都仑区出版了《鹿原》文学作品选集三本，达60万字，并从1986年起，创办了《鹿原》文学报，使昆都仑地区的文学创作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昆都仑区政协成立以来，注重征集文史资料，1985至1988年，编辑出版了《昆都仑文史》四辑，达60万字，反映了本地区古今文化遗迹。这些文史资料从各个方面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包钢建立前后昆都仑地区的历史、演变、建设和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引起了全国不少地区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昆都仑区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也在抓紧进行，现已编印出地方志史料选集五集。昆都仑区志的编纂，将为全区经济建设、科教文卫等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可作借鉴与制定长远战略规划的依据。

本文作者：张清现任昆都仑区志史办公室副主任、昆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 昆 都 仑 恰 特

小艾 金昌

为了适应包头工业建设的发展和戏剧事业的繁荣，包头市文化局投资四十七万元，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开始兴建富有蒙古族特色的昆都仑恰特。一九五八年元月建成并开幕营业。

恰特建筑总面积为二千八百六十一平方米，由包头市第三建筑公司设计和施工。监工人王之良。该建筑全部为钢筋水泥和砖木结构，池座安放一千二百六十六个观众坐的折叠椅，舞台宽敞，吊杆、灯光、丝绒帷幕、幕条、台毯齐全。东西两侧有宽敞的观众休息厅，后台有考究的演员化装室和演员休息室，贵宾休息室有考究的沙发和地毯，西侧休息厅设有小卖部。西院还有家属宿舍和演员宿舍。不论建筑规模或内部设施，在当时均是全市第一流的。该院由市文化局直接领导。一九七〇年到现在归包头市演出公司领导。

昆都仑恰特首任经理李国政（市文化局财务科长兼经理，现已病故），副经理王之良（已离休）。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八三年，即第一届到第七届的正副经理，都是任命的；从一九八四年中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决议》公布后，执行选聘制，由市演出公司选聘正、副经理。

一九五八年开幕时，首场演出的剧团是青岛市京剧团，主演是尚常春（武生）。这之后相继演出的有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个文艺团体，包括京剧、晋剧、豫剧、河北梆子、评



剧、秦腔、越剧、黔剧、昆剧、话剧、木偶戏、吉剧、曲艺、蒲剧、二人转以及曲艺、杂技、歌舞等。来包演出的有许多著名演员和表演艺术家。其中有京剧界的谭富英、张君秋、尚小云、荀慧生、裘盛戎、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姜铁麟、高盛麟、李世济、吴素秋、马连良、李鸣盛、李少春、李万春、李和曾、高玉倩、李小春等；评剧界的李忆兰、马泰、小白玉霜。昆曲界前辈俞振飞、言慧珠。豫剧界的常香玉、崔兰田、陈素珍、张宝英；晋剧界的牛桂英、郭凤英、田桂兰、王爱爱。北路梆子筱电灯。著名歌剧演员王玉珍。曲剧演员魏喜奎；河北梆子李桂云；著名相声演员杨振华；女歌唱家关牧村和男歌唱家关贵敏等。这些著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不仅满足来自全国各地的包钢建设者的不同籍贯、不同方言的不同要求，而且使包头各族各界人民欣赏各家专长，大饱眼福。

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周恩来总理、叶剑英、陈毅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剪彩的当天晚上，观看了包头文工团演出的精彩文艺节目。朱德元帅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来包头视察工作时也在此观看文艺节目。包头市党、政、军、群众团体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在这里举办过。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戏剧、电影营业相当繁荣。观众和剧团称为“观众之家”、“剧团之家”，多次受到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内蒙古电影公司和市电影公司的表彰与奖励。

正当昆都仑恰特繁荣向上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各种设施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解放了一大批戏剧、影片。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一年，戏剧、电影收入连续超额完成任务。为加强阵地宣传。在前门上边开辟了八米长、两米二高的戏剧、电影宣传栏；自筹资金，在东西两侧建起二座二十多米长的画廊，宣传戏剧、电影，图文并茂，绘声绘色；在西侧还建起了四

十平方米的售票厅。一九八〇年上级拨款，对该院主体进行了防震加固维修。一九八六年八月市演出公司选聘张泽声为经理，陈宝童、温玉莲（女）为副经理。他们自筹资金粉刷、修补、油漆了室内外围墙、门窗；安装了霓虹灯、广场高压纳灯；改建了立体画廊；配合公安部门门前实行三包。业务收入开始回升，提前一百一十五天完成了全年的戏剧、电影收入，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吉奈”竞赛中，荣获满分。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命名为“文明剧场”。



## 壮烈殉国的抗日挺进军刘桂五师长

高志昌

刘桂五，1902年出生于热河省（今辽宁省）朝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只上过三年小学。从1924年开始了戎马生涯，先后在宋哲元部、东北军郑泽生部的骑兵第五旅历任排长、连长、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失去驻地，撤至关内，分驻豫、鄂、皖边区。

1934年，刘桂五被选调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毕业后，刘桂五任白凤翔骑兵六师的上校团长，驻防在甘肃庆阳县。1935年，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至西北来打共产党。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东北军中广大下级军官和士兵，怀着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坚决要求抗日，不愿意打共产党。东北军中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以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组织了抗日学生队，刘桂五对这批学生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持同情态度。加之，刘桂五经常接触刘澜波、王再天等地下党员，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安内攘外”政策表示不满。他认为：“九·一八”日本鬼子侵占东北，身为守土有责的军人却不战而退，眼巴巴看着大好河山沦陷，广大同胞当亡国奴，这已经是中国军人的耻辱。今天，又要拿这些枪炮作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帮凶，网红军打仗，自相残杀，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高兴的，真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刘桂五的这种思想在东北军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当时，不仅下级军官和士兵有强

烈的抗日要求，就是身为“剿共副司令”的张学良也不愿意继续打内战了，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联系，意欲走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北军杨虎城在我党的影响下，实际上已与红军停战了。为了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张、杨在西安创办了有东北军和西北军连长以上团长以下的现任军官参加的“王曲军官训练团”。于此同时，张学良还在东北军中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刘桂五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和“抗日同志会”。

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刘桂五曾去见过张学良，张问他学习后有何体会，刘桂五说：“这次训练团办得好，比庐山军训团好。庐山军训团内容是宣传“安内攘外”。王曲军训团教育内容是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这次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官在一起学习，双方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有了共同语言了”。张学良听后很满意，加深了对刘桂五的信任。

1936年12月，蒋介石来西安召集最高级军事会议，强迫张、杨执行他的“剿匪”计划。张在多次“苦谏”、“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实行“兵谏”。刘桂五则是这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一员。

1936年12月8日，张学良把刘桂五从固原叫到西安，进行了密谈。张试探说：“我要派一个人去执行一项任务。我考虑了很久，认为派你去做最合适。但是这项工作有牺牲性命的危险，你要先考虑一下。”刘表示自己不怕牺牲。张问刘为什么那样勇敢不怕死，刘桂五回答：“我胆大枪法好，打枪不用瞄准。在黑夜里，只要敌人打枪一冒火亮，我就能对着火亮打去，把敌人打死。短兵相接打夜战，是我的拿手好戏。”张学良十分满意，决定把捉蒋任务交给他。于是，张以派刘桂五去热河打游击向蒋介石辞行为名，带刘桂五去华清池住所五间厅直接见蒋，意在察看地形。事后，刘桂五认为华清池有宪兵三团守卫、警戒森严，必须突然袭击，猛打猛冲，速战速决，才能冲进华清池把蒋介石捉

住。于是，他建议，让白凤翔师长、孙铭久营长和他组织成三人领导的捉蒋队伍。12月11日上午，张学良请刘桂五，白凤翔到金家巷张公馆共商兵谏大事，确定由白凤翔师长、刘桂五团长、孙铭久营长带领卫队营官兵和一部分侍卫副官去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当天午夜，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三人带领全副武装的卫队营直奔华清池。

在华清池门前，遇到蒋介石的警卫队猛烈抵抗。刘桂五、孙铭久身先士卒，带领卫队营官兵在枪林弹雨下，冲进了华清池。这时已是12日凌晨四时左右。当他们冲进五间房厅蒋介石的卧室时，但见室内空无一人，蒋的军服和军鞋都在，桌上杯中放着一副假牙，一摸被窝尚温暖，这说明蒋介石逃走不久。他们通过电话向张学良报告了情况，张学良判断蒋是躲起来了，命令严密封锁，仔细搜查。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久带领官兵以及其他人员在五间厅内外、骊山山上山下到处寻找。在搜山时，一个士兵发现了躲藏在石头洞里的蒋介石。白、刘、孙三人请蒋介石上汽车回西安，蒋站立不动，不肯走。当时天已亮了，大家看蒋仍不动，也不说话。刘桂五说：“趁着蒋委员长活着，咱们大伙把他抬到汽车上吧！”于是，大家抬着、抱着、推着才把蒋介石装进汽车里。白凤翔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给蒋披上。在回西安的路上，刘桂五和白凤翔坐在蒋的两侧，孙铭久坐在司机旁边。卫队营官兵、侍卫副官及其他捉蒋人员坐在军用大卡车上，直奔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胜利地完成了捉蒋任务。

刘桂五在临潼捉蒋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奖金三万元，并荣升为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西安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张、杨的共同努力，得以和平解决。但蒋介石被释放后即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东北军被调驻各地。刘桂五的骑兵第六师驻防蒲城，不久又调往渭南。

“七七事变”后，刘桂五参加了马占山的抗日挺进军，实现

了他多年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夙愿。他在给其兄桂中的信里说：

“弟此次出发抗日，不成功则成仁。成功则到老家相会，成仁则在九泉相见。望兄安心理家，勿以弟为念。”

1937年8月15日，刘率部自潼关渡河，在大同会见了马占山。9月，日寇沿平绥线进犯，马占山为保存实力，准备与守归绥之军协力抗战，不料抵绥时驻军已撤退，刘桂五仍自告奋勇率部在旗下营布防。10月2日与敌接火，刘桂五以一师之兵力，与三万多日军血战九昼夜，于11日夜间乘敌不备，分三路出发夜袭敌之阵地，敌仓皇逃窜，刘桂五率军直追至七十余里的卓资山车站。是役毙敌五百余名，缴获军用品无数。马占山为此犒赏刘部官兵六万元。退至卓资山之敌，见刘军兵少力单，假作正面反攻以牵制刘军，暗地派遣劲旅夺取绥南凉城，由凉城径取归绥。刘无法兼顾，13日归绥失陷，刘率部退至包头，又与敌激战三天。马占山为保存实力，率军转进五原。1938年2月，日军向准葛尔旗出兵，侵占该旗王府。马占山任命刘桂五为总指挥，率部及第二、第三旅于2月6日夜出发，8日拂晓围攻王府之敌，激战至暮，毙敌二百余名，敌溃逃。刘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自此，日本侵略军不敢再进犯伊克昭盟。

马占山留骑六师王副师长驻守伊盟，自己与刘桂五率精锐部队过黄河，伺机进攻归绥、包头之敌。1938年4月3日自喇嘛湾渡河，4日拂晓，刘部攻下托克托县城，6日扫灭萨拉齐守敌，直趋包头。敌早闻刘军锐不可当，集中兵力严守绥包。马、刘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冲过平绥路，径取百灵庙。敌知刘英勇善战，火速调集援军，各路堵截，并以铁甲车一万辆，飞机三队，骑兵两师团跟踪追击。21日夜，马、刘率部进至我市固阳县红油杆子村。

红油杆子村现属兴顺西乡管辖。那时，全村仅十二户人家，被军师部的官兵驻得满满荡荡的。军长马占山住在村西李万红村

民的深宅大院的正房里，师长刘桂五住在村东王天良的四合头院的正房中。距红油杆子村南仅一里的成五元坨村、东南四里的大毛忽洞村里也驻扎了马、刘的官兵。当马占山得知此村叫“红油杆子村”时，顿生疑心，对身旁的将士说：杆子，是拴马的桩子，我们不能久留，稍息后马上西进。怎耐部队连日行军作战，人困马乏，只能待翌日拂晓起程。

红油杆子村座落在东西走向的土凹里。村东是土凹的入口，称“东壕口”；村西是一片开阔的盐碱滩；村南的土山梁横亘于东西；村北的山梁向西北延伸。马、刘以其地形，进行了周密的布防：村东王天良大院东边的一排土窑和东壕口遥相对峙，刘桂五在这里设下了把守门户的伏兵。在村南、村北土山顶上的两座龙王庙内，亦伏有精兵守护高地。军、师部的大门口、房顶上设了固定岗，村前屋后的主要路口均设了流动哨。

4月22日晨，一架敌机突然出现在村子上空，盘旋侦察。当时，刘桂五师长正在军部（即村民李万红家）与马占山就炕对桌，议论军事，闻敌机骚扰，立即命令部队把战马拉入棚圈隐蔽，并作好战斗准备。须臾，日军三十多辆汽车满载官兵，托着炮车闯入东壕口。据守在土窑附近的刘部官兵及村南、村北两个龙王庙高地上的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向日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密结的三角火力网，封锁住了村东壕口。敌无法进村，不得不后退一里许，纷然下车，沿南、北土梁包抄反扑。子弹穿梭、炮弹飞炸，烟雾尘土翻卷，象巨大的旋风撼动袭击着整个山村，一场鏖战开始了。

刘桂五以五间土窑为屏障，集结兵力奋勇阻击日本侵略军，敌死伤惨重。激战中，马占山冲出李万红后院的小门，在北龙王庙火力的掩护下，跨马沿北坡向阳湾村方向突围了。激战至22日午，击毁敌铁甲车三辆，汽车四辆，毙敌联队长龙野及部下百余名。正在喋血战斗中，刘桂五的腿部被炮弹炸伤，包扎后仍指挥

以安军心。全体官兵，英勇血战。特务营营长张喜春带领部队冲入敌群，与敌展开了白刃战，张营长英勇阵亡。这时，刘桂五已率领大队人马向村西南五分子村方向杀出重围。然而，刘桂五师长为解“土窑之围”（一说返村找马占山军长），又指挥部队冲杀到红油杆子村西，不幸炮弹又炸穿刘的腹部，刘桂五师长英勇阵亡于张根成大门外的卧羊盘上。年仅36岁。这时已是过午时分，挺进军大部人马突出包围，敌主力尾随追击。

此时，村南梁上的成五元壕龙王庙里，仍有一挺机枪喷射着子弹，一个个敌人倒下了，一辆汽车和一门山炮也瘫在坡上，坚守在这里上的仅剩这名连长了。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连长，为了让大部队突围，与敌喋血苦战，终因弹尽无援，以身殉国了。

坚守在王天良大院土窑里打阻击的十八名官兵，没有来得及撤出战斗，被留守的日军围困了。将士们巧妙地利用土窑墙上拴牲口的小孔，固守阵地。至晚四时，窑中的十六名官兵突然破门而出，翻越院后短墙，趁黑冲出重围。剩下的两名士兵（其中一人负伤）无声无息地隐蔽于窑中。敌见无动静，以为都已逃走，未进窑察看。日军走后，这两名士兵在村民的支助下，改换了服装向西找部队去了。

23日拂晓，留守的日军亦开跋了。村民们含泪把刘桂五师长安葬于村西滩。在刘师长的坟头旁又挖了个大坑掩埋了为抗击日寇而牺牲的32名将士的遗体。

24日晨，日军窜回红油杆子村，强令村民掘开掩埋尸体的土坑，用水洗去每个死难者脸上的血迹泥痕，敌认出刘桂五后，竟用铡草刀铡下刘师长的首级，用麻袋裹上带走了。

又过了几天，马占山派便衣队，把刘桂五的躯体运往五原。

全军闻刘桂五光荣殉职，无不痛心挥泪。同年5月25日，灵柩由五原运抵西安。各界人士千余至西郊迎殡。1962年秋，陕西省政府追认刘桂五为抗日烈士。



## 吉鸿昌将军二三事

郭体绪

提起吉鸿昌将军来多数人知道；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他是西北军冯玉祥总司令部下的十九师师长。自出潼关一直打前锋，一路打硬仗战顽敌，势如破竹。十九师的“铁军”称号，据说是在河南省诸战役中被授予的。当友邻部队遇到顽敌屡攻不克时（如兰封县城等地），上级即调吉将军所部攻打，在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吉将军指挥下，每战必胜，无坚不摧；所以始终是北伐战争中西北军的先头部队。

1928年春，十九师回师冀中献县（笔者的故乡）休息整顿。当时师部驻在县城文庙内，所属部队亦皆驻城关内外庙宇、祠堂……等公房里。师辖两个旅、旅下两个团、团下三个营、营下四个连；另外，师有直属团两个，旅有直属队两个，团有直属连两个，还有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法、军医等附属机构，共计万余人。

吉鸿昌领导的部队能有“铁军”称号，是因他治军有方，他经常教育官兵道：“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部队每天早起晨会集体必唱：“打倒列强、除军阀……”这首歌。休整期间训练和学习抓得很紧，操场上军事技术训练同课堂上革命理论教育相结合，官兵的思想觉悟和作战技术都有显著的提高；革命军人必读的小册子人手一份，当官的能熟读，并能给士兵讲解。操上训练的劈刀、刺枪、打拳，军官都能单人熟练操作，士兵们则都能集体操作，动作整齐、协调，老百姓称赞说：“他们象武术队的一样”，这支部队就是在长城抗日、收复多伦等战役中使日寇胆战心惊的“大刀队”。

在故乡流传着几件吉将军感人的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吉鸿昌爱部下如子弟，关怀备至。在休整期间他经常抽空到医院慰问伤病号；发现有头发过长的，立即叫医护人员拿脸盆端热水，亲自给剃头，有时一连剃3、5个（当时西北军官兵一律剃光头，不准蓄长发）。遇到医院开饭时，吉将军和住院伤病号共同进餐，边吃边谈，了解伙食供应质量，增进官兵感情。伤病号对师长如同父兄般的关怀，无不深受感动。

二、纪律严明，执法如山。当时该部队规定：官兵一律严禁吸烟、喝酒；部队训练队列行进时以“烟、酒必戒，嫖、赌必戒”来代替一、二、三、四的口号。在一次点名敬礼中吉将军发现一校级军需官手指发黄，检查衣服袋内有烟丝、烟味；当即把该军需官撤职并开除军籍。这个军需官虽然军龄长，工作表现好，但违犯纪律，照样受到军法处分。官兵们因素知吉将军铁面无私，故无人敢为军需官求情。

三、吉将军是爱民的模范，公买公卖，秋毫无犯。1928年夏天，正值农田庄稼生长旺季，十九师奉命由河北省向山东省开跋。部队出发前，吉将军曾召集全师官兵训话，宣布：“任何人都不许践踏田禾……违令者杀”。在部队行进中，由传令兵牵着的吉将军的坐骑被田野中突然飞起的鸟惊跑，传令兵虽然竭力牵拉，终因体力不支，造成惊马跑进农田践踏了一部分庄稼。吉将军当时火冒三丈，拔出腰带手枪要枪毙传令兵；幸被身旁的参谋长劝阻，且以不是传令兵不守纪律，是他力不从心，未能控制惊马为由，说服了吉将军。但看到农民庄稼遭殃，胜怒未消的吉将军就掉转枪口把心爱的马毙了（据说此马是五百银元买的）。参谋长把此事书面传达晓谕了行进中的全师官兵周知。故从河北到山东万余人的二路纵队，秩序井然，沿途冀鲁百姓同声歌颂：“铁军”真有铁的纪律。

本文作者郭体绪，昆区历届政协委员，副主任医师、著名眼科专家。

## 云世英回忆蒙哥马利元帅的包头之行

孙 明 远

曾在包头工作过多年的云世英副市长说：“我整个中年时期的光阴都洒在包头了，回首往事深感留念，常常以梦中显现”。

一九六〇年秋，接到中央指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英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应毛主席邀请来我国访问，决定前去访包，请你们做好接待。”

当时，我负责接待工作、作了精心安排，亲自考虑保卫、吃住，行线。可没想到蒙哥马利路径一官时提出：“市长先生，停车、我就在此观光”。作为公安人员最忌讳中途停车。给我来个措手不及，我一闪念当机立断，招呼司机立即停车，打开车门，我们陪同蒙哥马利向菜田里走去，菜田里有几位农民正在田间操作，个个晒得油黑发亮，显得十分健康。蒙哥马利伸出手摸摸他们的肩膀，握住他们带茧的大手说：“很好！很好！”临上车走时他面对绿油油的庄稼，伸出大拇指说：“中国没有饥饿，中国没有饥饿”。

谁知那年头粮食供应站没有粮食了，曾挂出牌子“整修内部”。我这个市长成了购粮员，东奔西跑，废寝忘食地到处求援，保证了每个市民每天半斤粮食，帮助人民度灾荒。

接着他提出要参观一所民族小学，我们满足他的要求，驱车来到昆区蒙民小学，蒙哥马利进入小学，自由参观，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高呼着：“欢迎反法西斯战场英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无限荣幸地说：“中国儿童很好！”并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当蒙哥马利离别时，他要两顶蒙古族帽子，他们带上照了像，留下难忘的友谊，让我们两国人民的心永远在一起。

客人住在青山小宾馆，部署的一级保卫，蒙哥马利住的房间，铺的什么床单、吃的食物都得检查化验，整整七天，他走后，我的两眼熬得通红。

蒙哥马利来之前认为包头是大漠黄沙，不料一所幽雅的绿荫红楼出现在

眼前，他停步观望激动的说：“噢，包头这么好，不请西方人。”陪同的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姚光同志微微地笑了。

28年过去了，变化不可想象的草原钢城，就是住在包头的人民也感到陌生了。大片的楼房把相距十五里的青昆两区连在一块儿，街心公园、住宅区古亭、垂柳、长廊、小丽花（市花）云杉（市树）出现在马路两旁，象花溪、象绿伞日夜伴着行人，包头人说：“我很爱这个城。”

云市长回忆说：“我还没有完成这里的建设，心里好象给包头人民欠下了点什么！小宾馆楼与楼之间的长廊，5号楼人工湖，大门口的白玉桥都没建成。还有包钢工人，他们很辛苦。原打算发动义务劳动在水库建设别墅为他们安度晚年也没有建成”。听说沙尔沁山坡上的召庙文化大革命全毁了。那些大松柏呢？也都砍了。云市长脸色阴郁，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把它建成旅游胜地，如今一切都没了，可惜，可惜啊！”



蒙哥马利（右二）与云世英等合影。

## 在贺龙司令员身边

邢铁锁

芦沟桥事变后不久，由贺龙司令员率领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东渡黄河来到我们晋西北地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当时，我是一个放牛娃，年仅十六岁，便积极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参军后，我被分到警备连当战士，负责司令部的外围警戒。刚开始，最怕晚上站岗，首长们有时外出回来，也常吓唬我们。有一天晚上，我小心地守在哨位上，忽然，一阵沙沙的脚步声钻入我的耳里，仔细看时，有两个黑影正朝我这里移动，我不由地握紧枪，喊道：“谁，口令？”那两个黑影不说话，只顾往前走。我故意把枪栓一拉，有一个黑影赶紧说话了，原来是贺龙司令员。他走到我的身边，查看了 my 的枪，问我多大年龄，怕不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司令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好好干吧！”看着司令员的身影，我的心热乎乎的。司令员久经沙场，威震敌胆，却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亲切关怀着每一名普通的小战士，能和这样的首长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豪。

一九三八年，我当上了司令员的贴身警卫。十二月的一天早晨，司令员早早就起来了，他点起了麻油灯，在一张吱吱作响的八仙桌上摊开了地图，聚精会神地勾画着。太阳刚出山，突然响起了防空袭警报，司令员拿起电话询问情况并作了安排，又继续看着地图。时间不长，一架敌机就低空飞来，绕着司令部的上空盘旋。我感到情况不妙，催司令员赶快转移，他却若无其事地

说：“小鬼，不要怕嘛！”话音刚落，警报又响了，窑顶上侦察的同志喊到：“又有四架敌机飞来，快转移。当时，我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一步窜到司令员的身边，拉着他就往外跑，刚出了大院，敌机的炸弹就落到了窑顶上，轰隆几声，窑洞房变成了一片废墟。经查点，这次敌机袭击，部队伤亡了十余人。我因保护司令员脱险而第一次立了功，受了奖，并经谭震林、罗会元两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二月，司令员率领着部队来到了河北省高阳县，改编了高事义的新八旅。针对当地百姓对八路军还不够了解的情况，配合地方部队，我们在高阳县、蠡县、平乡县等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当时，日军活动很猖獗，每隔十天半个月便出来扫荡。司令员决定打打日军的威风。五月，我们准备在大王庄同日伪军进行到河北后的第一次战斗。当时，有情报说，日伪军二百余人明天要来大王庄一带扫荡，司令员很快作了部署。把老八旅、骑兵营这两个硬队先埋伏于庄外，村民们都进了地道，其他部队全部转移，给敌人造成撤退的错觉。第二天一早，日伪军进了村子，自卫队首先和敌人交了火，接着，老八旅把敌人全部包围起来，骑兵营及其他部队在外围打劫，以防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中午时，终于全歼了这股敌人。这次战斗，大大震惊了日军，他们更加残酷地进行扫荡，我们的处境也就更加困难了。有一天夜里，战士们刚入睡，部队突然紧急集合，由高士弟参谋长带领着一直向北急行军。走到天快亮的时候，司令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叫来高士弟察看地图，这才发觉一晚上只是绕着出发地转圈子，还没走出20多里。司令员当时就火了，把参谋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确实，在日寇经常出没的地方，稍有不慎，便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过后，司令员对自己当时态度的粗暴感到很内疚，主动找高士弟参谋长承认不够冷静，作了解释。

在河北，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那次战斗，当时，贺龙司令员率领着一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还有地方部队一千余人正在山里集训。侦察员回来报告，日军大约一个团的兵力第二天要上山清剿。司令员马上召集关向应政委、萧克副司令员、周士第参谋长研究敌情，决定在半山坡上的旗会村围歼敌人，贺龙司令员亲自指挥战斗。命令下达后，部队按计划行动，旗会村的百姓也全部疏散了。第二天上午，日军四百多人进了旗会村驻扎下来。到了晚上，我军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村子并和日伪军交了火，打到天快亮的时候，我军换上去一个团的兵力，敌人也慌忙从县城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妄图里应外合夹击我军。司令员又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日伪军。到最后，形成了敌三层我三层层层包围的局面。日军看到情况不利，竟惨无人道地施放了瓦斯，我军将士被激怒了，战斗更加激烈。经过三天三夜地激战，终于在下午结束了。村里村外，到处是日伪军尸体，部队迅即清理了战场，带不走的枪支大炮就地掩埋，立即转移了。经过这次战斗，群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起来，地方部队也得到了锻炼。

一九四〇年，我们又回到山西，解放了林县、新县等地。一九四一年，贺龙司令员组织了一只三十人的手枪队，派我担任党支部书记，朱少田任队长，我们换上便衣，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探听敌情、采购部队急需物资等活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以后，我被选送到抗大学习，从此，就离开了贺龙司令员。

（广玉整理）

邢铁锁：前昆区人大常委会驻会委员，县级待遇离休干部。

## 大青山抗日斗争生活片断

王达仁

1938年8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山西成成中学的师生，纷纷投笔从戎，跟随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同志率领的一部抗战精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离开晋西北，千里挺进到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我这个学生出身的热血青年，便在1939年2月的一天，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根据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分配我以“货郎”的身份作掩护，深入到归凉、卓资县一带的山区乡村，开展地下抗日活动。现在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1939年夏，党中央派白如冰同志来大青山工作，大青山组建了绥远区党委，白如冰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与李支队遵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四支队现有骨干力量青年学生的培养使用作了适当调整，以利于这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能够在各条战线充分发挥作用。当时，根据党的工作需要，特委书记白成铭同志奉上级党组织的命令派我去作党的地下工作。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人。他让我隐蔽下来，秘密进行地下党的工作，活动的地点在归凉五区境，即现在卓资县大榆沟乡的大南沟一带村庄。活动方法是扮作一个山西来的挑货郎担的商人，经常在这一带山村卖货。我在阳武沟村安家落户，先立住脚跟，取得群众信任，然后在大



南沟、纳树营子、明星沟、东水泉沟、油鲁沟等地开辟工作，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由于这一带离敌据点大榆树村很近，敌人经常出来要粮草，要大烟土，派税款，所以党的活动极其秘密，不准与我军公开身份的人接触，只能同直接领导人单线联系。这是党的纪律，必须自觉遵守。

我怀着迎接新任务的迫切心情，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39年5月，我从大青山出发，骑马来到绥南蛮汗山地区归凉县四区，迅速赶到接头地点小巴安兔沟胡拴家中，白成铭书记已在那里等我。我脱下军装换上商人服装，把小货郎摇拨浪鼓的把戏向他表演了一番。“卜郎——卜郎——卜郎”。小拨浪鼓声音清脆，富有节奏感，白书记很高兴地说：“你拨郎鼓摇得不错，象个买卖人。现在我命你到阳武沟村去找个人，他叫王升贵，是个小学教师，是个有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仇恨日寇、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塞外开展游击战争，他忠实地为我军办事，老实可靠，广大群众很拥护他。你住他家，靠他掩护你开展工作。”

我们俩人到王升贵家后，白成铭同志向他介绍说：“王老师，这是王恒同志，他是山西崞县人，在卓资山、旗下营一带，有很多老乡，打算做点小买卖，本钱不大，望你多多照顾。”王升贵很热情地把我安排在他家里住。之后，我就常住他家里，单住一间房子，以此为立足之地。我每天游街串巷，从卓资山、旗下营贩货回来，到乡村去卖。货物有白、蓝、黑色粗布，烟、茶、糖果、毛巾、袜子、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每到一村，拨郎鼓一响，山村里大人小孩都嚷着“小货郎来了！”一边喊着一边把我围起来，挑选心爱的物品购买。有钱给现钱，无现钱记账，以后归还。几个月之后，我就和这一带群众打成一片了。

时机成熟，我首先以阳武沟、纳树营子村为地下工作基地，逐步向周围村庄开展工作。这一带村庄，党的工作基础很差，地

下党员一个也没有。但是群众对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并不陌生，都知道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骂老百姓，专打日本鬼子。我白天串户，听听群众对我党、我军的反映和对抗战的呼声。针对群众思想和要求，我积极宣传抗日形势，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和抗战决心。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性质和任务。向他们讲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向他们讲共产党如何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等，群众听得津津有味。通过日常广泛接触和交谈，群众逐渐增长起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对我也逐渐有了好感，愿意与我交朋友，结拜兄弟。就这样，我在每个村庄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晚上，我重点深入一些基本群众家中，扎根串连，交友谈心，培养发展党员对象，使他们深刻认识党的方针、政策，承认党章党纲，认识党员的权利、义务，使他们树立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勇气和决心。同时，按照他们觉悟程度，给他们布置一些独立宣传，支援抗战，了解敌情，向我军送情报等任务。

经过耐心细致的培养教育工作和实际考察以后，我发现一些比较可靠的对象，便重点发展其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0年春天，已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其中有工人，有农民，也有革命知识分子，并建立了归凉五区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其它地区也不断建立起党的组织。

条件已经成熟，中共归凉县委和中共五区区委便相继建立起来。当时，党组织任命我为五区区委书记，统一领导五区党政群工作，我通过新党员，要求每人团结一批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又每人团结一批群众。这样使归凉五区的抗日群众工作，搞得比较活跃。工作有了一定基础，接着又在各乡、各村建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在区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同时组建了归凉五区抗日游击队，游击队下设三个班，有队长、指导员指挥活动，在五区境内开展游击战。平时，游击队就

捉汉奸、除恶霸、摸敌情、送情报，征收公粮、军草、军鞋，收缴烟苗罚款（敌人称为烟税），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县委、区委领导下，我们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上半年，在归凉县人民政府建立之后，相继建立了归凉五区人民政府，区长高琳甫，副区长郝瑞林。区政府建立之后，直接领导各乡工作，公开领导群众抗日斗争。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新局面。

1941年后半年，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党组织决定将我调到绥南地委机关工作。在我离开工作岗位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和我共同开辟归凉五区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

至今，这一带的老乡，还记得我这个“王货郎”的名字。

（王新洲 协助整理）

王达仁：前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已离休。

## 为老干部游艺活动致意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九日）

李 士 昌

辞兔迎龙喜逢春，  
龙腾虎跃大地气象新。  
指路明灯“十三大”，  
改革开放百业欣。

离休干部老有乐，  
游艺比赛助兴健身心。  
尽情狂欢量力行，  
任选项目争冠军。

## 回忆我的父亲刘天宝

刘发林

“爸爸，爸爸……”

我声声呼唤，他没有答应，爸爸永远地长眠了！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晨，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就在我的住处西正房里，伫立在老人身旁，目送他安祥地离开人间。人的生命之灯不可能长明，总会有这一天。可是此时此刻我还是泪如雨下，思绪万千。

父亲早年从山西河津老家出来之后，便在傅作义先生天津办的军校学习。以后又跟随傅先生和董其武将军来到绥远后套一带，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是抗战第二年出生在临河县城内的。我记得，当时临河只有一条街面，几千人的小城镇。但是出城瞭望，大片大片的麦地，散发出特有的清香，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渠，把小县城的四周农村点缀得更加美丽。现在回忆起仍很有趣，至今我还常常怀念故乡那个小城和河边的乡亲们。虽然这几年我也写一些都市生活的短篇小说，写城市各阶层的人，但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河套人民喜怒哀乐的故事。因此我还是愿当“乡土作家”。这是一段闲话。

一九四八年我随家来到包头，父亲在固阳县当县长。我便在牛桥街小学读书，那时我已经懂事了，常听父亲给我讲后山一带老百姓被土匪刁抢的苦难生活以及一九四九年绥远省和平解放前夕，董其武主席来包之后，让秘书打了长途电话，要他立即回包头面谈情况。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父亲接到电话后，当即乘坐去包头拉粮的大卡车出发。天近傍晚，来到了董其武主席在包常住的西前街银行大院。父亲和董主席的王副官都是山西晋南老乡，又熟。一起用过饭后，便想去看看久别的家人。几个月来，因后山一带被鄂友三折腾得不成样子，不是催粮，就是拉草，闹得父亲一直没有顾上回家。当时我们家就在西门里，虽然离此地不远，但父亲公务在身，只好又和王副官一边闲聊一边坐着等候董主席的到来。

晚十时许，父亲听见门前汽车响动，继之，车子即开进院里，车门刚刚开启，父亲就听到董主席向院中的王副官问道：“子华来了没有？”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父亲姓刘名天宝，字子华。王副官忙上前报告说：“子华等了好一阵了。”

话刚说完，董主席推开会客室的门，一只脚踏着门槛，侧着身子对我父亲说：“嗯，咱们今天好好谈谈。”

我父亲起立向董主席问好之后，便说了接到电话后正好碰上个顺车，过大坝时汽车出了点毛病，司机修了好一阵，耽误得快到天黑才进了城等话。

董主席听了后即说：“好，那你坐下说吧！”

我父亲忙说，董主席叫我来有什么事吗？固阳一带，这些天让土匪糟踏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董主席接着说，让我先问你几句话。你说说傅先生的长城抗战为了什么？以后五原大捷又是为了什么？

当时说这两句话时，我父亲清楚地看到董主席的眼帘已饱含着泪水，只是没有流出来罢了。我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主席，你怎么问起这些？咱们绥远老百姓都知道，傅先生还不是为了抗击日本鬼子，拯救千百万绥远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

“现在老百姓不是在受苦受难吗？”

“噢……他们时时都在盼望着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董主席说道：“所以，我看透了蒋介石这个卖国贼。跟着傅作义先生走人民的道路，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听了董主席这番话后，我父亲接着又向董主席汇报了一些情况：“前几天，鄂友三突然来找我，让我给他准备好粮食，说什么时候等徐永昌一到，队伍就要西撤宁夏。”

董主席立即打断我父亲的话道：“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密谋好了，对绥远的和平解放要极尽破坏之能事！”

我父亲又把当时县里人员的思想状况作了报告：现在人员思想上都逐步认清了，只有走起义的道路，才是唯一生路。不然的话，继续跟着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这些活过了半辈子的人，总还应该为后辈儿孙想想吧！接着又把当时后山一些情况向董主席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在固阳当县长，我知道大后山一带老百姓，他们时时都象苦旱的庄稼人求雨一样，日日想、夜夜盼，绥远什么时候才能和平解放呢？老乡们真是泣血盼义旗啊！你知道他们那些在后山活受罪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每逢有个从省府来的人，都要问他们：董主席也不到咱后山来看看，就让鄂毛驴这伙土匪，把老百姓往死折腾啊！董主席你知道，只要你说一声绥远马上和平起义，我看底下的人和老百姓没有不赞成的！

董主席听完这些话后，认为很有道理，深深地点着头，又叹道：这些话，他们从各旗县回来的人，都对我说过。可我的想法是，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起义，势必造成部队分裂，违背毛泽东主席全面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和傅作义先生爱护部下举行完整起义的愿望，难免不使绥远人民再遭受损失啊！

董主席不待我父亲答复，又继续说下去：这样一来，你想想，那样就会使绥远情况更加复杂，使起义更难于实现。接着，董主席显得有些沉痛地说：大家都知道我董其武出身贫寒人家，何尝不知道人民所受的苦难呀！可我没有给人民办事，而是替蒋

介石卖命，这些年来还在这里使绥远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你说我不该受天下人的辱骂……说到这时，董主席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的眼泪已从他那由红润变为苍白的两颊淌下来。

我父亲听后，也有同感，不由得也痛楚地陪着他伤心流泪……

父亲常给我回忆那时的关键时刻，一次短促的会面，使他思想上豁然开朗，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就在眼前脚下，所以他毅然跟随傅作义和董其武主席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固阳县参加了绥远省和平起义。

绥远和平解放之后，父亲仍然在固阳县担任了半年人民政府的县长。后到绥远省新干校学习。学习完毕分配到萨县专员公署任建设科长。以后萨县专员公署与平地泉行政区合并为乌兰察布盟公署任水利处副处长。在乌盟公署将近二十多年的工作中，父亲的足迹遍布了乌盟各旗县的水库、河流、机井、农田。他每年都是好几个月在乡下，和社员同志们一起打井抗旱，浇灌农田，防洪防汛……在他去世之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

“你父亲那个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和我们在水库劳动中都是一身泥，一身水，有时别的同志休息了，他还一个人在干活儿，所以，民工们都叫他老刘头儿，是最亲切的语言了。”

那段时间里，我们家在包头，我母亲又常闹病，父亲每年回不了几次家，就是过春节有时水利局里工作忙，他也不回来过年。为此，逢年过节我有时想念父亲还哭过鼻子。在那个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当中，父亲也最早被戴上了好几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单位挨批斗，包头家里被抄家，母亲无辜受株连也被街道轮番批斗，我当时也被剧团的所谓造反派按阶级复仇分子关进了牛棚好几个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上给父亲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他含着热泪对我们全家人说：“‘四人帮’把我们国家折腾苦了，我们全家人的不幸与党和人民受的损失相比，那是九

牛一毛：不要过多地给组织上找麻烦，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全家的照顾。”

所以，他从粉碎“四人帮”之后，调到包头市政协任驻会委员，每天坚持到统一学习的办公室去认真学习文件、报纸，记心得笔记，遇到开会发言，事前一两天，他都要认真找资料写发言稿。父亲在这段时间常常茶余饭后，心情激动地对我说：“党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照顾得无微不至，自己真是太感动了！想到自己老了，没有精力再为人民做工作时真是有点过意不去呀！”，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学好业务知识，努力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后来父亲被选为驻会政协常委，在他去北京治病前后，市政协领导在百忙工作中，多次来家探望，十分关心病情，使父亲深受感动。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追悼会上，市政协领导在悼词中，对父亲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为人民工作几十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充分说明他参加绥远和平起义，走上了光明大道是越走越亮堂啊！

是的，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历史长河呼啸奔腾而去。绥远和平起义的时代距今已经快四十年了，无疑这些光辉的历史是需要珍惜的。

我在长篇历史小说《绥远演义》的尾声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也是父亲生前经常对我的教导：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富裕生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

是的，在这里我仿佛看见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现在的人民已过上了精神和物质都比较丰富的生活。

久别绥远故土的赤子，归来吧，看看这当年争战之地，远不是留在你们记忆中的残垣废墟了，旧日的绥远——今天的内蒙古



自治区，沐浴着社会主义温暖的阳光，千里草原欣欣向荣；幸福地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同胞兄弟姐妹正翘首以待，盼望着一批又一批亲人归来探亲。

父亲一生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是炽热的爱国主义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的爱。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看到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民族兴旺发达，感到由衷的高兴。父亲生平无憾事，只盼祖国早日统一。这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经过努力，定能实现。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作者刘发林，现任包头市文联组联部副主任，昆区历届政协委员兼文史委员，第七届市政协委员。民革包头市委员会副主委。

## 鸕 鵒 天

### 再游昆都仑水库感赋

李士昌

(一)

再入阴山游水库，  
大坝巍巍坚如故，  
风光秀美添异彩，  
喜见曲径铺新路。  
小游园，  
广植树，  
微风稍爽避炎暑。  
忽见山峡风雨急，  
游毕大坝乐归途。

(二)

领导亲赴同歌舞，  
寒暄问候心畅舒，  
席地野餐有趣乐，  
老友欢聚热闹殊。  
小船翻，  
出事故，  
游人无恙皆欢喜。  
天旱稀雨湖水浅，  
风平浪静可见底。

作者李士昌，前昆区卫生局长，县级待遇离休老干部。

## 我父亲田中广德的坎坷一生

〔高山族〕 田中伯玉

我的父亲田中广德先生，是一位善良而慈祥的老人。他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维护祖国统一。在他青年时期，正当抗日烽火烈燃，他找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和道路，在组织的安排下，长期在绥西做党的地下工作，革命生涯漫长而丰富。他经常向我和我的兄弟们讲述其艰苦历程，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共和国来之不易”，教诲我们要珍惜、爱护，为国效劳。现追思如下，永不忘怀。

### 我的家世

我家世居台湾省台中地区之田中（系高山族）。我祖父出生之前曾祖父时常来大陆各地经商。我祖父青年时，曾赴日本山口市高等院校留学，毕业后，回故乡台湾省。后来在北京、青岛等大学任教，在大陆任教时与我祖母结婚，不久携眷仍回原籍台湾。我的父亲于1917年在台湾田中地区出生。后来因我祖母的亲属在内蒙古凉城县，所以祖父母带着我父亲来到大陆，又曾在北京、河南、山西等大学任教。在山西任教时病逝。我的父亲当时年仅十一、二岁。我祖母体弱多病，所以他们母子留在大陆寄居在外祖家中（内蒙凉城县）。我祖母在凉城学校中当教师并抚育孤子成长。解放前夕她去世。

### 我父亲的革命生涯

父亲幼年受母督教，1929年8月考入山西省大同市中等师范

学校，1933年毕业。同年9月考入山西大学农化系学习植物生物化学专业，1937年7月毕业。1938年参加晋冀察边区应县地区敌后工作，并与察哈尔游击军五纵队一道投入抗日救亡战争中。

1939年春，由察哈尔游击军五纵队刘仲仪，孙果全二司令员的推荐去延安抗大学习，参加民运工作组9组8班学习。在学习中，同班次中有刘映员、程昆山、威明伦、张九龄等人。

1939年秋冬之季，参加支前工作来到绥远陕坝前线，派往第八战区傅作义部的抗日民运工作组（国共合作之时），随同来的20多人，有威明伦、程昆山等人。在绥西地区五原、安北等县作民运抗日动员工作。

1940年春在五原县，由谷维义、郭北宸（郭俊卿）的介绍我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原、安北等县做党的地下工作，开展秘密活动。

1941年春，（正月十三日深夜）在五原县中兴乡高卜地村（现在乌拉特前旗公社高卜地村）被特务阴燕英告秘被逮捕。押送到陕坝西郊刘奇柜，马柜的集中营中。同时被捕的还有：王国华、周鸣、刘进仁、谷维义、李朝禄、贾润芝、李希成、马映光、李有关、李有才、吕耀、董有、董世杰、马明、王致中、郭延槐、郭法韵、杜学甫、马致远、王福田、高大羽、张兴亚、王会文、陈元夫、李昆玉等多人。其中有张兴亚、尹万国、李昆玉、杜学甫、李希成等人不是地下党员，有的因有一本《解放》小刊或一本《大众哲学》因与被捕人在一起坐的或住的，都受到株连也被逮捕起来。

1942年春，我父亲被释放（以上人员均已先后释放了），是以无证据嫌疑而放的。主要因素是该集中营主持人之一，叫杨恒山，为我祖父生前至友，因他的解救而放的。

1943年秋，又被安北县警察所逮捕，执行者是警察局的苗班长和一名警士，在安北县的居子吃卜村逮捕的。冬天由新安镇的一

名画匠霍世英给予周旋承保而释放的。同年腊月（春节前夕）第二次又被安北县为警局杨班长带警察一名在居子屹卜村逮捕，当时我父亲为便于活动，以农民身份寓居子屹卜村。

1944年春天由安北县太典乡（居子屹卜一带）农民辛勇、杜掌才二人应承担保而释放（辛、杜二人为当地富户），从此以后到解放前，经常遭受安北县警察局逮捕关押，一年一次或数次。

1949年秋，“九一九”全绥远省和平起义后，被敌特笼罩的恐怖与威胁才逐渐消除了。

50年春我父亲调回到绥远省人民政府，被分配到农林厅农业技术推广队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李石英的证明，在河套地区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农林厅党委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把一个为党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表现了不信任的态度。决定暂予一个时间的察看。

1951年春，我父亲受命带领推广队到凉城县工作，因与县长在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发生争论，耽误了数日工作的进程，回农林厅后受到批评，因此暂时取消察看。后来调到外地工作，把事搁开，虽数次请求解决关系未得实现。1957年我父亲直言不讳，为党在林业建设和技术推广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建议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到冲击，更以台籍异族等海外关系变本加厉，严施刑压加之以莫须有之罪名，所以把组织关系沉沦到今得不到解决。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重新归队，调到乌拉特前旗良种厂工作，担任育种助理农艺师。但组织问题一直悬挂未解决，在他临终前都念念不忘地说：“我的组织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因为我们的党是实事求是的。”

作者田中伯玉（女），包钢四中教师，历任昆区政协常委、委员等职。

## 缅怀何润华同志

〔朝鲜族〕 郑世荣

何润华生前是包钢第一批高级工程师。一九五八年为支援边疆建设由鞍钢调到包钢。曾是鞍山市、包头市的历届人大代表。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一日魂归内蒙大青山脚下。骨灰盒安放在包头市革命陵园西亭一排四架十九号柜内。在小小精制的骨灰盒周围摆满了小花圈，松柏，还有一个雄伟红色美丽的大公鸡（他属鸡）昂头面向东方。这些精巧玲珑的祭物，是表示我和儿女们对他的一片赤诚和怀念之情！每年在他的祭日和清明节，我和孩子们都乘坐包钢公司专派的车去陵园为他扫墓。每当我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为他再献上一朵小白花时，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波澜冲击着我那颗孤寂而自责的心。人最痛苦是莫过于自责。多少个难眠的日日夜夜就是在这种自责中度过的！我常想：假如不是我的冤案牵连了他，“文革”时他也许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摧残；假如不是因为我手腕骨折，使他牵挂而着急，也许不会犯病又住进医院；不住院，就不会看到那位盛气凌人的医生的蛮横嘴脸，使他感到了莫大的屈辱。虽然他容忍着没露出气愤的表情，但却无奈地告诉我：“还把我当成臭老九看待！”是因为曾长期受到过虐待的心理变态？抑或是由于神经的过度刺激而形成的敏感？还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总之，他是那样的痛心，那样的哀伤，似乎是带着一种莫名的绝望，当晚他就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的孩子们。我几乎不相信一个生命力那么顽强的人，突然倒下，难

道生与死只有一步之隔，一分之差？我哭着千呼万唤他不再醒来。他永远安息了！千秋功罪有谁来评说？他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一生结束了！留给我的无限悲痛！虽然他离世已三年多，但流逝的岁月并未冲淡我对他的怀念和自责的心理。往事反而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如在眼前，更加使我感到他品德的高尚，人格的可贵。

回忆他的一生虽历经坎坷，受尽折磨，但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鞍钢和包钢的钢铁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是在抗战时期从河北敌占区逃亡到大后方，一九四六年毕业于陕西城固西北工学院矿冶工程学系。这所学院系于抗战期间。由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北平大学工学院合并组成的。我听他讲当时生活很苦，学习环境很差，但他学习非常刻苦，各门成绩都很优秀。我和他长期生活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他是位知识非常丰富的人，而且外语水平很高，曾翻译过不少有关科学技术上的资料，以“辛木”的笔名发表在科技杂志上。我也听到科技情报处的同志们对他的评语：“他是我们这里的活字典”。这和他学生时代扎实的基础有关，也和他在工作中孜孜不倦地学习分不开。

一九四六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抚顺钢厂任技术员。一九四八年调华中钢铁公司小型厂任工程师。东北解放后，钢铁工业急需发展，于一九四九年调鞍钢小型厂。一九五〇年又调初轧厂负责热工方面的工作，主管均热炉的全面技术。这是日伪留下来的老式炉子，他常和工人们在炽热的炉旁一起劳动。炉底有钢锭遗留下的氧化铁皮渣子，日积月累影响生产。每到修炉子时，他总是和工人一起在高温下用钢钎和大锤清理炉底。他的挚友王立瑾（市政协副主席）曾回忆说：“每碰到他总是烤得满面通红，汗流浹背。”他为要在炉底装空气管道，往炉底铺焦粉，试图向炉内吹空气，把沉积在炉底的铁皮液化，以达到液体出渣的目的。这个技术措施他花费了很多心血，对提高均热炉的寿命和提高均热

炉的产量，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那年他被评为先进，受到表扬和奖励。

那时他和我已相识，下了班有时直接到二中去看我。有一次他脖子上围了块脏毛巾，穿着帆布工作服。有的老师误以为他是工人。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不讲究穿戴，但像他那样不修饰来会女朋友也是少见的。不过五十年代的年轻人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就是会女友，也是说上几句平淡的话或者看上一场电影就匆匆分手，因为明天还有紧张的工作在等待。

一九五三年，鞍钢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被调到大型厂基建科负责加热炉工程甲方的施工管理，投产后又承担了值班主任，负责全面的生产管理，他夜以继日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星期天也不休息。当时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的住房，工资待遇，以及社会地位都比较优越。住在“二·一九”公园附近，出门就是风景优美的花园和湖水。但他却无暇陪我和孩子去散散步，整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地坚持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一九五八年，是全国“大跃进”的年代，他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去山东考察大炼钢铁的情况，回来后他向党委汇报了“得不偿失”的炼钢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许认为他的思想落后于形势，派他到北京冶金干校学习。当时全国处于反右斗争的大风暴中，他的挚友王立瑾和周任源（大学同学有半个世纪的交情）都相继打成右派。他因性格内向，平时就沉默寡言，也很少谈论政治。因此他没被抓住什么辫子。但由于我的“冤案”引起他在干校的交心材料中，谈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不曾想在“文革”期间，这些交心材料成了他的主要罪状。

一九五八年干校学习结束后，他自愿调包钢，当时轨梁厂处于筹备期间，他在技术科，后因下马又分配在教育科，负责培训职工技术。他又兢兢业业为一批青年工人组织红专大学。除了负责管理，还担任了讲课任务，为轨梁厂培养了第一批技术人才，受到

职工的一致好评。三年自然灾害时，轨梁厂在沼潭和后山办农场种地，他做为一个技术骨干和中年知识分子和工农一样，用汗水浇灌大地幼苗。在劳动中和工人建立了朴实而深厚的感情。他平易近人，常有一些年轻人到家来做客，提出一些科学技术上的难题请教于他，他总是耐心指导。

一九六三年他又调钢研所搞技术工作。他一心想把科研结合与生产实践，解决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以促进生产。他提出的一些生产改进措施，被当时的领导所重视。他亲自下到炼钢厂蹲点，发现喷焦油雾化不好，与现场同志共同研究，作为当年的科研项目，他集中精力大量搜集了国内外资料，亲自设计规划。在克服各种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在钢厂制作试验设备。在作冷态试验时，他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终于顺利地进行了冷态试验，然后用于生产，解决了这一技术问题，提高了生产。他这种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不畏困难的精神，受到领导好评。我的孩子们受到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继承了他这种可贵的品质。更值得敬佩的是在他身患重病，刚刚出院不久，他撰写了“关于炼钢节能”的有关技术论述后，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初接到上海冶金局的邀请，去杭州参加全国有关节能的会议。当时很多朋友都关心他的健康，劝阻他放弃这次会议，但他执意说这次会很重要。我不放心，只好请了假陪他去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第一次南下，也是最后一次在美丽的西湖畔留下了我们的合影。回忆他的一生，虽未作出更多的、了不起的贡献，但他是那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地象春蚕一样，吐完最后一根丝而悄然离去！

我和他在性格上反差很大，但我们的感情笃深。我崇敬他的为人忠厚朴实，人格高尚。早在我以“特务”的莫须有罪名遭冤案而失去工作时，我怕影响他和孩子的前途，曾向他提出离异。使我终生难忘他的话：“不管你今后遭到什么恶运，我都将与你



同舟共济，相依为命。”他以极大的热情温暖了我当时已冷冻的心。而且在以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岁月里，都证实了他那忠贞不渝的感情。当我失去工作的二十年中，他在生活上自己一向艰苦朴素，就是给他做点好吃的，他也总是留给我和孩子。在精神上他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安慰，使我在漫长而痛苦的人生旅途上，重新扬起了生命的风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的春天。当我重新踏上教学岗位后，也是他积极支持我的工作，甚至带病帮我批改作业。他常说：你要把失去的年华夺回来，好好发挥你的才能。在他的鼓舞和帮助下，我的教学水平提高很快。

他除对我和孩子给予极深地关怀外，对朋友和同志更是真挚而善良的。在鞍山大型厂调资时，领导准备给他调一级，他谦让给另一位工资较低的技术员。这种高尚的情怀，一直使那位技术员很感激。他与人交往诚挚，善于助人为乐。因此很多朋友称赞他德高望重。即使他已离世三年，很多老同志一提起何润华的名字，总是以敬佩的口吻赞许……

作者郑世荣，系昆区政协委员，包六中离休老教师。



## 肿瘤专家李汇文

朱企泰 阎充英

李汇文,包头医学院肿瘤外科教授、主任医师,一九三七年从医。在医疗和医学教育战线已工作五十年。其功其绩有口皆碑。一九八三年,李汇文出席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表彰座谈会,荣获中央民委、中国科协和劳动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奖状和奖章,表彰他为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 (一)

李汇文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北省永清县一个农民家庭。永清位于京津之间,现属廊坊市。这里帝国主义入侵较早,教会势力渗透颇深,教徒甚多。由于父母皆信仰基督教,李汇文自幼在英国人的中华圣公会办的小学、中学读书,一九三〇年考取了由英国、美国、加拿大合办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并获年三百元的教会奖学金。经过七年的潜心研读,一九三七年他以优异成绩修业期满,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于该院附属医院,任外科医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祖国千百万热血男儿奔走呼号奋起抗击倭虏。在一派抗日声中,李汇文爱国热情沸腾,参加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的战地医疗队。在抗日前线抢救伤员。一九三七年底,他随第二十三医疗队从武汉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转赴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在黄河岸边,在甘谷驿方医院,李汇文默默地为八路军指战员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医治疾病,有时连续手术几个昼夜不得休息。在那里,他接触到中国革命的真正“脊梁”,浓烈的抗日气氛感染了他。八路军将士和陕北农民英勇抗日的行为教育了他。在那里,他阅读了革命书籍,聆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的报告,知道了什么叫革命,懂得了劳苦大众解放的道

路，看清了中国的前途。每当提起这段生活，他都异常激动，他说：“在革命圣地短短的两年，我受的教益却终身难忘。我知道点马列主义，懂得医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从哪里开始的。”

一九四〇年四月，他所在的第二十三医疗队奉调到河南、湖北等地工作。在这里，他看到的是国民党反动腐朽的统治，军事上连连溃退，经济衰败，民不聊生，他懊悔了。这与解放区欣欣向荣的生活和同仇敌忾的抗日气氛，是何等的不同啊！虽然他不能再回到解放区，但内心里更倾向革命。当然，这里也有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英雄。在湖北省南漳县，他结识了国民党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何、张出身行伍，爱国军人，我党地下党员，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何、张的进步思想，对李汇文有很大影响。在长期的往来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解放后仍过从甚密。

抗战胜利后，李汇文先是请缨于中国红十字总会，筹备北平红十字会医疗机构，一九四七年底又应国民党晋、绥、察善后救济分署卫生组织负责人兼绥远省卫生处处长张崇德之邀请，到绥远省立医院工作。张崇德与李汇文系老学同，交谊甚笃。李汇文在绥远省立医院先后任外科医师、外科主任、医务主任等职。

一九四九年，北京的和平解放，给绥远省人民带来了希望，也震动了国民党军政各界人士具有爱国思想和一定革命意识的李汇文，与我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今呼和浩特）联络处取得了联系，他经常向联络处提供当时新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并积极为被国民党特务枪伤的联络处工作人员王世鑫进行手术治疗。由于这些原因，他在工作遇阻和产生离开绥远的念头时，我党组织对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并于七、八月间带他到绥东解放区丰镇小住。联络处党组织认为，那时绥远地区象李汇文这样的医务人员还是难得的。他如离开，对极度缺乏医务人材的绥远有很大的损失。因此向绥蒙区党委领导同志汇报请示，同意由联络处向当时绥远省军政首长董其武将军交涉，挽留李汇文继续在绥远工作，经董其武将军同意后，李汇文又回到省立医院工作。“九·一九”起义后，李汇文同志被委任为绥远省立医院副院长。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 （二）

新中国诞生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为李汇文同志钻研业务，救死扶伤，实现把医术献给人民的宏愿，创造了条件。他

热心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和医学教育事业。解放前，他曾拒绝友人邀他赴美国工作的盛情；建国后，他又几次放弃了去广州、天津等条件优越地区工作的机会，在内蒙古安家，为边疆地区医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九五五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三十多年来，他曾先后任内蒙古医院副院长、包头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包头市卫生局副局长兼肿瘤研究所所长、包头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院长等职务，担负着繁重的卫生行政和医学教育领导工作，但他仍积极从事临床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始终没离开过那把为病人解除病痛的手术刀。他一直致力于宫颈癌、乳腺癌的研究，是全国宫颈癌协作组织负责人之一，在医务界享有相当声誉。

多年来，经他亲手治愈的患者数不胜数；他参加会诊解决的疑难病症也数以千百计。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家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向他求治的普通患者和找他求教的普通学生，也经常收到一封封带火热之情的感谢信。一九七九年夏季的一天，附属医院妇产科为一子宫颈癌患者施行根治手术，术中骹前较大静脉大出血不止，情况危急。医师姜子泉当即决定请李汇文教授前来会诊。当时正是中午，李老放下饭碗，直赴医院手术室。他将子宫及附件切除后仍看不清出血静脉。此时，患者出血太多，所备输血已不足用，血站也无可用之血，李老即决定将患者腹腔出血用消毒纱布过滤后重新给病人输入。然后将出血静脉血管用三只大长弯钳钳住，出血止住了，但无法结扎。他又决定修补后腹膜，保留三个钳子，不许碰动，然后按层缝合腹壁，只留三只大血管钳外出腹壁的把处不缝合。为避免外留血钳把不受碰动，李老想出用消毒的搪瓷碗将三把钳高出的把扣上，用胶带将刀口及全腹部妥善裹上。三天后打开胶带，小心取出止血钳，不见任何出血现象，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术后，手术室同志问李老：你这是什么刀法？李汇文说，我这是临时逼出来的法子，书本上找不到，一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临危不惧，不慌，沉着冷静地思考挽救病人的应急之策。否则，在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面前手足无措，就会贻误患者，增加死亡的危险。李老高超的医术、在重大危急病情面前的沉着态度和精神的经验之谈，使在场的医务人员无不叹服。

多年来，李汇文同志把很多精力用于提携后辈，培养人材。他的学生和经手他把手地培植的医务人员，有的取得了硕士学位，有的成了名家。象全国

“三八”红旗手蒋焰，已是主任医师，在妇科肿瘤研究上取得了成绩。然而，这些年来，李老自己发表的论文却为数不多。是他缺少科研能力，没有成果吗？不，李老曾多次参加全国肿瘤学术会议，结合临床经验提出的见解，都引起同行的注意。如一九八〇年在全国乳腺癌防治会议上，他就乳腺癌手术治疗及愈后问题作的专题发言，受到大会的好评。一九八一年在全国肿瘤防治会上，他提出的“髂内动脉结扎单次大剂量抗癌物注入并放射治疗脱子宫颈癌”方案，得到了会议肯定。可是，他确实也没有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撰写论文上，因为他心里装的多是患者，是学生。多年来，他仍坚持给医学院学生讲肿瘤方面的专业课，坚持参加临床会诊，结合临床实践，培养提高中青年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一次，他设计了新的科研课题——宫颈癌盆腔血管分离结扎术，然而他在这项对治疗妇科肿瘤有很大价值的科研题目中，没有牵头，而是让自己培养多年的蒋焰主持研究。当研究取得进展写出论文发表时，在署名顺序上你推我让，最后，还是李老强迫蒋焰把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才算了事。近年来，他见一位中年妇科医师，医学基础扎实，事业心强，潜心于妇科肿瘤病的治疗和研究，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仍答应拜他为师的请求，经常不辞辛苦地指导她手术治疗。李老诙谐地说，你是我的关门弟子！

李老自己发表的论文少，是他不能熟练阅读外文，难以掌握国际医学信息吗？不，他读英文犹如读中文一样，每天看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和各种外文期刊。他把自己广博的英语知识，也献给了医学事业，献给了医学人材的培养。几年来，李老不间断地将英文版的“亚洲医学情报”和“美国医学杂志”上有价值的资料翻译出来，送到市医学情报所，及时印发到自治区内外卫生医疗单位，供人参考。为了提高一些中年教师和医务人员的英语口语水平，他亲自组织英语高级补习班，和另一名从外国进修归来的教师一道，每周用两个半天的时间，为补习人员讲课。有人请李老帮助将自己的论文译成英文，他总是有求必应。在李老的办公室，我们几次看到他为年轻的大学生校对译文，也看到他的名字和那些未出茅庐的小辈们排列在一起。李老说：“做这些事情很麻烦，因为学生外语基础较差，译的东西不准确。我既要看看翻译得是否正确，又要看译文是否通畅。说实在的，比我自己翻译费事得多。不过，我还是愿意帮助他们，希望能超过我。”一次，蒋焰对李老说，我们外语怕一辈子也达不到您的水平了！李老听后很不高兴地说：“你是一个很

有志气的人；为什么在外语上就没有志气呢！”望着老人严肃的面孔，蒋焰觉得自己错了，她决心奋力登攀，不辜负李老的期望。

### （三）

在漫长的道路上，李汇文也遭受过误解和迫害。“文革”期间，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内人党”等多顶帽子，长期被批斗、隔离监禁、劳动改造，身心受到摧残，家庭被洗劫，亲人受牵累，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得到平反。对于这一切，他没有“耿耿于怀”，而是牢记党的多年教导，严格要求自己，一旦有了工作机会，就全力投身于工作。他坚持原则，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从不利用职权，谋一己私利，并教育子女追求高尚的生活目的，好学上进，工作第一。由于年高，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并没有离开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作为一位有建树的医生，他仍然关心着患者，每周，他坚持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市计划生育指导中心门诊咨询、查房会诊。他还坚持早在一九八一年他就主持的包头市医德规范教育工作。做这些工作，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讲，是十分辛劳的。可是他从无怨言，更不计较名利。名利，这个精神感染的细菌，曾毒害过多少人的心灵，有多少人在拼命追求它，而他对名利却淡如水，不为其所动。他曾亲手笔录郑板桥的一首咏竹诗：

节高叶少亦无花，  
遥将风雨送天涯；  
此身愿劈千丝篔，  
织就竹帘护万家。

今年元月下旬的一天，二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为一位直肠癌患者作手术，左侧粘连较厉害，请李汇文会诊时，主治医师提议请李老给大家做个示范手术。李老当即应允。他在手术台前聚精会神地操作了三个多小时，眼不花，手不抖，腿不颤，那灵巧的手指，娴熟的动作，快速、准确，使人心悦诚服，叹为观止。亲眼目睹李老的医务人员都说，象李老这样七十八岁高龄还能亲手做大手术的外科医生，真是罕见！李汇文说我到八十岁才挂刀呢！

李老以近八十高龄，仍能以他熟练的手术刀为病人解除病痛，自然是他基本功扎实，讲究积极养生之道的结果。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给自己定

了“不闲下来”的生活戒条，他除参加会诊、咨询等外，每天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阅读报刊，练习书法。……总之，他绝不让自己停歇下来，成为无所事事的闲人。他说，脑子只有不断用它，才能保持灵活；否则，会僵化的。甚至因身体不适应住院治疗期间，仍每天小楷抄写古诗文。他手术起来指头如此灵活，与他坚持练习书法不无关系。去年六月，李老参加全国抗老杯书法篆刻有奖大赛获三等奖。这说明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

由于李汇文具备深厚的医学理论基础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一九八〇年被评定为主任医师，一九八三年又被评为肿瘤外科教授。他除了担负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外，还先后被选为包头市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全国理事会理事、内蒙古科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内蒙古分会副理事长、包头市科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包头分会主席、全国子宫颈癌协作组副组长等社会学术职务。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李汇文从医执教五十周年的时候，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包头医学院联合召开了庆祝会。会上，各界人士对李汇文同志五十年的业绩给予了很高评价，包头医学院院长秦文斌教授说：“李汇文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一丝不苟的作风，为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和教师树立了榜样；他高尚的医德和正派的医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从生理上讲，李汇文同志确已是耄耋之年，然而他为人民服务的一颗红心未老，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未老。他曾用古罗马哲学西赛罗说的一句话表达自己的心情：“我赞赏那些具有老人成熟风度的青年，同样地称颂那些具有青年气息的老年人。这样的人，只有躯体会衰老，可思想永远年轻活跃。”

这就是李汇文！

## 归侨高级工程师潘玉良

张 毓 朱企泰

潘玉良，生在印尼，长在印尼，血管里淌着母亲带给他的印尼土著人的血的基因。但他却固执地认为：我是炎黄子孙，中国才是我的故土。因此，从1934年至1952年，他先后三次回国，虽历经坎坷，可是，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对故园的一片深情。

潘玉良，祖籍广东人。先祖是从广东出发，乘木板船到印尼邦加岛槟港落脚，一代代的先人皆在锡矿当矿工谋生。他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代代相传：“我们是唐人，瞅机会转唐。”

槟港是荷兰的殖民地。人们做工办事，要说荷兰语；走亲串友与人往来，讲着印尼语；侨胞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先，相互讲的是华语——广东语或闽南话。潘玉良，自幼上的是教会学堂，在每周一节的华语课堂上，他背诵着：“人手足口刀尺，山水田犬牛羊”和一时还弄不懂的古诗文。有些诗文，他至今背起来，也还那么滚瓜烂熟。他向往祖国巍峨雄壮的泰山，向往奔腾咆哮的黄河，向往“浓妆淡抹”的西子湖，这美好的一切，都是来自他人的讲述，迷人的课本。他立志要回祖国。

1934年夏秋之际，十五岁的潘玉良，因学习成绩好，被介绍到婆罗洲英国办的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去读书。旅费、学费、老师已经出面替他筹集好了。正要动身时，另一位老师的“水客”（亲戚），要回“唐山”，问他愿不愿回去。祖国，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他立即决定不去婆罗洲上学了。他告别亲友，跟



着这位“水客”踏进了华侨之乡——广东梅县东山中学。1936年8月，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师范科。

暨南大学在南洋是很有威名的。可惜，那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而又多灾多难的。芦沟桥事变不久，八月十三日，上海的战火就烧了起来。潘玉良，战前参加了学校的军训，战时又参加了学生救护队，抬担架、背伤员。因华侨学生救护队牺牲了两名学生，加上学校被炸，队伍解散了。同学们有的到了军队，有的回到乡下，有的要去延安。他想跟同学们去延安，怎奈他是外侨，荷兰大使馆侨民册上有他的名字，而且国民党政府已发表声明，要求各国撤走在华侨民，同学们拒绝了他。他只好到法租界的中华学艺社，参加了郑振铎教授组织的学生抗日活动。

八月三十一日，他乘荷兰王国租的撤离侨民的客轮——JcJL芝沙达尼号，离开了祖国。可那时，他却大呼：“祖国，我还要回来！”

1938年冬，潘玉良第二次又回到了祖国，进入昆明云南大学附中读书。1937年他回印尼不久，就接受聘请出任檳港小学教师，每月100银元。一年多的教师生活，他存下一笔钱。在老师们二次资助下，他进入云大附中读书。毕业会考，以前五名成绩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入四川大学。

最难忘的是1944年的冬天，成都市寒冷的气流，凛冽的北风，给潘玉良穷得冰冷的心，又添了寒意，他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糊口。奔波中，他发现《中央日报》登了一则启事，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译员。他想凭自己的学识去工作。十五名同学去报考，他也被录取了。1945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被送到重庆磁器口集中训练。一进去，就剃了光头，接着是照相、编号、写自传、起化名，跟着又发了一张登记表。他一看，愣住了！这哪是什么外事局！表上明明白白地印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志愿登记表”，实际上是军统局用外事局名义招考译员。

他感到自己受骗了，他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他骂天、骂地、骂人，他拒绝训练。他利用双重国籍的身份，吵闹着要出去。结果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恰好此时，他的未婚妻四川大学的同学刘经荣来了。她为他奔走呼号，扬言要找荷兰驻华使馆，也找到了川大孟侃等几位教授。在多方奔走中，几经周折，经人取保，最后发给一张“抗日证明书”，才又回到四川大学任教。

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中西文化研究所的赞助下，不久，潘玉良与刘经荣一起，第二次离开了祖国，赴比利时鲁文大学学习，后转赴荷兰来登大学无机化学实验室深造。

……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中，这段短暂的斗争史的往事，却变成了“特务”、“反革命”的“罪行”。他被“群专”抓进了“牛棚”，妻子刘经荣也被抓进了“牛棚”。他的人格遭受了污辱，精神受到了摧残，肉体受到了折磨。私下里有人悄悄对他说：“等运动结束，你呀，还是走吧。”

他反复想过此事：我对祖国不忠吗？我有不对的地方吗？他对祖国的爱恋是忠贞的！

1951年，潘玉良参加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王任叔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王任叔大使号召侨胞中的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建设。潘玉良当即精神振奋地决定：“我回去。”

事后，同事们灯下严肃地劝他说：“你两次转唐都吃够了苦头，现在教学，生活富裕安逸，又给老母亲盖了房。一个人每月薪水两千多盾，养活五口，还顾有保姆，转唐行吗？”但他决定了。

1952年6月，他携眷第三次渡洋回到了北京。他分在钢铁局工作，妻子刘经荣是学园艺的，分在园林局工作。回来时，他的母亲难过地拉着他们，含着泪把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送了出来，并说：“我也想回唐山看看。”他应承：“等我们安排好以

后，就来接你回唐。”谁料想，他们刚到北京不久，老人家竟抱着终生遗憾，与世长辞了。他，至今也没能到母亲的坟前添过一锹土，化过一张纸。

60年代初期，为支援边疆，他自己报名离开了久已习惯了的大城市生活，全家来到包头，与同志们一起共建稀土研究基地。困难时，一元钱一个窝窝头，五角钱一卷一支小兰花烟，四角钱一斤糖菜叶……有人离开了包头。他的远在海外的姊妹们怕他困难，给他寄来了米粉、肉干、黄油。是他自己写信告诉他们，生活过得下去，不要寄了。舅父、外甥、叔叔们也多次来信过问他的生活，并劝他赶快回去，他拒绝了。因为党对他的关怀一直铭刻在他的心里；50年代中期，有人诬告他回国以后在试验中有十一次事故，行迹可疑。他不敢再大胆立论，勇敢前进了。是党组织出面告诉他说，在科学实验中失败是常有的，而且是允许的，鼓励他大胆实践，并做出结论，把所列十一条逐一分析，是非分得非常清楚：无关就是无关，粗心就是粗心，责任就是责任。他深深感到了党的伟大、正确！

粉碎“四人帮”之后，稀土研究院党委让这位通晓五国语言的潘玉良出来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外语水平，他什么也没有说，接受了任务。这些年，在他的主持下，先后集中办过全日制外语脱产班四个、业余班四个，脱产和业余专业外语班五个，还有高级班和准备晋升高级工程师的“老头班”，以及冶金部委办的冶金系统青年技术人员的外语口语班和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半年脱产的外语学习班等。同时，他还要到外单位去讲课。这些年，听潘玉良讲外语课和辅导课的，不少于四、五百人。不夸张地说吧，稀土研究院四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大多数都接受过他的外语辅导，听过他的讲课。所以在稀土研究院里许多老同志都很亲切地称他“潘工”，许多年轻人都很亲热地称他“潘老师！”

值得讲的是在办德语脱产学习班时，院领导考虑他年岁大

了，主张拖一拖再办，他却坚持说：“我已年过六十，不能再拖。没人讲课我来讲，没有教材我去找。”就这样，谁也没给他任务，春节放假期间，他登上火车到了北京。人们去给他拜年时，他人没有了。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每天都看到，他从教室出来，就坐到打字机旁。打字机咄嗒、咄嗒的声音，震动着每个人的心扉。他伏在打字机上，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校对着一个个、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外文字。一页、两页，一章、两章，厚厚四大本为一套的德语教材，带着油墨的芳香摆到了每个学员面前。这里边可记录着他每天牺牲了的午休，记录着他没有休息的星期天。

在日益增多的外事活动中，潘玉良的才华和品德更受到多方面尊重。外事部门来请他作翻译，他不推辞；兄弟单位来请他作翻译，他不推辞；街坊和朋友们慕名而来请他辅导子女外语，他不推辞；稀土研究院来外宾，他更是义不容辞地去作翻译。1981年，加拿大湿法冶金专家来包头，他去作翻译，会面就接触专业，一个回合下来，从北京陪同外宾来的译员连声说：“真没想到，包头有这样高水平的外语人才！”还是这一年，荷兰一位专家到包头，在稀土研究院访问时，当他知道为自己作翻译的潘工是荷兰来登大学毕业生时，这位比潘工晚毕业十多年的异国校友，感慨万端，由衷地肃然起敬。

但是，尊敬潘工的何止是他的校友！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了人大、政协的选举和推荐，潘工被选举为：昆区人大代表、包头市人大代表、包头市政协委员、内蒙古侨务委员、全国归侨、侨眷、侨属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6月25日，六十五岁的高级工程师潘玉良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6日，包头市政协开会。早上，潘玉良刚推开大门步入会场，市长满面春风地第一个迎上来向他祝贺，说：“稀土研究院党委有胆识，为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开了

门，带了个头。”

这个头确实带得好。

党支部大会上，潘玉良说：“十年动乱把我打成‘反革命’，可我的血管里流着的是几代矿工子弟的血！我是矿工家庭，矿工子弟呀！”他的历史结论，还是50年代的结论。历史呵，又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年代！

党支部大会是严肃的。用党员们的话说，潘玉良的生命历程，是献给祖国的一曲深情恋歌，他那“九死不悔”的追求，就是对祖国赤诚的写照。

作者张毓，现任包头稀土研究院纪检委副书记；朱企泰，包头医学院副教授。

## “扫墓”的由来

寸心

清明节“扫墓”，在我国民间已流传两千多年了。为什么把祭坟称之为“扫墓”呢？

春秋时代，晋国有位名叫介之推的贤臣，当晋公子被迫逃难时，途中患了重病，在贫困潦倒的情况下，贤臣将腿上的肉割掉，熬汤救活了国君，从而立了大功。后来，晋文公得国，封了一批亲信做官，介之推不辞而别了。他带着年迈的母亲，搬回家乡的山林隐居起来。

晋王随即派人诏见恩臣。不料，寻遍了千山万壑，再也找不到介之推的影子。人们知道他是孝子，便用放火烧山的办法促其母子出山。结果，介之推及老母被烧死于林中！

因为这天恰是清明节，从此，每年乡亲们为介之推母子祭坟时，首先扫去墓上的枯草树叶，然后才烧纸。所以“扫墓”便成了祭坟的代词。

## 老教育工作者潘关崇

〔蒙古族〕马 德

潘关崇副教授，是包头钢铁学院基础课部原主任，退休后在学院教务处协助工作。从1956年9月来包头任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栽桃树李三十多载，为培养有用人才做出了贡献。

潘关崇，浙江省遂昌县人，1927年1月生。解放前就读于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1950年上半年，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教导总队的学员，受到了革命军队的教育与熏陶。之后在遂昌县地方人民政府做临时工作。1952年7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在宁波市第三中学任数学教师，后任宁波工业经济学校数学教师。1956年9月调来我市“包头建筑工程学校”任教。后来在该校和包头钢铁工业学校基础上成立了包头钢铁工业学院（即今包头钢铁学院），潘关崇就一直在我市任教了。多年来他一直是数学教研室的负责人，1981年1月经组织任命，就任学院基础课部主任，一边从事繁杂的教学管理工作，一边兼任数学教员。潘关崇是包头市政协第五、第六两届委员。三十多年前，他从锦绣江南鱼米之乡的美丽海滨城市宁波，来到当时还几乎是一片荒野的草原钢城的昆都仑区，牢牢地扎下根来。昆都仑区日新月异，发生了巨变，潘关崇也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中，为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

潘关崇从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一直没有脱离数学教学。他不是数学系毕业的，他学的是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但他从小酷爱

数学，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数学成绩在班内都名列前茅。解放后一直从事数学教学。多年的教学实践，多年的教研组长、教研室主任的职责，多年的自学、进修的孜孜以求，使他的从初中、中专到大学工科的数学教学工作，一直得到所教过学生的好评。他一共教过二十七个大学班，为学生编写过《常微分方程讲义》等多种教材，一些关于数学教学的文章发表在《数学通报》上。在他夫人的全力支持下，他全身心地为搞好教学进行努力。他三十多年来，通过校内外进修、自学、阅读钻研过三十来种中英文的数学及相关的教材，刻苦地自学数学业务知识。数学基础不断加强，数学知识不断丰富，通过自学，达到和超过了大学本科的水平。

为了搞好教学，他特别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他十分讲究教学方法与教学艺术。他还经常把教学中的方法、体会、经验等撰写成文，发表在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包头钢院报》上。宣传“启发式教学法”，主张“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能力”，“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分析能力”。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突破过去“满堂灌”的模式，从改革教学的结构入手。从1982年9月到1984年1月，在他所任教的建筑八二班，系统地进行了为时三个学期的教学方法的改革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项改革要求做到：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采用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学与教师精讲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与独立工作的能力（包括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运算能力以及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把教学质量提高一步。他在改革试验中，拟订启发自学指导提纲，安排好步骤与方法，认真制订好教学日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通过自学过程带动其他能力的培养与发展。自学中，学生自己要动脑、动手、仔细阅读，认真思考，养成读书的习惯，锻

炼思维能力。经过三个学期的实践，学生的自学能力与独立工作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所提高，改变了“满堂灌”的传统方法，学生课堂内外的积极性、自觉性更好地调动起来了，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在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不少增进，效果也不错。在教改试验过程中，随时注意学生的思想状况，学习情况，经常启发、引导、教育，既教书又育人，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改进学习方法，培养刻苦顽强的学习精神，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项成果，被评为冶金部教学改革优秀成果三等奖，刊登在《冶金高等教育研究》“获奖项目论文专辑”上。

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抓好师资队伍的建设，这是潘关崇工作的一大特色。做为一个老教师，多年来，做一直注重对青年同志的影响；做为一个教研室的负责人和后来做为基础课部的负责人，他更把培养青年教师放在了重要位置，做为当务之急。他注意言传身教，在教学中、工作中一丝不苟。他经常总结教学中的心得、体会、撰文发表。他不但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总结教师们的教学经验，他还多次组织教学经验交流会、座谈会，举办“如何教好课”的讲座，为青年同志现身说法，对青年教师加以启发和引导。他还在备课、写教案方面，对青年同志提出严格要求，经常抽查。尽管有的年轻同志当初不理解，可后来毕竟都很有收益。在带动与培养青年教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许多青年教师顺利地走上了讲台，迅速地成长。

潘关崇是从旧学校来的老知识分子，但他十分注意思想改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安心于边疆工作，把半生的精力献给了包头的冶金教育事业。他多次被评为校系的先进工作者，曾出席内蒙古高教系统先代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做为包头市政协的两届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并多次到一些小学、市教育学院等视察，就包头市的教育事



业提出建议。他积极靠近党组织，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于1986年6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87年1月，潘关崇按文件规定退休了，离开了基础课部的领导岗位。他又应聘担任数学课的教学。1988年3月，为了加强教学管理与教学研究，学院领导安排他到教务处，深入课堂听课，做些调研工作。近年来，干调研工作的不搞调研的现象十分普遍，但潘关崇却不然，他本可以颐养天年，但他退休不歇息，再做新贡献。他认真地把调研工作当做一项事业来抓。他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已听了八十多人次的课，他为了多掌握基本情况，拟制了《听课记录表》、《课堂情况记录》，不但把听课时间（包括年月日、周次、节次）、班级、教室、授课教师、课程名称、讲授内容摘要，准确记下来，而且将所听课课堂的管理工作（黑板、讲桌、桌椅、门窗地面、灯光）、学生情况（出席情况、听讲情况、课堂纪律）、教师方面（教学态度、基本技能〔板书、作图、语言〕、教案使用、采用教法）、评价（本课特色、主要优点、主要问题、综合印象）记录下来。为摸出规律，总结交流经验，找出问题克服不足改进工作，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不但每次听课都有详细的记载，而且，为了推动学院的教学工作，写出了八千多字的题为《切实过好教学关，努力更上一层楼》的听课专题总结，对如何提高对教学的认识，掌握教学规律、教学水平更上一层楼，以战略观点对待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出了中肯的看法。

来到包头已经三十二年了。三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他迈着平凡的然而却是扎实的步子走过来了。从一个年轻朴实的青年，到一个年逾花甲的学者，他过去岁月的二分之一是在包头度过的。他为亲身参加了包头钢铁学院的创业、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感到十分光荣；他为亲眼目睹昆都仑区的沧桑巨变，感到格外幸福；他为亲手培养的桃李遍及祖国天涯海角，感到无比自豪。在包头

钢铁学院三十周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潘关崇作为教师代表，面对来自祖国四方的校友和在校师生作了充满激情的发言。“奋力拼搏三十年，换来桃李遍天下”，他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和无尚荣光。他对包头钢院的青年教师和年轻学生们寄予愿望。他决心为教育事业的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做出新的努力。目前，他在学院教务处所进行的调研工作，不就是这种新的努力吗！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栽桃树李三十载，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还将继续留下坚实的脚印。

作者马德，现任包头钢铁学院社科系副主任。

## 祭 脑 包

· 寸心 ·

祭脑包是蒙古族的一种民俗，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由来无从查考，但民族聚居区均有固定的脑包点、祭奠时间和祭奠方式。

原乌拉特中旗的脑包，在昆都仑召与张家营之间。传统的祭奠时间是每年阴历五月初三。祭脑包的方法也较特别。这天参祭的人都要携带一块洁净的卵石，献在脑包上。垒砌整齐后，用铁箍束紧，在树枝上披挂彩色布条和哈达。然后，由主祭者将剑和旗插在脑包前，祭典即可举行。

这时，人们纷纷摆供品。随着击鼓吹号声，跳舞唱歌，祷告平安。

祭礼完毕后，一般都要进行摔跤、赛马、射箭三项体育比赛。比赛取头跤、头马、头箭三名“巴特尔”（能手），以庆祝和奖励。奖励的方法是，杀公牛一头，将肉切成细条，由全体到会人陪伴，烤肉聚餐，直至吃饱散会。这项活动曾延续到“文革”之前，成为牧民文体生活的组成部分。现在，已为那达慕盛会所取代，隆重的祭脑包盛典已不多见了。

## 郭长清其人

狄生云

### 从孤儿到无赖

郭长清，字松山，乳名才狮子。一九一四年出生于原萨拉齐县五棋牛尧乡三和马店村（现属土默特右旗明沙淖乡）的一个赤贫农家，牵萝补屋，日以为常。幼年丧失母亲，随后父亲也相继去世，沦落成孤儿。后其姑母董郭氏眼见其郭家遗孤，却也不免心惨可怜，遂收归于家抚养。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郭长清逐渐长大成人。他生得眉头低窄、颧高鼻直，口大脸长，膂力过人，高喉咙大嗓子，一副粗鲁相。这也倒罢了，他还整日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一次偷得邻村一家农民的一背带粘黑豆，竟能打下一石一斗。事发后惹得其姑母为人家好话说尽，赔了豆子，方才了事。其姑母常常苦口婆心地给予良言规劝，望之能迁善改过，但郭长清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一点改恶从善的迹象，照常如前，益发一味惹事生非，致使其姑母痛爱失望。

姑母弃世后，郭长清失去了衣食依靠。时恰值“华洋义赈会”于一九三二年结束了民生渠工程，成立了“华北公司”，即萨县新村农场，郭即投奔该场做短工，赶了马车。

他虽然有了职业，可以自食其力，怎奈流氓成性，积习难改，更每逢临村近乡庙会集市，举办文艺活动，他总是勾结一般兄弟哥们，起哄闹事，打架斗殴，挑男斗女，大出风头。

那时农家女人们看戏，大都坐在自家的或几家合坐一辆大车，郭由于膂力过人，常常将人家车轮的轴处一使劲，连车带人翻倒，他则大笑，扬长而去。如此恶作剧，时有发生。且以身高二米上下，绰号“折半灰堆”，为附

近村民所不齿。

由于郭长清时时处处惹事生非，华北公司只好将其开除了事。

## 投身自卫军

被开除后的郭长清，迫于生计，四出奔走，最后跑到萨县二区区长贾海峰处，补了一名区兵。没过几天，自觉非顶天立地之人，也颇有材小用之感，于是只身悻然离去。

当时的形势，日寇侵华，察省沦陷，绥东失守，归（绥）包（头）岌岌可危。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了，萨拉齐县刘威五、陈志仁等诸人，树起旗帜，组织人马，以抗拒日本，保家卫国。此时，有一个绰号叫长腿羊的老烟鬼，当了刘威五的一个连长，驻扎毛岱村，郭长清辗转投到那里，当了十名马夫，后升为小班长。

“七·七”事变那年秋天，日本人侵占了萨拉齐县城。刘威五率部逃驻党三尧村，归附了奇子祥。黄河结冰后，刘率部准备过黄河接受马占山改编为骑二旅前夕的一天晚上，郭长清串通兵士十多人，携械哗变。当时他慷慨陈词：“我郭长清今年二十四岁，出门就把下炕纸烧了，软骨头不是我姓郭的。我郭长清的脑袋就别在裤带上，我要与那狗日的小日本拼命。”

从此，郭长清独树一帜，自称连长，到处打家劫舍，游击作战，火并小股匪伙，袭击伪警据点，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扩充人马。很快地便发展和拥有四、五十枝枪的劲旅。为此，善岱乡士绅们推郭为萨县第五区区长，邀请驻扎善岱，维持地方治安。

不久，日伪在善岱建立警察署，郭即拉走，与老刘个儿合伙。老刘个儿也称纳太刘，年青时曾当过土匪，后洗手从良，因定居纳太村而得名。日寇侵占萨拉齐县初期，有二十多人的一队日军，窜到纳太村，住在刘个儿家，把刘的老伴、儿媳并闺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日睽睽面前，轮流奸污。刘个儿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怒火燃烧无法遏制，立即密招两弟二子，深夜闯入日寇住室，赤手空拳，把枪收缴，并将寇兵尽数打死。不幸的是纳太刘的一个弟弟也被日寇当场击毙。从此，纳太刘率众游击于萨拉齐县境内，自称独立师长，其实仅有五、六十人。此次郭来入伙，自然深表欢迎，郭当即被任为副师长兼团长。

合并后力量大增，且郭长清英勇善战，成为刘个儿的得力助手，两人遂

拜把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纳太刘为进一步拢络郭，将自己的义女指配给郭为妻，因此，郭也称刘为外父老大哥。

一九三八年春，因与日伪军边老五作战，纳太刘不幸牺牲。郭长清水到渠成地接任了独立师长，所部也扩充到二百余人。后于善岱大水桥村被日伪包围，突围后只剩下二十多人，后又扩充到八十多人，拉到大青山六道坝一带休整。

就在此时，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令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总指挥张钦，委派辅仁大学毕业生、大岱村人于维欧入山招抚。郭长清即被编为自卫军第五路，任少将指挥官，于自任参谋长，并指定防地，由六道坝移驻黄河南岸的原萨拉齐县张义成尧子、海流素一带，做为根据地。

五路军下设三个团：一团长郭万有，二团长董占海，三团长张万瑞。

郭长清当上少将指挥官，自觉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他坚持每日学三个生字，以开眼界，增进知识。数年后，长进很大，基本能粗通来往信件和公文。

一九四一年九月初，傅作义的自卫军一、六、七、八路挺进日寇占领区溃败，遂将二路刘效贤部拨归第二游击区刘万春指挥；三路李正才、五路郭长清拨归第一游击区张砺生节制，郭为二纵队，李为三纵队。四路改为游击队，自卫军司令部撤销。此时郭长清深感自己处境，于是星夜兼程，率卫队驰赴陕坝，面向傅作义哭诉：“我跟傅长官好几年了，傅长官怎么就不要我了？我决不开傅长官。拨给谁，我也不跟他……”。他哭得声泪俱下，活象孩提缠着妈妈。不料经此一哭，郭长清所部的五路军，竟成了傅作义直接节制的骑兵挺进第二纵队。

郭长清对上司毕恭毕敬，但对下属则不然。如或发觉谁个言行不满、应付命令时，全凭武力镇压，一副凶神恶煞相。不是公开处决，就是秘密暗杀，因此人各自危，无不畏惧。一次，早为郭猜忌的老奸巨猾的张万瑞，心怀疑惧，也想另辟蹊径，白起炉灶，于是单独赴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处，以示联络。等张返回后，郭当即以擅离职守为借口，马上解除其武装，清洗其心腹，悉数驱逐离队，不准滞留防地。事也凑巧，半月后的一个中午，张万瑞突然出现于郭的司令部院内，郭一见，手枪一拔，打翻在地。但仔细辨认，原来不是。抢救醒后询问，才知被击中者乃东北挺进军的一位连长，因坐马走失，特来寻找，而遭此不幸。

对于同僚，郭长清自己总结说：“蒋（介石）先生那里来的人爱权，阎（锡山）先生那里来的人爱钱。”

郭自负为“天生将才”，在识得几个字后，就常对众人说：“我不论什么，都比你们高一头。生活上我烟酒不动，打仗、识字我文武都能”；“念书人不过就是能认几个字，只说不做，害怕打仗，只好办些文案，做点事务工作。”其实，他最怕的正是知识分子，深恐伺机夺权于己不利，所以时近时远，从不专陪一人。

### 抗击小日本

哗变后的郭长清，虽曾与日伪有几次遭遇战，但影响极微。和纳太刘合伙后，其影响才逐渐大增。

据说当时《大公报》曾载一则新闻，其大意说：绥远沦陷后，群众自动抗日组织，如火如荼。有六十余岁刘姓老翁，及十几岁的郭姓小孩，率领所部，出没于萨县境内，经常给敌人以重创云云。这则消息，虽欠具体翔实，但显然指得是纳太刘和才狮子，可见其影响深远了。

纳太刘牺牲后，率二百余人的郭长清在善岱区的大水桥村被日伪包围。突围后，清点人马，除了死的、伤的、散的、被俘的外，仅剩下二十余骑，遂撤到小韩营子。小韩营子有洋人教堂所在，早已筑有城堡炮台，易守难攻。郭长清独霸小韩营子二十多天，有人劝他投降日本，据说日本人还许愿给其“靖安团长”之职，郭即大骂道：“日他祖宗，我郭长清只要有一条枪，也要打日本”。随即在炮楼上悬起国民党国旗，显示出炎黄子孙的骨气，激励着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志气，后来所部又扩充到八十多人。

驻防张义成尧子、海流素一带后，可谓天时地利兼而有之。天时者，打着抗日的旗帜，题目正大；地利者，黄河天然为界，进退自如。但是，其困难自然很大：首先是军纪问题，虽属官兵，但从未正式整训，且兵士多系土匪出身，不象个队伍；其次是武器、弹药、服装等上级不给补发，官兵薪饷，更是无从说起。自卫军司令部指示：这些要从日寇占领区自行解决；第三是军食粮草就地直接征收，这势必招致当地民怨。这三个问题，使郭长清费尽脑汁。

一日，郭长清招集指挥部卫士和特务连官兵等训话，好半天才算集合起来。郭勃然大怒，厉声喊道：“副官长？！”“有！”张万瑞立正听训。郭破口大骂：“没你这个副官时，军纪不好；用上你这个副官长，连集合也站不起队，爷爷要你挠痒了？”顺手拔出手枪，对准张万瑞，继续骂道：“告诉你，再管不好兵，爷爷把你一坨旦就崩了！”随即恨恨而去。张万瑞接着对大家说：“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吧！服从是军队的生命。到敌占区让你刁你不刁不行；在驻地不让你抢，你要抢也不行。今后谁不听话，我也是爷爷一坨旦就把你崩了。士兵犯纪律崩班长，班长犯纪律崩排长，排长犯纪律崩连长，不信——你就试试看！”经过郭张二人的双簧折腾戏后，部队纪律确有好转，但也是比较而言。

旋即任张万瑞为第一支队长，其表兄董占海为第二支队长，堂兄郭万有为第三支队长，刘帮述为补充团长，张之泉为特务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部迅速扩大，到一九四〇年前夕，已有千人之众。其活动范围，在黄河以北的日寇占领区，大致西起公积板，东到陶思浩。他们先后越黄河，袭击银匠尧子、五盛公、王五棋营子等日伪据点，摧毁了日伪阵地。

一九四〇年初，郭长清接到其拜把异姓兄弟马定远信。马父充任日伪保长，常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更为虎作伥。被自卫军第三路以汉奸罪名镇压。马信目的，是要郭长清给予作主。信虽亲笔，但没盖印信，且文言叙事，经人讲解，郭方懂其大略。遂说道：“不盖手章的信！还算什么信！当汉奸就是当汉奸，何必哄人！”拒不答复。

一九四一年春，郭长清率部过黄河破坏日寇铁路运输，乘机袭击了萨县火车站，活捉一日本人名叫平仓义一。解送陕坝自卫军司令部，受到明令嘉奖。同时，配合安春山师，收复锺口（现包头东兴）南岸的日伪桥头阵地新城，击溃驻守新城的日伪绥西联军陈秉义师的一个团；配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所部，攻克党三尧子黄河南岸的日伪据点新台，迫使驻在该地的准格尔奇子萍的一个团退居将军尧子。从而彻底粉碎了日伪驻军黄河南岸，威胁窥视伊盟的阴谋。

活捉平仓义一，气坏了日本人。日本人把郭长清视为眼中钉，他们当然要乘机报复。每年黄河封冻后，日寇就出动飞机、大炮、坦克、汽车，配合伪军，过河进行“扫荡”，企图一举歼灭郭长清的队伍，强化萨托地区治安，

以便向伊盟推进。郭长清凭借其地理优势，每当黄河结冰之前，就把非战斗人员及官兵家属，有步骤地转移到沙漠以内，分散居住。同时动员当地居民，也都随军退走。只留少数轻骑应敌，以逸待劳、以静制动，隐伏要隘路口，凭险阻击。倘或攻守激烈，沙漠内主力又能及时增援。日伪浩浩荡荡的大军，只有空室清野，常常还要挨打受揍。日伪地形不熟，况沙漠内汽车坦克行动不便，总不敢贸然深入搜索，只好以飞机空投滥炸，以火炮远距离瞎轰，以示报复，结果每次都一无所获，放火烧毁民房住宅，失败而归。五路军官兵及当地群众，待次年春来黄河解冻，又都返回住地，重振家园。日本人隔河相望，奈何不得。

### 敌视八路军

郭长清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没有与八路军直接开过仗，但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三人言虎即有虎”的缘故，使他对共产党既怕又恨。当时任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委员兼五路军副指挥官的辛裕如，以及中统特务，频频向郭长清灌输国民党的反动观点，极大的影响了郭的思想。再则郭长清本人随着环境的变迁、权力的增大、以及经济的富足，使其思想必然产生仇视共产党的变化。

抗战胜利前夕，战争形势如同大江东去，迅猛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人民，不利于日伪反动派。傅作义为了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及时委任各县游击县长，并任命郭长清为托（托县）、和（和林）、清（清水河）、绥南行政督察专员。

“八·一五”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郭长清配合马占山接收托县城后，所部已将近数千人。他即挥师北上，直扑厚和（现呼和浩特市），先头部队进入大南街，时近深夜，原驻小校场的伪蒙古军门树槐师，正与决心解放厚和的八路军激战方烈，敌军行将不支。郭长清这支生力军，立即向八路军发起进攻，为伪军作帐，致使八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弃城撤退。给傅作义铺平了东进的道路，延长了人民的痛苦和灾难。

事后，傅作义召开庆功奖励大会，分别奖励鄂有三、郭长清、王有功、郭青云这几位“抗日民族英雄”，借以鼓励他们继续“戡乱”。

正当郭长清陶醉于民脂民膏架起的安乐椅上，昏昏然闭目养神之时，郭的下属，驻守清水河县的陈增福团，被我八路军集中兵力，悉数歼灭。做为



绥远保安旅长的郭长清怒火三丈，气恨发疯，亲率所部策马急驰，前去报仇，可是“愤军必败，兵家常理”，郭冒然直进，钻进了八路军预设的埋伏圈。

顿时炮火连天，喊声四起，都来活捉郭长清。郭情知中计，死命突围，才免当俘虏，俱检点人马，只有二百余骑，只好给魏岗合编为一个团，自动辞职不干。

怎奈“好吃屎的闻见屁也香”，郭长清本是打家劫舍起家，现在突然失掉兵权，放弃老本行，更难免心馋手痒，又深恐其既得财产不易保护，所以他又急忙越过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乘飞机直接到北平面谒傅作义，陈述覆军经过及“戡乱建国”抱负。傅作义又给了他一个“救民先锋队指挥官”官衔。

郭长清回到绥远后，纠集旧部，死灰复燃，活动于绥南及山西平鲁境内，狼奔豕突，到处碰壁。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解放绥包时，郭长清率部转移到萨拉齐县境内。解放军撤退后，即驻守萨县城防，继续为非作歹，蹂躏人民。

## 鱼肉穷百姓

前文已经提及，郭长清靠打家劫舍起家，蹂躏穷苦百姓当然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投身自卫军，当上指挥官，自成官兵，应该有所收敛。但当时明令：部队枪枝弹药及给养，全由日寇占领区自行解决。这无异于给郭长清鱼肉穷苦百姓大开绿灯，更不啻明令进入沦陷区后，可以为所欲为，这也倒正合了郭长清的心意。

因此，以扰乱日伪治安为名义，以游击为形式，不时派队过黄河活动。所到之处，“人吃饺子马喂料，姑娘媳妇陪睡觉”，又以“抗日救国捐”的美名，代替了赵半吊子（土匪头子）的“请财神”（帮票），任意收割民财。真是“郭部进村，鸡犬不宁；无论富贫，掳掠一空”。

特别是每年一度收割鸦片季节，郭长清总要派出大部人马，进行敲诈勒索。那时的沦陷区人民，视大烟为合家性命所系。伪政府要以市征收税赋，伪警察要沿户勒索，日特要见人讹诈，零星小股土匪还要不时“帮架”、刁抢，哪个不给一柱香也不行。这些已经使劳动人民“应接不暇”。郭长清本

人也非常清楚这些，所以委人出发时，他都谓之“可以不择手段！”这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加剧了人民的痛苦。

郭长清的私生活更是令人发指。善岱区属的大水桥村被日伪包剿，正是郭长清亲自奸污十四岁农家少女，疏忽大意所致，结果二百之众只残留二十余人，险些全部覆没。在托县境内的某村，郭长清发现一个小媳妇，认为很漂亮，就要人家“侍寝”，但媳妇的公婆、丈夫及本人都不愿意。郭怒道：“老子舍命抗日本，你陪陪还不情愿！愿意也得来，不愿意更得来！”遂令护兵强架而至。

司令如此，可想其下属。郭长清还特别规定一条奖励办法，即不管何人，只要能缴获枪枝，或招抚零星小股者，都按其价值轻重大小，给予物质鼓励以至提升晋级。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极大地调动了所部虐民白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郭长清的五路军连以上带兵的实力派人物，都是骡马成群，牛羊满圈，暗财各有若干；班排以上的“战将”差不多都从沦陷区掳掠民妇民女，做为自己的“太太”。

郭长清本人究竟有多少财产，明的在包头、萨县、归绥、北平都置有房产，暗的很难估计。不过从一九四四年后半年起，在所部人们中间流传的“鄂拒有，郭拒富，王拒瘦”的说法看，可说明一定问题。上述双关语，意思是：鄂有三有求必应谓之有，郭长清积蓄很多，但不轻易给人而致富，王有功聚敛不多，且又贪鄙不拨，故曰瘦。但不管有也好，富也罢，瘦也一样，总之都是敲诈勒索人民而来，鱼肉群众所得。他们都是穷苦百姓的吸血鬼。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的八月十六日，郭率部协同打退八路军后，在归绥城内乘机抢劫，连夜席卷“工业组合”和“大蒙公司”的物资与烟土，并且用汽车拉运“蒙疆钱行”的现洋及其它财产，闹得全城人心惶惶。事后郭的此次抢劫，不但不被追究，傅作义还任命其为绥远保安旅长。此时，董占海、郭万有、刘帮杰等人，已拥资巨富，要享清福，辞职不干了。故编魏岗、陈增福为一、二团长，萧德胜为预备团长，是为其下属。这些人，在郭长清的率领下，一直为非作歹到覆没。

### 终遭恶报应

一九四九年，绥远省开始酝酿和平谈判。郭长清眼见大势已去，深感自

己不喜欢且十分不利自己的局面即将开始,于是他即散伙隐退,与原国民党十三旅旅长高理亭等人集资合股,在河套的狼山地带开设煤矿,办起采矿业来。

在傅作义、董其武先生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绥远实现了“九·一九”和平解放。

共产党采取宽大政策,对傅作义旧部一律包下来而既往不咎。在归绥麻花板举办学习团,统一进行思想改造,悔过自新,使其夹起尾巴,重新做人。

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郭长清不愿去。当他在归绥面谒傅作义时,便问道:“傅长官,我不去参加学习,行不行?”傅即对郭说:“学习是好事,你应该去。如果确不愿去,也可以罢!但你要三思而行。”在郭长清的主观上,自认为“钱够花,觉够睡;吃不完,穿不穷,何必再去接受什么教育与改造?而说共产党是自己的敌人呢!

岂料,不参加此次学习,更说明他继续与人民为敌之思想的顽固。人民当家做主之时,当然要加以过问。一九五〇年,郭长清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 结 束 语

一篇关于郭长清的小文,就这样草草写就了。但认识自然界之物体固然已很困难,而要认识人文界的客体就益发困难了。况人乃是活动的物,都有许许多多、明明暗暗的各种言论行为,做为遮盖其本质的假面;再则郭长清本人已作古多年,真正的知情人又很难寻觅,故只能从传说的汪洋大海中收索其蛛丝马迹的行径,所以总不免事与愿违,写出些不切当时实际的东西来。

好在有张尔杰、李尚仁两位老先生提供的书面材料,以及一些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和材料,才斗胆写了这篇文字,以期引起知情人们的追思与回忆,对今天的文史工作有所裨益。

## 萨拉齐匪患纪略

狄生云

过去，有人常常说：“萨民素刁”、“萨拉齐地面出土匪”。现在人们又往往称为非作歹的不法分子是“二茬土匪”。但是，这土匪在萨拉齐的来历和原委，却愈来愈鲜为人知……

土匪，古时也称“响马”，民国后称“独立队”、“不浪队”等，意即地方上的武装强盗。

据史料记载，在整个清王朝时期，萨拉齐境内虽曾在宣统年间（1910年前后），有极少数跳梁小丑于要隘路口劫夺行人之物，然多系昼伏夜出，也仅限于偏村僻道，稍示恫吓或欺诈，得之则扬长而去。当时小有名气者有高二、黑侉子、王明罗等人。他们所持枪械大多是叩帽火枪，其中高二匪伙较强，也只持有别名为“五爪龙”的一只马枪而已。

民国以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于是匪情愈演愈烈，其手段也愈来愈奇、愈来愈残，危害更是愈来愈大。

民国三年（1914年），匪首刘三林、刘四林弟兄（河西人）扰害萨拉齐，抄掠民警枪枝，捆绑富户勒索财物。此为萨拉齐境内“绑票”之始。时土右境内有豁牙老五（山西人）、安鹏飞（归绥人）、云升（老达尔古，萨县人）、白留锁（萨县人）、马成龙（四子王旗人）、二长条（大同人）等土匪活动。

民国四年（1915年），驻扎库伦的内蒙古招讨使东盟某公失势，其统领卢占魁（字耀臣，丰镇隆盛庄人）伙友赵有禄、苏雨

生（丰镇人）、烂头老二、白虎臣（绥远人）、武耀威（察哈尔人）等近千人无所依归，持枪械数百，盘踞武川西区一带，号称独立马队（独立队之名由此而始），四出绑票谓之请财神。尔后向西、南、东扩展地盘，于是包头、归绥商路一时断绝，货物运输停滞。后袁世凯令其子袁克定之马弁冯占元率骑炮军十营前往包剿，不期于固阳银号村附近被卢设伏击败。大炮数尊，枪枝弹药多种，几被收缴，卢势愈大。

是年旧历十一月廿六日，卢占魁率众围攻萨拉齐县城。进城后，捣毁县衙，夺取警署枪枝弹药，释放囚犯，火烧当铺，开仓放粮，劫夺钱庄商号，官吏富商多人被致死致伤。占据五日间，沿门挨户恣意抢掠，金钱美女是其首要之物。事后统计，仅萨拉齐县城被掳去黄金、现洋、钞票、货物、衣物、器具、马匹等共折合现大洋三十三万元之巨，死亡十九人，伤者更多，妇女受辱者无数。

萨拉齐县城遭此一场浩劫，经济上受到莫大损失和打击，特别是骡马等牲畜被劫掠一空，给生产带来极大困难。而在老百姓中，思想波动更大。一些无赖和不法分子蠢蠢欲动，一般良民百姓为生计所逼，抢人掠物的荒唐念头油然而生。

于是少数人，有枪马的成群结为“独立队”，无枪马的手持棍棒成为“不浪队”，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明火执杖，拦路劫夺。当时有名者如疙瘩老七、刘玉山（河曲人）、张太、周宏兵（托县人）、刘宽（萨县人）等。

民国十年间（1921年），陕西人小五杨（杨万贞）以哥老会名，由川陕北上，流窜土右境内。此帮会枪马齐全，口称“杀富济贫”，实乃一帮土匪。每到一村，按人索要一至三银元，强迫乡民入会。不入者称“白头牛”，不仅挨打受气，而且家产难保。初时如此，到后来“只问匪不匪，不管会不会”，凡村凡人遍遭劫掠。人民生活无着，土匪一时多了起来。

次年旧历三月廿八日，加入哥老会的萨县保卫团官佐兵夫，勾结城外土匪，一夜间将保卫团之库存枪枝弹药席卷一空，尔后四散。继而土匪大起。诸如赵半吊子（赵青山，萨县人）、杨猴小（杨耀峰，河西人）、杨守成、苏雨生、郭德胜、陈德胜（萨县人）、张耀、郭长胜、金此志、小金子、王元挠、王虎成、刘喇嘛（烂扁刘）、周振飞（托县人）、李招兵（萨县人）、王老达（萨县人）、偷屎陈（陈秉义，五原人）等，此时活动较为猖獗。匪伙较大者苏雨生，久居河西一带，土右人民受害尤酷。男女被掳，变卖家财田产，凑资往赎“财神”者不绝于途。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奉军和国义军开仗，匪又趁机暗聚，强悍者有金山股，次为苏八音（萨县人）、赵亮股，还有发彦刘（萨县人）、烂头王（河西人）、府谷刘、杨巴图、瞎毛、刘营长（山西人）、郭大个儿、若宪等，时扰萨拉齐。

第二年秋，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失败，西撤路经土右旗境，十余万众，整整过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优良的枪械使妄图充当土匪的和已当土匪的人心馋眼红。于是一些胆大的家伙便跃跃欲试，企图劫夺枪枝。由于国民军溃不成军，不料让其缴械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紧接着，肆无忌惮地夺取枪枝弹药的行动便开始了；有的手持镰刀，有的高举锄头，有的红布包物冒充手枪，胁迫国民军士兵，索取枪枝；更甚者，一些退兵竟将枪枝弹药或者随地抛弃，或者变卖钱财，或者兑换马匹等等。由此，给萨县境内土匪如同重新武装一样，使其如虎添翼。土右旗境内土匪如此火上加油，几成土匪的世界。

他们为了逼取黄（金）、白（银）、黑（大烟）等物，动用非刑，大打出手，无所不用其极；烧红铁条插入人耳谓之“打电话”；烧红铁锹让人裸臀而坐谓之“坐火车”；煤油辣椒水灌人谓之“喝汽水”；烧红火铲烫人脸谓之“美容貌”、烫人体谓之“打烙印”。这已是惨无人道，更甚者，强令所掠女子裸体仰

卧，任其奸污，谓之“坐宝毡”，稍不如意，便以沸油灌其七窍，使之立毙。真是残忍至极。土匪所到之处，“人吃饺子马喂料，姑娘媳妇赔睡觉”，过着“天天过大年，夜夜入洞房”的罪恶生活。

当时仅活动于绥包一带有名气的匪股，就不下三十，大股千儿八百，小股百十为群。

察素齐附近有任福祥（归绥人）、小马、范福海、光义、二有子等股；

萨（拉齐）托（县）之间有郭于梁（萨县人）、死气杨、杜来成（五原人）、瞎捻、楞四、四罗圈、管梓等股；

美岱召附近有苏八音、孔老旦（萨县人）、赵九子、郭大个儿等股；

萨拉齐附近有冯六奎、尚德胜、杨二愁、李老么、辛留柱（托县人）、王有元、徐文标、戴海源、小金子、张耀等股；

萨（拉齐）包（头）之间有陈德胜、陈德奎、小万万、张生荣、周宏兵、周长旺（托县人）等股；

包头附近有尤瘳子（尤如智），张炮弹、李三河、郭秃子（郭春山，陕西人），烂脸高（高福荣，包头人）等股；

其它有名的还有李志秃（李大脚板，河西人）、胡双双（归绥人）、高有光（萨县人）、裴姑娘（陕西人）、郭四儿（郭青云，萨县人）等匪股活动于土右旗境内。

至于不知名者，零散的土匪，更是不可胜数。一时间，土匪多如牛毛，贫苦善良的百姓一无钱，二无物，备受欺凌，苦不堪言，妇女受害尤深。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久旱成灾。被收编的匪首赵半吊子于归绥联络各匪伙，自任总司令，重操土匪旧业。匪众约在两千余人，持枪械者十之八九。横行土右及周围旗县。新把头乘势而起，应运而生，诸如赵半吊之侄赵双鱼、戴海源之叔戴老把、郭

秃子族人郭满满以及立眼张、双鞭张、五大个儿等。赵匪重起，加之灾荒，人民受害益重。

其后，大部土匪被收抚，委以师、旅、团、营、连长等职，匪身价日高。自居奇货，不可一世，成为官土匪。每到地方，名为官兵，实则比土匪更甚。一时，人民分不清哪是官兵，哪是土匪。兵亦匪，匪也兵，兵匪混杂，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人民之痛苦难以言状，家多破产，人皆失业，鸡犬断种，牛马绝迹，真有“千村霁雳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荒凉景象。

民国廿年（1931年），政府力主镇压，匪情有所收敛，人民才稍有安宁。

但好景不长。日寇的侵华战火在“七·七”事变的那年十月，即燃烧到萨拉齐，使土右旗人民又陷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随之而来的又是遍地土匪；暂时潜伏的公开跳了出来；洗手不干的又把暗藏的枪弹寻找出来；为客观形势逼上梁山的人暗暗行动起来；一些蓄意抢夺人财的不良分子更积极行动起来。当时较出名的有鄂友山、郭长清、管大嘴、郭万旦、刘明红、纳太刘、二德子、李英、胡亮、毛忠兴、杨全仁、朱三挠、二顷灰、张本楼、哼喂扣、小屈、魏节客等。

他们抢劫奸淫，无所不为。劫夺财物后，即随意逮人捉人。殷富之家的大人小孩曰“财神”，一般人家的男女曰“大土地”，次一些的人家之人曰“小土地”。捉之随部带走，做为人质，并限期限地赎之。被带者往往只供饿不死的剩饭，且随意鞭打或做苦役，使之备受痛苦，让其自己督促家人迅速赎之。部队开跋或开火，或不及时往赎者，一般尽皆处死。瞅见谁家媳妇闺女小有姿色，强令赔侍或带走，稍不如意，则毁容致死。

例如郭长清，所部近千人，连以上的带兵实力人物，在日寇投降前，都是腰缠万贯，骡马成群，牛羊满圈，班排以上的战将差不多都是掳掠民妇民女，做为自己的“太太”，可想土匪们的



行径。

这些家伙全不管人民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之中，恣意鱼肉，横行城乡，使人民受尽苦难。

总之，民国建立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余年中，在土默川平原上，在素称勤劳、勇敢、善良纯朴的土右旗人民中间，曾一度出现了一小批乱臣贼子，伙同外旗县外省市流窜来的一些家伙，频频活动于城市乡村，恣意烧杀掠抢、蹂躏奸淫，有意无意地在客观上配合了军阀的混战，日寇的屠杀，国民党政府的摊差抓丁，使人民备受苦难。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这又确实是历史的产物。

历史的产物，就有其产生的条件和背景：从政治上讲，解放前的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没有一点权利可言；从经济上看，人民受尽剥削，生活无着，贫困潦倒，终日为填肚子而发愁。于是一些人便铤而走险。

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直接原因：例如陈家营的陈德胜，家庭当时可谓殷富，忽一日被匪抢劫，牲畜骡马全被抢光，口粮种子均被吃尽。一时无以生计，最后选择了当土匪之路。正如陈自己说：“人家能当土匪，咱们就为甚不能当！”再如纳太刘，日寇侵占萨拉齐之前，他已洗手从良。日寇入侵，横行城乡，实行“三光”。一日，二十多人的一队日兵窜入纳太村，住在其院，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面前，将其老伴、弟媳、媳妇、闺女等强行轮流奸污。纳太刘盛怒之下，与其弟其子三、四人赤手空拳，将日兵悉数打死，夺取枪枝，第二次聚众当上土匪。

由于种种原因，土右旗确出现过不少土匪。但当时卖地名者也多，本来不是萨拉齐的，也谎称之，人们便以讹传讹，以诈传诈，于是有了“萨拉齐地面出土匪”的传说，更蒙受了“萨民素刁”的不白之冤。

自然，与人民为敌的人岂能有好下场。大部分土匪都不得好

死；有的被同伙火并时打死；有的被政府军围剿时击毙；有的在劫夺时被打杀；有的被活捉砍头；等等。

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民政府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剿匪肃特工作，才彻底清除了这些历史垃圾。人民拍手称快，处处安居乐业，祖国大地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土匪已成为历史之名词。

## 林伯渠和《包钢报》

杜守恒

1958年6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林伯渠，以古稀之年前来视察包钢建设。住在东河宾馆的林老，因天气炎热，加之旅途劳累，左眼患了“球结膜下溢血”的急性眼疾。负责保卫工作的市公安局谢玉林处长，特请我市眼科专家郭体绪登门诊治。当郭大夫踏进林老住处时，只见他左眼绷着药棉，手里捧着《包钢报》，正聚精会神地阅读。握过手后，林老把医生让在他身旁的长条沙发上，说：“给你添麻烦了。”

“首长辛苦了！”郭体绪问候林老之后，见他抱病读报，连忙建议道，“您的眼睛需要休息呀，怎么还能看报纸呢？”

林老和蔼地答道：“这是我专门要来的几期，了解包钢，怎能不读此报！”

在保健医生的催促下，林老接受了郭大夫的治疗。经检查，他不但左眼球结膜下大片充血，右眼底动脉硬化也非常明显。根据临床规定，凡是充血眼疾患者，都要休息治疗，以防病情扩展。于是，郭体绪提议，请首长暂时停止工作。林老听后，摆摆手说：“那可不行！我是专程来访者，难道刚到包头就住院？”

就这样，第二天上午，他在包钢总经理杨维等人的陪同下，忍着眼疾的痛苦，走遍了包钢建设工地的各个角落。当天晚上，他又挥笔作了一首赞颂包钢的七言绝句：

黄河之北青山南，  
包钢融融火烛天，  
五百万吨如反掌，  
鼎足武汉与鞍山。

据说，林老曾嘱咐建议包钢党委，把这首小诗登在《包钢报》上。党委负责同志见他如此关怀党报，便请他为《包钢报》题写新的报头。当即，他老人家欣然应诺了，并当场提笔书写。今日的“包钢报”这三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便是我们敬爱的革命前辈林伯渠同志，在双目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留下的！

## 编 后

《昆都仑文史》第四辑，是在首届昆区委员会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后，在本届政协主席乌力吉、副主席白玉、姜兴等亲自过问和直接参与下，编辑出版的又一成果。

本辑文史从征集资料以来，始终受到各级领导与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如市政协副主席顾钧，原市人大副主任王达仁，包钢志史办主任王耕樵，市民委副主任阿古拉，包头医学院党办和系主任陶充英、朱企泰副教授，包头钢院马德副教授，包头稀土院纪委副书记张毓，民革市委会副主委刘发林，内蒙古教印厂长王兆才等，均为我们撰写了重要文稿。特表谢意！

本辑文史，我们采取了集体编选稿件的方法。从主席、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到有编辑能力的政协机关干部，几乎是全力以赴。这样，既减轻了专职文史干部的压力，又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偏见。最后，又经过文史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审定，才算脱稿；因此，大家普遍认为，这一“改革”值得今后坚持。

明年是建国四十周年，我们殷切希望各族各界人士一如既往，源源赐稿。

责任编辑

政协包头市昆都仑区第二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

主任：姜 兴

副主任：王耕樵 杜守恒 包广仁

委员：马醒民 王雪峰 王世颖 刘发林 吕智豪 陈有道

张 锋 张 清 易 馨 郑世荣 徐淑娴 鲁玉华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昆都仑文史资料选编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7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